

BEIDA XUEZHE TAN DUSHU

BEIDA

XUEZHE

TAN DUSHU

BEIDA

XUEZHE

TAN DUSHU

北大

学者谈读书

肖东发
杨东运

小运

编

(修订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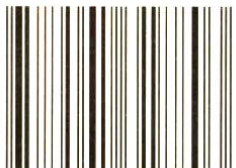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金丽萍

封面设计：马宁

北大 学者谈读书

- 为什么一定要读书
- 读什么样的书
- 怎样读书
- 北大知名学者告诉你
读书求知的真谛

ISBN 7-5013-1880-8



9 787501 318803 >

ISBN 7-5013-1880-8/G·504

定价：18.00 元

北大

学者谈读书

肖东发
杨承运 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学者谈读书/肖东发,杨承运编. —修订版.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1

ISBN 7-5013-1880-8

I.北… II.①肖…②杨… III.读书方法 IV.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971 号

书名 北大学者谈读书(修订本)

著者 肖东发 杨承运 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26153 传真(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双桥威宁侯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2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0(千字)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5013-1880-8/G·504

定价 18.00 元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录

- 1 吴小如：序言
- 1 严 复：西学门径功用
- 5 辜鸿铭：读书人
- 7 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
- 9 鲁 迅：读书杂谈
- 15 熊十力：《读经示要》自序
- 19 周作人：读书的经验
- 22 李四光：读书与读自然书
- 24 胡 适：读书
- 28 梁漱溟：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
- 36 顾颉刚：初进学问界
- 39 毛子水：书籍与修养
- 42 冯友兰：我的读书经验
- 46 钱 穆：读书漫谈
- 50 林语堂：论读书
- 53 郁达夫：说开卷有益
- 59 傅斯年：论学校读经
- 64 陈西滢：再论线装书
- 69 曹靖华：坚持自学 学无止境
- 72 朱光潜：谈读书



- 77 宗白华：读书与自动的研究
- 80 徐志摩：致孙伏园信
- 87 朱自清：《经典常谈》序
- 90 孙福熙：读书并非为黄金
- 92 王 力：谈谈怎样读书
- 97 冰 心：忆读书
- 100 俞平伯：读书的意义
- 108 梁实秋：读书苦？读书乐？
- 111 叶公超：买书
- 114 李霁野：读书与生活
- 120 冯 至：书和读书
- 125 傅振伦：广博与专精
- 131 谢兴尧：读书有味聊忘老
- 137 商鸿逵：北平旧书肆
- 141 张岱年：《读书文萃》序
- 145 张中行：由旧书想起的
- 149 萧 乾：关于书
- 155 季羨林：我和书
- 157 侯仁之：书缘
- 161 何其芳：尽信书，不如无书

- 163 金克木：谈读书和“格式塔”
- 169 任继愈：“伪书”并不全伪
- 172 谢义炳：图书对我的教益
- 175 胡绳：两种读书人
- 177 汪曾祺：读廉价书
- 184 吴小如：漫谈我的所谓“做学问”和写文章
- 189 程毅中：编书、读书、写书的种种关系
- 193 陈丹晨：书虫
- 196 金开诚：回顾往昔谈读书
- 202 褚斌杰：读书卮言
- 208 胡经之：开卷有益乐无穷
- 211 裘锡圭：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
- 220 袁行霈：书趣
- 223 刘绍棠：断章取“艺”
- 226 钱理群：真的书
- 228 叶永烈：日坐书城
- 231 陈建功：情痴不关风与月
- 235 曹文轩：闲话读书
- 241 陈平原：读书，读什么书？

序 言

□ 吴小如

本书以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幾道）居首，然后依每位学者出生的年代为序，直至目前作为骨干力量尚在母校任教的知名学者，共收集了五十八位作者的谈读书的文章（每人只收一篇）。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介绍自己读书治学的心得体会的。除了具有缅怀前辈学者的纪念意义外，还可以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读书求知起到启迪指导的教育作用，同时也大体认识这一百年来北大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总的趋向。遗憾的是，与北大有“血缘”关系的知名人士远不止此戔戔之数，属于这一类的文章也还大有可选的余地。本书之成，由于时间仓促，实不免贻人以挂一漏万之讥。这一切只能有待于将来进行弥补了。

作为学者，一般总是从读书治学开始，逐步达到学有所成而著书立说。不仅为科研领域添砖加瓦，而且其中一部分出类拔萃者更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创解卓识的论著，以跻于世界学术之林。尽管他们所走的途径不同，所用的方法不同，所切入的突破口不同，所要抵达的彼岸（最终目的）更是各不相同；但总的看来，其成功的关键都离不开勤奋努力、好学深思这八个字。我们过去说每个人先天禀赋不同，今天也承认人与人智商各异。但凡是在学术方面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并不只限于少数天才人物。有些学者看上去并无过人颖慧，而终于能以其毕生不懈的努力，结出了人所不及的丰硕的学术成果。古人说“勤能补拙”，我看只要一个

人肯勤奋努力,不惜下笨功夫,所谓‘人一之,己百之’,不但能‘补拙’,而且还能‘益智’而‘生巧’。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再加上勤奋努力与好学深思,自然会成为学术上的名家巨擘。近、现代的学术界,被公认为大师的前辈学者,稍远者如王国维、鲁迅,晚近如陈寅恪、钱钟书,除了先天禀赋已非人所能及的自然条件之外,他们无不刻苦勤奋,一生在坚持着“读书破万卷”的实践功夫;否则必不能卓荦不群,成为一代宗师。盖所谓‘天才’,倘无‘学力’以副之,有些还未必真能超过‘人一之,己百之’那种以‘勤’补‘拙’的‘凡’人、“笨”人。当然,所谓‘勤’初不限于博览与记诵,还要勤于思考,善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古人说:“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实际上使之‘通’者并非‘鬼神’,而是在不断思考中使智商有所提高,然后回过头来增助于自己对问题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思考,成为良性循环,最终乃臻于彼岸。希望亲爱的读者能从本书所收的几十篇文章中有所领会,并在自己的学术实践方面得到裨益,则编选者的点滴心血就不算白费,同时也了却作为北大人的一桩心愿。

1998年3月写于北京大学中关园寓庐

西学门径功用

□严 复

昔英人赫胥黎著书名《化中人位论》，大意谓：人与猕猴为同类，而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盖能言而后能积智，能积智者，前代阅历，传之后来，继长增高，风气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此即教学二事之起点。当未有文字时，只用口传。故中文旧训以十口相传为“古”，而各国最古之书，多系韵语，以其易于传记也。孔子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文无文，亦谓其成章可传诵否耳。究之语言文字之事，皆根心而生，杨雄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最为谛当。英儒培根亦云“世间无物为大，人为大；人中无物为大，心为大。”故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炼心精、积智多者为学者。否则常民与野蛮而已。顾知炼心矣，心有二用：一属于情，一属于理。情如诗词之类，最显者中国之《离骚》。理，凡载道谈理之文皆是。然而理，又分两门：有记事者，有析理者。而究之记事之文，亦用此以为求理之资，所谓由博反约、博文约礼皆此意也。

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谓之观察，或谓之演验。观察演验，二者皆考订之事而异名者。盖即物穷理，有非人力所能变换者，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有可以人力驾御移易者，如炉火树畜之类是也。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

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此之典礼，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

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培根言：“凡其事其物为两间之所有者，其理即为学者之所宜穷。所以无大小，无贵贱，无秽净，知穷其理，皆资妙道。”此佛所谓墙壁瓦砾，皆说无上乘法也。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为古人所蒙，经颠倒拂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诸公若问中西二学之不同，即此而是。又若问西人后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即此而是也。而于格物穷理之用，其涂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一曰外导。此二者不是学人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者也。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粗而言之，今有一小儿，不知火之烫人也，今日见烛，手触之而烂，明日又见炉，足践之而又烂，至于第三次，无论何地，见此炎炎而光，烘烘而热者，即知其能伤人而不敢触。且苟欲伤人，且举以触之。此用内导之最浅者，其所得公例，便是火能烫人一语。其所以举火伤物者，即是外导术。盖外导术，于意中皆有一例。次一案，二一断，火能烫人是例，吾所持者是火是案，故必烫人是断。合例、案、断三者，于名学中成一联珠，及以伤人而人果伤，则试验印证之事矣。故曰印证愈多，理愈坚确也。名学析之至细如此，然人日用之而不知。须知格致所用之术，质而言之，不过如此。特其事尤精，因有推究精微之用，如化学、力学，如天、地、人、动、植诸学多内导。至于名、数诸学，则多外导。学至外导，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

诸公在此考求学问,须知学问之事,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一公家之用。何谓专门之用?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然而虽大而未大也,公家之用最大。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故为学之道,第一步则须为玄学。玄者悬也,谓其不落遥际,理该众事者也。玄学一名、二数,自九章至微积,方维皆丽焉。人不事玄学,则无由审必然之理,而拟于无所可拟。然其事过于洁净精微,故专事此学,则心德偏而智不完,于是,则继之以玄著学,有所附矣,而不囿于方隅。玄著学,一力,力即气也。水、火、音、光、电磁诸学,皆力之变也。二质,质学即化学也。力质学明,然后知因果之相待。无无因之果,无无果之因,一也。因同则果同,果钜则因钜,二也。而一切谬悠如风水、星命、机祥之说,举不足以惑之矣。然玄著学明因果矣,而多近果近因,如汽动则机行,气轻则风至是也,而无悠久繁变之事,而心德之能,犹未备也,故必受之以著学。著学者用前数者之公理大例而用之,以考专门之物者也。如天学,如地学,如人学,如动植之学。非天学无以真知宇之大,非地学无以真知宙之长。二学者精,其人心犹病卑狭鄙陋者,盖亦罕矣!至于人学,其蕃变犹明,而于人事至近。夫如是,其于学庶几备矣。然而尚未尽也,必事生理之学,其统名曰拜欧劳介,而分之则体用学、官骸学是也。又必事心理之学,生、心二理明,而后终之以群学。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皆治事者所当有事者也。凡此云云,皆炼心之事。至如农学、兵学、御舟、机器、医药、矿务,则专门之至溢者,随有遭遇而为之可耳。夫惟人心最贵,故有志之士,所以治之者不可不详。而人道始于一身,次于一家,终于一国。故最要莫急于奉生,教育子孙次之。而人生有群,又必知所以保国善群之事,学而至此,殆庶几矣。诸君子力富而志卓,有心力者任自为之,仆略识涂径,聊为老马之导,非曰能之也。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治今福州）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北京大学后首任校长。是第一位系统地将西方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先进学者。其著作编入《侯官严氏丛刊》、《严幾道诗文抄》，代表性译著有《天演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论》、《群学肄言》。

读书人

□ 辜鸿铭

袁简斋《原士论》曰：“士少则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农工商，后有士。农登谷，工制器，商通有无，此三民者养士者也。所谓士者，不能养三民，兼不能自养也。然则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缓，而其果志在仁义与否，又不比谷也、器也、货之有无也，可考而知也。然则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而士不可少，亦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乱臣十人，岂多乎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亦易当也。今则不然，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之上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

辜鸿铭（1856—1928），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早年留学英、

法、德等国，游历欧洲，精通多国文字。曾为张之洞幕僚，任清朝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尊崇孔子学说，将《论语》、《中庸》等译成英文。著有《春秋大义》、《读易堂文集》。

我的读书经验

□蔡元培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也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为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词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做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强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动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

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它，我正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虽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自然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曾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雋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动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文学评论家、民主革命家。早年宣传民主思想，鼓动革命，倡导教育。曾组织光复会、中国教育会，创办侨农小学、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俄事警闻》等报刊，推动留法勤工俭学，提倡学术研究。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任南京政府大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长），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主要著述有《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言行录》等。

读书杂谈

□ 鲁 迅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对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

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始终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课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说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这‘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人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

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在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介绍,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糊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

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鞵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 Shaw)，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勛本华尔(Schopenhauer)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枝。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 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1920 年秋到 1926 年夏，曾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小说史。投身并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办了多种文学刊物与多个文学团体。1930 年在上海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被周恩来誉为“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一生创作不辍，以杂文、小说、散文成就最大，写有享誉世界文坛的《阿 Q 正传》、《狂人日记》、《祝福》等，辑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等，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等，译作有《艺术论》、《十月》、《死魂灵》等。今有《鲁迅全集》、《鲁迅选集》刊行于世。

《读经示要》自序

□熊十力

读经问题，民初以来，常起伏于一般人之脑际而纷无定论。余虽念此问题之重要，而无暇及此。且世既如斯，言之无益，不如其已。去年责及门诸子读经。诸子兴难。余为笔语答之，惧口说易忘也。初提笔时，只欲作一短文，不意写来感触渐多，遂成一书。

六经究万有之原，而言天道。天道真常。在人为性。此克就人言之耳。在物为命。此言命者有二义：一流行曰命。言天道流行，至健而无息也。二物所受曰命。物禀天道而生，即一一物皆天道呈显。不可说天道超脱万有而独在也。此中言物，亦摄人。言命，亦即性。命以所受言，性谓人物所以生之理。言异，而其实一也。性命之理明，而人生不陷于虚妄矣。第一讲首释道。顺常道而起治化，则群变万端，毕竟不失贞常。通万变而不可易者，仁也。知变而不知常，人类无宁日也。今世列强，社会与政治上之改革，与机械之发明，可谓变动不居矣。然人类日习于凶残狡诈。强者吞弱。智者侵愚。杀机日炽，将有人类自毁之忧，而昏乱之群复不思自存自立之道。且以其私图而自伤同气，尤为可悯。盖今之人皆习于不仁，即失其所以为人之常道。宜其相残无已也。第一讲以九义明治化通万变而贞于大常。实六经之撮要。《大学》三纲八目，总括群经。三纲八目，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为常道不可易。《儒行》十有五儒，归本仁道。行不一，而同于仁。仁，常道也。凡此，皆为第一

讲所提揭。经为常道，庶几无疑，夫常道者，万变所自出也。本书道字，略有二义：一谓宇宙本体，乃万化之原也。二谓凡事理之当然，通古今中外而无可或易者，亦名常道。如《大学》三纲八目，立内圣外王之极。则由此而体道。由此而修学。由此而致治。由此而位天地，育万物，赞化育。此便是当然。不可异此而别有道。天下言道者，或有从事明明德，而不务新民与止至善，是佛家小乘也。大乘誓度众生，而以人间世为生死海，只求度脱，而无齐治平之盛业，吾儒之外道也。致知而疏于格物，宋明学有遗憾也。格物而不务致良知，即难言诚正，西学未立大本也。《大学》为常道无可疑。又如《儒行》十五，总不外己立立人，已达达人。此亦是当然。若不务立达，便自暴自弃，而不可为人矣。又如革故创新，必行之以至公至明至诚至信。是变动之必本常道也。不能公明诚信，而言革新，则失常道，自取乱亡而已。略举三例，余可推知。然道字之义虽有二，而第二义实依第一义以立，究竟无二也。天地密移矣。天地，大物也，世俗见为恒存。其实，诸大与员舆，刻刻移其故而新生。参看《新唯识论》。而所以成其清宁者，未有改移也。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一者，绝对义，谓常道也。天曰清，地曰宁，皆以其德性言也。天地由道而成。道则真常而无可改移也。人事屡迁矣。群变万端，不可胜穷。而干济必本公诚焉，无可苟渝也。当变革之任，而不公不诚，未有能立事而不乱亡者。公诚常道也。事势万变，而事之成，必由常道。一国之事如此，国际尤然。死生诚大变矣，而存顺殁宁之理，谁云可变？人皆禀道而为性命。其存也，必顺保性命之正，而无或罔。其殁也，乃全其性命，而有余憾。故张子云存顺殁宁。是故学术千途万辙，必会归常道，而后为至。知不极乎知常，知常亦云见道。只是知识，而不足言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借用佛典名同。若泛释之，亦可云最高的智慧。老氏曰：“不知常，妄作凶”。不见道者，徇私欲而灭天理，所作皆迷妄，故凶。斯笃论也。夫不悟常道，则万物何由始？人极何由立？万事何由贞？皆其智之所不及也。学不究其

原，理不穷其至，知不会其通，则未能立大本以宰百为，体大常而御万变。则未能三字，一气贯下。欲免于妄作之凶，其可得乎？

第一讲，直明经为常道，以经明示常道故，遂言经为常道。无时可离。无地可离。无人可离。奈何吾国后生，自弃宝物，不肯是究。嗟尔违常，云胡不思？第二讲，言治经态度，必远流俗，必戒孤陋，尚志以立基，砭名以固志。持以三畏，然后志定而足以希圣。圣者道全德备，而大通无碍。故读经希圣，非可专固自封也。今当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上下数千年学术源流得失，略加论定。由是寻晚周之遗轨，辟当代之弘基，定将来之趋向。庶几经术可明，而大道其昌矣。第三讲，略说六经大义，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发明内圣外王之道，莫妙于《大易》《春秋》。《诗》《书》《礼》《乐》，皆与二经相羽翼。此讲特详二经。二经通，而余经亦可通也。

议者或谓余实以《新论》说经，《新论》具云《新唯识论》是固然矣。夫《易》《春秋》虽并称，而汉人相传，《易》为五经之源，比《春秋》尤尊矣。惜乎汉师乱以术数，宋儒略于思辨。宋学注重体认。于人生日用践履间，修养工夫最紧切。修养深，而私欲尽，真体现，即真理不待外索，而炯然自识。孔子谓之默识。宋儒说为体认。佛氏亦云自证。余尝谓先哲尚体认，而西哲精思辨。体认自是哲学之极诣。然若忽略思辨，则不得无病。宋学终不免拘滞偏枯等病，由于忽略思辨工夫，而其道未宏也。易道晦塞，二千余年。余造《新论》，自信于羲皇神悟之画，尼山幽赞之文，冥搜密察，远承玄旨。真理昭然天地间。悟者同悟。迷者自迷。余非敢以己意说经。实以所悟，证之于经而无不合。岂忍自陷诬经谤圣之罪哉？

如上三讲，结集成书。肇始于六十揽揆之辰，毕事于寇迫桂黔之日。甲申正初起草，迄秋冬之际而毕。念罔极而哀栖。痛生人之迷乱。空山夜雨，悲来辄不可抑。斗室晨风，兴至恒有所悟。上天以斯文属余。遭时屯难，余忍无述。呜呼！作人不易。为学实难。吾衰矣。有志三代之英，恨未登乎大道。言未能登斯世于大道也。用

顾宁人语。不忘百姓之病,徒自托于空言。天下后世,读是书者,其有怜余之志,而补吾不逮者乎!

熊十力(1884—1968),湖北黄冈人。著名哲学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习佛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选为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思想与哲学研究,创立‘新唯识论’。著有《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十力论学语要》等。

读书的经验

□周作人

买到一册新刻的《汴宋竹枝词》，李于潢著，卷头有蒋湘离的一篇李李村墓志铭，写得诙谐而又朴实，读了很是喜欢，查《七经楼文抄》里却是没有。我看着这篇文章，想起自己读书的经验，深感到这件事之不容易，摸着门固难，而指点向人亦几乎无用。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古文析义》，只算是学了识字，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西游记》与《水浒传》，《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可以说是两大类。至于文章的好坏，思想的是非，知道一点别择，那还在其后，也不知道怎样的能够得门径，恐怕其实有些是偶然碰着的吧。即如蒋子潇，我在看见《游艺录》以前，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父师的教训向来只说周程张朱。便是我爱杂览，不但道咸后的文章，即使今人著作里，也不曾告诉我蒋子潇的名字，我之因《游艺录》而爱好他，再去找《七经楼文》与《春晖阁诗》来读，想起来真是偶然。可是不料偶然又偶然，我在中国文人中又找出俞理初，袁中郎，李卓吾来，大抵是同样的机缘。虽然今人推重李卓吾者不是没有，但是我所取者却非是破坏而在其建设，其可贵处是合理有情，奇辟横肆都只是外貌而已。我从这些人里取出来的也就是这一些些。正如有取于佛菩萨与禹稷之传说，以及保守此传说精神之释子与儒家。这话有点说得远了。总之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集合拢来，所谓粒粒皆辛苦的，在自己看来觉得很可珍惜，

同时却又深知道对于别人无甚好处，而仍不免常要饶舌，岂真敝帚自珍，殆是旧性难改乎。

外国书读得很少，不敢随便说，但取舍也总有的。在这里我也未能领解正统的名著，只是任意挑了几个，别无名人指导，差不多也就是偶然碰着，与读中国书没有什么两样。我所找着的，在文学批评是丹麦勃兰兑思，乡土研究是日本柳田国男，文化人类学是英国弗来则，性的心理是蔼理斯。这都是世界的学术大家，对于那些专门学问我不敢伸一个指头下去，可是拿他们的著作来略为涉猎，未始没有益处，只要能吸收一点进来，使自己的见识增深或推广一分也好。回过去看人生能够多少明白一点，就很满足了。近年来时常听到一种时髦话，慨叹说中国太欧化了，我想这在服用娱乐方面或者还勉强说得，若是思想上那里有欧化气味，所有的恐怕只是道士气秀才气以及官气而已。想要救治，却正用得着科学精神，这本来是希腊文明的产物，不过至近代而始光大，实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谓疾虚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我不知怎的觉得西哲如蔼理斯等的思想实在与李俞诸君还是一鼻孔出着气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靠直觉懂得了人情物理，前者则从学理通过了来，事实虽是差不多，但更是确实，盖智慧从知识上来者其根基自深固也。这些洋书并不怎么难于消化，只须有相当的常识与虚心，如中学办的适宜，这与外国文的学力都不难习得，此外如再有读书的兴趣，这件事便已至少有了八分光了。我自己读书一直是暗中摸索，虽然后来找到一点点东西，总是事倍功半，因此常想略有陈述，贡其一得，若野芹蜚口，恐亦未免，唯有惶恐耳。

近来因为渐已懂得文章的好坏，对于自己所写的决不敢自以为好，若是里边所说的话，那又是别一问题。我从民国六年以来写白话文，近五六年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不怪小朋友们的厌恶，我自己也戏称曰文抄公，不过说尽是那么说，写也总是写着，觉得这里边不无有些可取的东西。对于这种文章不以为非的，想起来有两个

人，其一是一位外国的朋友，其二是亡友焘斋。焘斋不是他的真名字，乃是我所戏题，可是写信时也曾用过，可以算是受过默许的，他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说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所以人家不理解，于别人不能有好处，虽然我十分承认，且以为当然，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如不写点下来，未免可惜。在这里我知道自己稍缺少谦虚，却也是无法，我不喜欢假话，自己不知道的都已除掉，略有所知的就不能不承认，如再谦让也即是说诳了。至于此外许多事情，我实在不大清楚，所以我总是竭诚谦虚的。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著名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著述甚丰，作品集达五十余种。如《自己的园地》、《知堂文集》、《苦茶随笔》、《书屋一角》、《新文学的源流》等，译文《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读书与读自然书

□李四光

什么是书？书就是好事的人用文字或特别的符号，或兼用图画将天然的事物或著者的理想（幻想妄想滥想都包在其中）描写出来的一种东西。这个定义如若得当，我们无妨把现在世界上的书籍分作几类：（甲）原著，内含许多著者独见的事实，或许多新理想新意见，或二者兼而有之。（乙）集著，其中包罗各专家关于某某问题所搜集的事实，并对于同项问题所发表的意见，精华丛聚，配置有条，著者或参以己见，或不参以己见。（丙）选著，择录大著作精华，加以锻炼，不遗要点，不失真谛。（丁）窃著，拾取一二人的唾余，敷衍成篇，或含糊塞责，或断章取义。窃著者，名曰书盗。假若秦皇再生，我们对于这种窃著书盗，似不必予以援助。各类的书籍既是如此不同，我们读书的人应该注意选择。

什么是自然？这个大千世界中，也可说是四面世界（Four dimensional world）中所有的事物都是自然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最真实，它们的配置最适当。如若世界有美的事，这一大块文章，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再美没有。可惜我们的机能有限，生命有限，不能把这一本大百科全书一气读完。如是学“科学方法”的问题发生，什么叫做科学的方法？那就是读自然书的方法。

书是死的，自然是活的。读书的工夫大半在记忆与思索（有人读书并不思索，我幼时读四书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读自然书，种种

机能非同时并用不可，而精确的观察尤为重要。读书是我和著者的交涉，读自然书是我和物的直接交涉。所以读书是间接的求学，读自然书乃是直接的求学。读书不过为引人求学的头一段工夫，到了能读自然书方算得真正读书。只知道书不知道自然的人名曰“书呆子”。

世界是一个整的，各部彼此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硬把它分做若干部，是权宜的办法，是对于自然没有加以公平的处理，大家不注意这种办法是权宜的，是假定的，所以酿出许多科学上的争论。Levons 说按期经济的恐慌源于天象，人都笑他，殊不知我们吃一杯茶已经牵动太阳，倒没有人引以为怪。

我们笑腐儒读书断章取义，咸引以为戒。今日科学家往往把他们的问题缩小到一定的范围，或把天然连贯的事物硬划作几部，以为在那个范围里的事物弄清楚了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也未免在自然书中断章取义。这一类科学家的态度，我们不敢赞同。

我觉得我们读书总应竭我们五官的能力（五官以外还有认识的能力与否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去读自然书。把寻常的读书当做读自然书的一个阶段。读自然书时我们不可忘却，我们所读的一字一句（即一事一物）的意义还视全节全篇的意义为意义，否则成一个自然书呆子。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著名科学家、地质力学创立者。1920年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1931年至1937年担任北大地质系主任。新中国成立，旋即回国从事科学研究等工作。为中国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作出重大贡献。曾任地质部部长、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读书

□胡 适

“读书”这个题，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却觉得这个题目很不好讲。据我所知，“读书”可以有三种说法：

（一）要读何书 关于这个问题，《京报副刊》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但是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二）读书的功用 从前有人作“读书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要说，读书是求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所以我也不必讲。

（三）读书的方法 我今天是想根据个人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

第一要精，

第二要博。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现在这种书签虽不用，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来说

一说。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读外国书要把 A. B. C. 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 port 看作 pork，把 oats 看作 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

(一) 字典，辞典，参考书等等工具要完备。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当到图书馆去看。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

(二) 要做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识，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构造，方才懂得它的意义。

(三) 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但看字面。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读者容易上当。例如 turn 这字：

作外动字解有十五解，
作内动字解有十三解，
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
共五十四解，而成语不算。

又如 strike：

作外动字解有三十一解，
作内动字解有十六解，
作名词解有十八解，
共六十五解。

又如 go 字最容易了，然而这个字：
作内动字解有二十二解，
作外动字解有三解，
作名词解有九解，
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子。英文字典是完备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这就非比较上下文，或贯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较英文更难，现在举几个例：

祭文中第一句‘维某年月日’之‘维’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说它是虚字。《诗经》里‘维’字有二百多，必需细细比较研究，然后知道这个字有种种意义。

又《诗经》之‘于’字；‘之子于归’‘凤凰于飞’等句；‘于’字究作何解？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诗经》中就发生问题，必须比较，然后知‘言’字为联接字。诸如此例甚多，中国古书很难读，古字典又不适用，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懂得呢？

总之，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

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又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宋儒程颐说：“学原于思。”

这样看起来，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例如：

(1) 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

(2) 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

(3) 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又可分四类：

(a) 抄录备忘。

(b) 作提要，节要。

(c) 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则还塞之矣。”

(d) 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识。假使你听了我这句话，不服气，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种书籍，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假使你翻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的札记，列举了

(一) 生物学上的证据，

- (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
- (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
- (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
- (五)考古学上的证据，
- (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

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论’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已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内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哪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他前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史,做了许多辨伪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绩早已超过崔述了,更不要说姚际恒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我们可以说,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

第二要讲什么叫“博”

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我也主张这个意思,所以说读书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们主张“博”有两个意思: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

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在座的人，大多数是戴眼镜的。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了 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荆公说得最好：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 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伦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 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

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

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简单贯串の説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为做人计。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高四百八十英尺，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以次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颢说的好：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博学正所以“大其心使开阔”，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口号，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作为读书的目标：

为学要如金字塔，
要能广大要能高。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1910年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又任英文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主要著述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等。

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

□ 梁漱溟

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说读书要认真，其意不同于努力读书。努力读书、下劲读书是主观一面的事，而读书认真不认真则涵有客观的意义。我以为其意义正应该本着《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去寻求去了解。读书而不认真，就不能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

照我看，认真读书的这个认真可以分为三层或三点意思。

第一，先说书是什么？书上有许多文字符号，它代表着人的语言、说话。人说话不是平白无故的，总是在解答什么问题，叫人明白一事物或明白一个道理。既然书上所写亦即所说的都在解答问题，解决从不知到知的矛盾，所以第一是要带着问题学，不要泛泛地读书，要为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而读书。这样读书就读得进去，读得入，就不会书是书，你是你。就会在你的世界观起影响。

我可以我一生的生活经验来说明。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没进大学，更没有去东西洋留学。中学里没有哲学一门课，而且当我念中学时还没有听见“哲学”一名词；哲学这名词是从外国输入的，旧书中没有。我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也从来没有想过哲学。但后来却到大学里讲哲学了。为何能如此？就为我十几岁就对人生抱疑问，从人生的怀疑、烦闷，不知不觉有些思想见解。当我对人讲说时，人家告诉我说：“你讲的是哲学。”问题在先，道理在后，有问题

才有道理。否则不切实，不真懂。毛主席说陆军大学毕业的不如黄埔毕业的会打仗。

赵奢之子赵括的故事。毛主席没有学过军事，从战争学战争，从游泳中学游泳。此即一定要实践，从实践中得经验，才有所谓感性认识、理性认识那些。是否我们就去实践好了，不必读书呢？这不好，这没有借用前人的经验。一切都从头来，就一个人说太费力气，就社会说将没有进步。物理化学上的学理都是前人的发明、发现、创造，留给后人，这一代一代愈来愈进步。书上所记的都是前人认识出来，告诉你，你也可以作些物理化学的实验，也就能得到许多学理，不必再从头来过。读书的必要在此，进学校的必要在此。因此后来人的知识多过前人。但要利用前人的经验，须要多少实践一下，把书本中所说的话还原到事实上去。没有抓到事实，那不过是空话，或者是一种猜想。赵括善读父书，不会打仗，正是没有还原到事实，停留在抽象道理上，只会说不会做。所以第二就是要做还原功夫，还到所代表的原来那种事实上去。

再以我的读书为例来说明以上的话。我没有读旧书“四书五经”，更没有看过《朱子集注》，《论语》上孔子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前人皆于此有其解释，因为你并不知道孔子所说话的内容事实，孔子当他三十岁时也还不知道他四十岁的事情，当四十岁时不知道他五十岁的事，六十七十皆如此。你不是孔子，又没有六七十岁，你何能知道？你不过从字面上去猜想，这不行。那末，是否我们完全不知道这章书所说的是什么呢？也还可以知道一点。那就是孔子所志之学不是物理化学，不是植物学动物学乃至一切科学都不是，也非政治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亦不是哲学、文学、史学……。所有今天大学里各门学科都不是，而是他自己生命上生活上一种学问，自少年时代以至老年有所进步。孔子的学问是人生生活之学。此可以孔子称赞他最好的学生的话来作证

明。“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今也则亡。”何谓“不迁怒，不贰过”？前人都加讲解，其实都猜想得不对。不过我们知道他所好的学问不是别的学问，而是孔子到老所致力的那种人生生活之学（此可以产生哲学，但非即哲学）。——以上说明读书要作还原功夫，就是还归到事实上，不要停留在名词概念上。

可惜我读书不总是十分认真的；有时候不够认真。过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没有认真读它。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主要在莫斯科一声炮响之后，即在“五四”运动时期。那时介绍它的是陈独秀，传播它的是北京大学。毛主席也是在那时候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我那时正在北大。不是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特别是到1927年前后即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势力很大。我是一个抱着中国问题求答案的人，怎能不注意呢？这里正好附带声明一句：我从来不是为求学问当一个学者而读书。只为自己有两大问题在逼迫我，才找书来看的，看书是为解答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除了一个人生问题引我进入哲学之门外，中国的衰弱快灭亡则引我去留心政治经济这一类社会科学各书。这样亦就不知不觉学得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仍然常带着问题学的。例如当时有康梁的立宪派，有孙黄的革命派，我开头就是留心两派的言论，再引入去看比较专门的政治经济学的书。我也有共产党的朋友如李大钊。虽然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书还不多，翻译的不够好，但由于我不重视它，粗心大意地以为它不适合于中国之用。当时恰好马氏学说中又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说法，把东方社会的发展史另眼看待。再加以1928年后连续几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到今天也还不能把中国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搞清楚，这些都使我对马学不深求。特别是毛主席出人意外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包围城市，他不是根据书本，不是从教条公式出发而是活学活用，「这」才真是善于读书，即读书认真而成功的。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因此，认真读书的第三条就是领会书中的意思而活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如列宁所再三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同见于斯大林语言学一书末尾的话）

注：此文为作者 1971 年 4 月 2 日在政协学习小组会上的发言稿之抄件。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1917 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曾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多个民主社团，积极响应抗战，并任《光明报》社长。建国后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等。研究与著述主要围绕人生与社会两大主题，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初进学问界

□顾颉刚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的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他因为对于所见的东西感到兴味，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不像学术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种种难处，不敢为了立一异议，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正因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炼，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久保留下去。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还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惟其

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了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就是为此。固然有人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也有人说，为学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设，有了假设才有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终该选定的，尽不妨俟将来深入之后而弃去。这种话在以前是可以说的，因为那时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学问的基础既不建筑于事实上，研究学问又苦于没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点引路的微光，为寻求一个下手处计，也有选择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非薄《诗》毛氏学，便当从齐、鲁、韩三家或其中的一家研钻下去；等到自己的学问足以自树了，再脱离家派而独立。但到了现在，学问潮流已经很明白地昭示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了。我们自有古文字学，古文学，古器物学，古历史学等等直接去整理《诗经》，《毛传》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诗》也是《毛传》的‘一丘之貉’，又何尝要得。至于我们为要了解各家派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对于家派有所寻绎，但这是研究，不是服从。我很怕别人看了我表章郑樵、崔述诸人的文字，就说我做了他们的信徒而来反对毛公、郑玄，所以现在在此附带声明一句：我对于郑樵、崔述诸人决无私爱；倘若他们的荒谬有类于毛公、郑玄，我的攻击他们也要和对于毛公、郑玄一样。希望读者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这等的批判，千万不要说“承你考辨得很精细，我有所遵循了”这一类话！

《老子》说‘自知者明’，希腊的哲学家多劝人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我‘当仁不让’，自认为无愧的。我既不把别人看作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

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惯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自己的凭藉，故不愿没却他人的功绩；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故不愿徇着一时的意气。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所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见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因为我有了以上种种的自觉，所以我以为我现在固然学力浅薄，不足以解决多少问题，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是不错的，我的假设虽大胆而绝不是轻举妄动，只要能从此深入，自可驯致于解决之途。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创始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历任中山、燕京、北京、中央、复旦等大学教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述宏富，出版有《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三皇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

书籍与修养

□毛子水

《周易》(大畜卦象词)曰：“天在山中,大畜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修养。修养需要多识前言往行,理至明显。但一个人要多识前言往行,最要紧的事情便是读书,因为前言往行,我们只能在书籍里学得。

后魏的道武帝尝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 ?李先对曰：‘莫若书籍。’这当然是因为书籍记载着前言往行,乃是过去人类智慧所积存的地方。

宋朝黄庭坚曾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 对镜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从来讲书籍和修养的关系的,没有比黄氏这几句话更为亲切的了。

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文学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亦以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应为修养所资的,差不多全在书籍里。

因为这些贤哲的启示,我自己喜欢藏书,也希望别人喜欢藏书。

当然,藏书并非即是读书,读书亦不一定要藏书。世间尽有许多藏书而不读书的人,亦有许多能读书的人乃用借来的书把书读好的。

但最理想的读书环境莫如自己有书。自己的书,读起来要好些,这是读书的人都有同感的。除此以外,架上或桌上的书籍,有时可以使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主人成为一个有出息的读书者。

世上有许多收藏古董的人。从欣赏美术品或保存美术品的观点讲，他们或许是一种有意思的人。但就普通情形讲，他们行为的动机，由于货利方面的多，由于文化方面的少。藏书家便不然。世上固然有富翁以收藏宋元版本或莎士比亚作品的初版为务而并没有丝毫学问上的意义的，但究竟是少数。

况且，我要自己收藏或劝人收藏的书，是现在最好的书，现在最可读的书，现在最有用的书。这种书籍，大部分都是现代人的著作，并不是可以当古董买卖的。从我们现在的观点，即就古人所作的书籍讲，亦不一定以古本为最好。譬如，《十三经注疏》，并不是宋元版的为最好，而是现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阮刻本的为最好，最有用，最便于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是原来的四开本或两开本为最好，而是 Arden Edition，或 Alexander，或 Sisson 等人所校订的本子为最好最使用，亦最便宜。

本文所讲的藏书，大概是就已离学校的人讲的。但一个在中学或大学的学生，亦未尝不可作藏书的企图。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曾以家中给我的钱买到前四史，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尚是广东原版）等书，到了大学，买书的兴趣当然更大，范围亦更广。我知道现在学生的经济情形或不很好，但现在便宜的好书亦很多。中文的影印本，是大家所知道的；衡阳路一带的西书铺，陈列着很多廉价的版本（如牛津大学出版部所印行的 World's Classics，美国出版的 Modern Library 等），亦很值得学子的注意。一个学生，能够省下一次或两次看电影的费用，便可以买到一本印得很好的世界名著了，这岂不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我现在引十九世纪中英国大史学家麦考利（Macaulay）的两段话，作我这篇短文的结束：

“与其做一个国王而不知道爱好读书，我宁愿做一个穷人居于陋室而拥有极多的书籍。”

“书是我的一切。如果我现在有选择生活的自由，我就愿意埋身于一所你我所曾同参观过的大学图书馆中，并且不愿意有一时没有书籍在我面前。”（这是麦考利写给他妹妹信中的话。）

毛子水（1893—1988），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天津《益世报》副刊主编。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自由中国》、《新时代》杂志主编。有《毛子水文存》等。

我的读书经验

□ 冯友兰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1)精其选，(2)解其言，(3)知其意，(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

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人民日报》。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啰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啰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啰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啰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也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

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24年获美国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获印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在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自成体系。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人生哲学》、《三松堂全集》等。

读书漫谈

□钱 穆

(一)

要建筑一所屋宇必先问建此何用。若不先明用途，专论建筑规模式样以及材料等等，便成漫无准则之空谈。读书亦应先定旨趣，旨趣未立，且莫谈方法门径书籍选材以及其他等等。

读书旨趣，大要言之，可分两途。一是为自己谋职业，寻出路，求身家温饱，乃至近而鬻名声，攫权位，皆从个人私利的立场出发。一是纯粹从一种求知的兴趣和热忱而读书。这里边又分两面，有的因自己的性情和爱好，从一种内部的要求而走向读书的路，有的因环境的问题和需要，从一种外面的刺激而走上读书的路，其实这两面往往交融互映，并不必严格分别。

以上说的读书旨趣之两途，有时亦未尝不可相通。本为个人的私利立场而读书的人，亦未尝全违背了他自己内部的性情和爱好，而且对国家社会，对其当前环境，亦未尝不可有相当之贡献。纯粹为求知的兴趣和热忱而出发的人，亦未尝不想谋一职业寻一出路，未尝不要兼顾他身家之温饱，乃至亦望享有相当之名位。然而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到底这两路，还有绝大的不同。譬之建筑屋舍，一为旅馆，一为家宅。家宅未尝不可权当旅馆用，而旅馆未尝不可权

作家宅用，然而到底性质不同，利弊迥异。至于目前一般读书风气，究竟多半是为的盖旅馆，抑是盖家宅，则最好由各人自己反省，自己批评，自己认识。

(二)

论语上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家宅是为自己的，旅馆是为人的。为己的并不是为私，为人的并不是为公。从为己为人的心理差别，可以影响到他读书的态度形成绝大的乖离。

大抵为人之学，必求炫耀，必求迎合，必求卖弄，必求趋奉。读者心理的尊严，不在所读书中之真理，而在外面的时风众势，或是某些有力者之影响。因此读者对其书本的态度，常易陷于轻率而且傲慢，其为学必为浅尝，必求速成，必喜标新立异，必务独创己见。为己之学，则由自己性情所爱好及自己环境所刺激而感发。他既本于自己的真性情而欲对于环境求一种真知识，真了解，因此他心上的尊严，不在外面世俗上，而在他所追求的真理上。这样的读者，其开始一定沉潜，不喜炫耀，不务卖弄而刚毅，不求迎合，不乐趋奉。有一些严肃而谦恭而态度不轻率不傲慢，其成就则必深远不甘浅尝不期速成而真实。确乎有所自得，不为时风众势所摇，不为一二有力者所束缚驰骤而可以贡献于社会。而别人误认他的，还以为他亦是一个标新立异务创己见的人。

(三)

论语上又有一段孔子批评阙党童子的话，说他是“欲速成”者，非“求益”者。大凡读书亦有此两个很显著的分别，一是求益，一是欲速成。

欲速成的便不想再求益，读书只是求速成的凭藉。他选择书本的标准和读书的方法，绝与志在求益者不同。与其读人人共读的书，不如读人人不读的书。人人共读的难于凌驾，人人不读的易于创辟。因此与其读《论语》不如读《墨子》。并不是为他不愿请益于孔子而喜请益于墨子，只为《论语》人人共读，读了还是和人一般，难于表见自己的学问，《墨子》别人不注意，读了可以成名可以立业。最好是专注意于墨子书里别人都讲不懂的处所如《墨经》等篇，而由我讲懂了，岂不即此成名。于是渐渐造成喜艰僻不喜平易的心理。又渐渐造成喜欢寻疮摘疵的心理。最先是指摘后人注释的差误，以后是攻击著书人的不是。还借着怀疑批评种种好名词，来掩饰他求速成的坏心理。

文学艺术上的欣赏，无异于是再度的创造。哲理教义上的领会，也不异乎是再度的发明。我们不能希望人人成为哲学文学艺术家，但是可以希望人人领会哲学欣赏文艺，而社会全体之素质亦随之升进。只要求速成的学风一旦弥漫，文艺哲理的书籍，全变成读者求速成之工具。于是欣赏与领会，退处于不重要的地位，而学术上主要的工作，乃是些校勘训诂考订和辨难。更甚者则文艺必谈创作，哲理必谈发明。会场上的听众，各自急于要发表自己的音乐技能，而台上的乐师遂至于无技可奏。这便是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而创作发明等等一套好名词，还只是用来掩饰他而求速成的坏心理。

(四)

以上两节辞锋所相通，似乎偏指关乎人文科学方面的现象而言，其实自然科学方面事无二致。只要你真是发乎性情之所爱好，为研究真理而走向自然科学的路径，则将及理亦来学成致用，职业即为性情之发舒，工作便是真理的实验。自然孜孜不倦，日寻向

上。至少一种不苟且不敷衍的精神，可以常持不失。否则科学亦只是一块敲门砖，往日所探究的自然界的真理，现在依然是一种谋个人出路的手段和工具。私人的温饱，可以藉着他的职业而蒸蒸日上，社会福利却不一定能藉着他的工作而逐渐发展。一开始便立意要造一所旅馆的，到底造不出一座安稳而舒适的家宅。

（五）

学问之道，本已千门万户，累层曲折，涂辙纷歧。而学者心术之隐微，更难明指确说。又且一时有一时之风尚，在当时必有为他们的风尚辩护的一套理论。此种理论，亦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饮水冷暖，究竟各人肚里得知。本文粗引端绪，敬劝读书人本为己之旨，具求益之忱，莫误认别人盖的旅馆当作自己家宅。好学深思考自能从此籀绎。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风气固束不住人之生机也。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1930年任燕京大学教授。后曾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三四十年代于中国各著名大学讲学，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1967年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著述丰富，有《老子辨》、《孟子研究》、《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

论读书

□ 林语堂

本篇演讲只是谈谈本人对于读书的意见，并不是要训勉青年，亦非敢指导青年。所以不敢训勉青年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近来常听见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须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也有卖国官僚到大学演讲，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料想战国的土豪劣绅亦必好训勉当时的青年，所以激起孟子这样不平的话。第二，读书没有什么可以训勉。世上会读书的人，都是书拿起来自己会读。不会读书的人，亦不曾因为指导而变为会读。譬如数学，出五个问题叫学生去做，会做的人是自己脑里做出来的，并非教员教他做出，不会做的人经教员指导，这一题虽然做出，下一题仍旧非指导不可，数学并不会因此高明起来。我所要讲的话于你们本会读书的人，没有什么补助！于你们不会读书的人，也不会使你们变为善读书。所以今日谈谈，亦只是谈谈而已。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牒，抄帐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

实，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乎亦非读书的本旨。

今日所谈，亦非指学堂中的读书，亦非指读教授所指定的功课。在学校读书有四不可。（一）所读非书 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今日大学毕业的人所读的书极其有限。然而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二）无书可读 因为图书馆极有限。（三）不许读书因为在课堂看书，有犯校规，例所不许，倘是一人自晨至晚上课，则等于自晨至晚被监禁起来，不许读书。（四）书读不好 因为处处受注册部干涉，毛孔骨节，皆不爽快。且学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学，乃记问之学。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礼记》早已说过。书上怎样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倘是你能猜中教员心中要你如何答法，照样答出，便得一百分，于是沾沾自喜，自以为西洋历史你知道一百分，其实西洋历史你何尝知道百分之一。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这些不必用头脑，只需强记，然学校考试极其便当，差一年可扣一分；然而事实上与学问无补，你们的教员，也都记不得。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上去查。又如罗马帝国之亡，有三大原因，书上这样讲，你们照样记，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于蚊子（传布寒热症）。这是书上所无的。

今日所谈的是自由的看书读书：无论是在校，离校，做教员，做学生，做商人，做政客，闲时的读书。这种的读书，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人之初生，都是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并且要时时读书，不然便会鄙吝复萌，顽见俗见生满身上，一人的落伍，迂腐，冬烘，就是不肯时时读书所致。所以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一人在世上，对

于学问是这样的：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大学生自以为心理学他也念过，历史地理他亦念过，经济科学也都念过，世界文学艺术声光化电，他也念过，所以什么都懂。毕业以后，人家问他国际联盟在哪里，他说“我书上未念过”，人家又问法西斯蒂在意大利成绩如何，他也说：“我书上未念过”，所以觉得什么都不懂。到了中年，许多人娶妻生子，造洋楼，有身份，做名流，戴眼镜，留胡子，拿洋棍，沾沾自喜，那时他的世界已经固定了，女子放胸是不道德，剪发亦不道德，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读《马氏文通》是反动，节制生育是亡种逆天，提倡白话是亡国之先兆，《孝经》是孔子写的，大禹必有其人——意见非常之多而且确定不移，所以又是什么都懂。其实是此种人久不读书，鄙吝复萌所致。此种人不可与深谈。但亦有常读书的人，老当益壮，其思想每每比青年急进，就是能时时读书，所以心灵不曾化石，变为古董。

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黄山谷谓人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须知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很多，不但商界政界如此，学府中亦颇多此种人。然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官僚商贾则无妨，读书人是不合理的。所谓面目可憎，不可作面孔不漂亮解，因为并非不能奉承人家，排出笑脸，所以“可憎”胁肩谄笑，面孔漂亮，便是“可爱”。若欲求美男子小白脸，尽可于跑狗场，跳舞场，及政府衙门中求之。有漂亮脸孔，说漂亮话的政客，未必便面目不可憎。读书与面孔漂亮没有关系，因为书籍并不是雪花膏，读了便会增加你的容辉。所以面目可憎不可憎，在你如何看法。有人看美人专看脸蛋，凡有鹅脸柳眉皓齿朱唇都叫做美人。但是识趣的人若李笠翁看美人专看风韵，李笠翁所谓三分容貌有姿态等于六七分，六七分容貌乏姿态等于三四分。有人面目平常，然而谈起话来，使你觉得可爱，也有满脸脂粉的摩登伽，洋囡囡，做花瓶，做客厅装饰甚好，但一与交谈，风韵全无，便觉得索然无味。黄山谷所谓面目可憎不可

憎，亦只是指读书人之议论风采说法。若《浮生六记》的芸，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男子也是如是看法。章太炎脸孔虽不漂亮，王国维虽有一条辫子，但是他们是有风韵的，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简直可认为可爱。亦有漂亮政客，做武人的兔子姨太太，说话虽然漂亮，听了却令人作呕三日。

至于语言无味（着重“味”字），那全看你所读是什么书及读书的方法。读书读出味来，语言自然有味，语言有味，做出文章亦必有味。有人读书读了半世，亦读不出什么味儿来，那是因为读不合的书，及不得其读法。读书须先知味。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有人自幼嚼书本，老大不能通一经，便是食古不化勉强读书所致。袁中郎所谓读所好之书，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这是知味的读法。若必强读，消化不来，必生痞积胃滞诸病。

口之于味，不可强同，不能因我之所嗜好以强人。先生不能以其所好强学生去读，父亲亦不得以其所好强儿子去读。所以书不可强读，强读必无效，反而有害，这是读书之第一义。有愚人请人开一张必读书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殊不知读书须求气质相合。人之气质各有不同，英人俗语所谓“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因为听说某书是名著，因为要做通人，硬着头皮去读，结果必毫无所得。过后思之，如作一场噩梦。甚且终身视读书为畏途，提起书名来便头痛。萧伯纳说许多英国人终身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塾师强迫背诵种下的果。许多人离校以后，终身不再看诗，不看历史，亦是旨趣未到学校迫其必修所致。

所以读书不可勉强，因为学问思想是慢慢胚胎滋长出来。其滋长自有滋长的道理，如草木之荣枯，河流之转向，各有其自然之势。逆势必无成就。树木的南枝遮荫，自会向北枝发展，否则枯槁以待毙。河流过了矾石悬崖，也会转向，不是硬冲，只要顺势流下，总

有流入东海之一日。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不得不读之书。有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孔子说五十可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尚不可读《易经》。刘知幾少读古文《尚书》，挨打亦读不来，后听同学读《左传》，甚好之，求授《左传》，乃易成诵。《庄子》本是必读之书，然假使读《庄子》觉得索然无味，只好放弃，过了几年再读。对《庄子》感觉兴味然后读《庄子》，对马克思感觉兴味，然后读马克思。

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出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读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时学《易》是一种味道，五十而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凡是好书都值得重读的。自己见解愈深，学问愈进，愈读得出味道来。譬如我此时重读 Lamb 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魂灵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也许我们幼时未进小学，或进小学而未读过地理，或读地理而未觉兴味；然今日逢闽变时翻看闽浙边界地图，便觉津津有味。一人背痛，再去读范增的传，始觉趣味。或是叫许钦文在狱中读清初犯文字狱的文人传记，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程子谓《论语》读者有此等人与彼等人，有读了全然无事者，亦有读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所以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一位气质与你相近的作家，作为老师。这是所谓读书必须得力一家。不可昏头昏脑，听人戏弄，庄子亦好，荀子亦好，苏东坡亦好，程伊川亦好。一人同时爱庄荀，或同时爱苏程，是不可能的事。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必胸中感觉万分痛

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蛰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George Eliot 自叙读《卢骚自传》如触电一般。尼采师叔本华，萧伯纳师易卜生，然皆非及门弟子，而思想相承，影响极大。当二子读叔本华易卜生时，思想上起了大影响，是其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之始。因为气质性灵相近，所以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流连忘返，始可深入，深入后，然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需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这与“一见倾心”之性爱（Love at first sight）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作家，自会恨相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自乐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

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二字是骗人的话。学者每为“苦学”或“困学”二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据说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及丫头监读法。其实都是很笨。读书无兴味，昏昏欲睡，始拿锥子在股上刺一下，这是愚不可当。一人书本排在面前，有中外贤人向你说极精彩的话，尚并想睡觉，便应当去睡觉，刺股亦无益，叫丫头陪读，等打盹时唤醒你，已是下流，亦应去睡觉，不应读书。而且此法极不卫生。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若已读出书的精彩来，便不想睡觉，故无丫头唤醒之必要。深苦耐劳，淬砺奋勉是应该的，但不应视读书为苦。视读书为

苦，第一着已走了错路。天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汝以为苦，彼却沉湎以为至乐。比如一人打麻将，或如人挟妓冶游，流连忘返，寝食俱废，始读出书来。以我所知国文好的学生，都是偷看几百万言的《三国》《水浒》而来，决不是一学年读五六十页文选国文会读好的。试问在偷读《三国》《水浒》之人，读书有什么苦处？何尝算页数？好学的人，于书无所不窥，窥就是偷看。于书无所不偷看的人，大概学会成名。

有人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都是读书未入门路，未觉兴味所致。有人做不出文章，怪房间冷，怪蚊子多，怪稿纸发光，怪马路上电车声音太嘈杂，其实都是因为文思不来，写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读书，总有种种理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等待到来年。”其实读书是四季咸宜。古所谓“书淫”之人，无论何时何地可读书皆手不释卷，这样才成读书人样子。顾千里裸体读经，便是一例，即使暑气炎热，至非裸体不可，亦要读经。欧阳修在马上厕上皆可做文章，因为文思一来，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净几才可做文章。一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皆可读。而且必办到洋车上，理发室都必读书，才可以读成书。

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一自己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耘人。诗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竟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则或系汝自己学力见识未到，或果然汝是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刘知幾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赧

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见张衡范晔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知幾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滥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今龙海）人。著名学者、作家、语言学家。1916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西方研读语言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32年起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为‘论语派’代表人物。1936年居留美国，从事写作、教学，并创办《天风》月刊。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6年去台湾。一生著述颇丰，长于英文写作，风格幽默、闲适，长篇巨著也风靡一时。主要有《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自己的话》、《当代汉英词典》、《幽默小品集》和译著《卖花女》等。

说开卷有益

□郁达夫

开卷有益，是古人奖励读书的一句成语。从前读到一册坏书，读后每觉得为古人所欺；现在多了一点智识，反过来又觉得古人的不欺我了。总之，好书读了，原有所得，就是可以知道它的好处在那里，可是坏书读了，而知道它的坏的原因与地方，岂不也是一得？从前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之意，也不一定是从正的一方面着想，反过来在负的一方面，也何尝不可以为鉴戒。因此，从前是非有定评之书不读的，现在却马勃牛溲，一例的都想看看了，这大约总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著名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至192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英勇牺牲。先后主编《创造月刊》、《星洲日报·文艺副刊》。著有《沉沦》、《风铃》、《春风沉醉的晚上》、《戏剧论》、《小说论》等。今辑有《郁达夫文集》。

论学校读经

□傅斯年

记得十七八年以前，内因袁世凯暴压后之反动，外因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义渐在中国知识界中深入，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左倾，批评传统的文学，怀疑传统的伦理，这风气在当时的先锋重心固然是北京，而中山先生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实给此运动以绝大的政治动向，我们从他当时所表现的议论中清楚的看出，他是觉得专是一种文化的革新是不足的，必有政治的新生命，中国才能自立，必有政治的新方案，中国才能动转。中山先生提倡“把中国近代化”之功绩是后来中国人所万不当忘的！溯自建业建都以来，政治上要右转些，本为事理之自然，当为人情所谅解。不料中国人“如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一朝右转，乃至步步倾之不已，只弄到去年的祀孔！远史不必谈，姑谈近史。满清升孔子为大祀而满清亡，袁世凯祀孔而袁世凯毙。韩退之有句话，“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大凡国家将兴，只问苍生，国家不了，乃事鬼神，历史给我们无数的例。祀孔还不算完，接着又有读经的声浪，这事究竟演化到如何一步，我不敢知，我只替国家的前途担心。提倡革命的人们，无论左向右向的革命，总不免把主张说到极端，到极端才有强烈的气力，然而手操政权的人们，总应该用充分的知识，健强的理智，操持中道的，中道然后有安定！特别在这个千孔百疮的今日中国，应该做的是实际的事，安民的事，弄玄虚是不能救国的。

在批评读经政策之前，有几件历史事实应该知道。

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我们且一代一代的看去，周朝还没有受这些经典于前代，那时候的学问只是些礼乐射御书数的实际事件。秦朝焚书坑儒，更不必说。汉朝的缔造，一半赖高帝之武，一半赖文帝之文，高帝侮儒，文帝宗老，直到武帝才表章六经，然而茂陵一年所行，无事不与儒术相反。宣帝以后，儒术才真正流行，东海边上的读经人作师作相，汉朝也就在这时节起头不振作，直到王莽，遍天遍地都是经学。李唐创业，最表彰的老子，到了玄宗，儒学才在中天，玄宗亲自注《孝经》，玄宗也亲自听破潼关的渔阳鼙鼓。赵宋的太祖太宗都是武人，真宗像个道士，仁宗时儒术乃大行，也就从仁宗时起仰契丹如上国，有蕃夏而不能制。赵普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却不知道他之受南唐爪子金，教太宗以夺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内？明朝是开头便提倡宋元新儒学的，其结果造成些意气用事的儒生，酿成燕变而不能制。若不是当时外国人不闹，若不是永乐真有本领，中国又要沉沦了。再看偏安的南朝。南朝的第一流皇帝，一个是纯粹流氓刘寄奴，一个是高超儒生萧老公。刘寄奴到底还灭燕灭秦，光复旧物，萧老公却直弄到断送南渡以来的汉人基业。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蔑视六经、《论语》、《孟子》等之历史的价值，他们在当年自然有过极大的作用，我们的先民有这些贡献犹是我们今日可以自豪自负的。我只是说，虽在当年简单的社会里，国家创业也不是靠经学的，而一旦国家充分提倡经学，一面诚然陶冶出些好人物，一面又造成些浮文诡化的儒生。不看宋明的亡国吗？儒生纷纷降索虏，留梦炎本是状元，洪承畴更是理学人望，吴澄钱谦益则胜国之盖世文宗也。事实如此，可知在古时经学制造的人物已经是好的敌不过不好的了。或是当时若没有经术，事情更糟，也未可定，不过当时的经术并无六七十分以上的成绩，是件确定的史实。

二、当年的经学，大部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故，策论家壮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缺点虽极多，而真正用经文以“正心诚意”的，可就少了。这本也难怪，经文难懂，又不切合后代生活。所以六经以外，有比六经更有势力的书，更有作用的书。即如《贞观政要》，是一部帝王的教科书，远比《书》经有用，《太上感应篇》是一部乡绅的教科书，远比《礼记》有用，《近思录》是一部道学的教科书，远比《论语》好懂。以《春秋》教忠，远不如《正气歌》可以振人之气，以《大学》齐家，远不如《治家格言》实实在在。这都是在历史上有超过五经的作用的书。从《孝经》，直到那些劝善报应书，虽雅俗不同，却多多少少有些实际效用。六经之内，却是十分之九以上但为装点之用，文章之资的。我这些话不是我的议论，更不是我的主张，只是我叙述历史的事实。若明白这件事，便当了然读经的效用，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即就维持儒家的道德教化论，在这年五经大半也还是门面的，也还是靠别的书支持儒教。那么，在当年的社会中失败了的读经，在今日反能成功吗？

三、汉朝的经学是汉朝的哲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谏书”那里是《春秋》《三百篇》本文之所有的事。汉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学，只拿五经比附出场面来而已。宋朝的经学是宋朝的哲学，自孙复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学，再以经文附会之，岂特王安石一人而已。汉朝宋朝的经学在当时所以有力量者，正因本是思想创造的事业，本来不是纯粹的经学，所以才有动荡力。清儒之所谓汉学是纯粹的经学了，乾嘉的经学也就全无政治的道德的作用了。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今文为“康梁逆党”之学，不得用，读经乃全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用八股时，那时学堂读经的笑话真正成千成万。少年学生上此课者，如做梦一般。我不知今之主张读经者，为的是充实国文或是充实道德力量？如欲以读经充实国文，是最费气力不讨好

的；如欲以之充实道德力量，还要先有个时代哲学在。不过据六经造这时代哲学，在现在又是办不到的事了。

据以上三类历史事实看去，读经从来不曾真正独自成功过，朝代的缔造也不会真正靠它过，只不过有些愚民的帝王用它笼络学究，使得韩文公发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公式，又有些外来的君主用它破除种族见解，弄到朱文公也在那里暗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称赞金章宗！

难道相去不远的旧社会中试验二千年不曾完满成功的事，在相去如南北极的新社会中值得再去尝试吗？

以上是历史的考察，再就现在的情形论，尤觉这一面事断不可办。我的见解如下：

第一、现在中小学的儿童，非求身体健全发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减的，每日功课是不能过多的。同时，儿童青年之就学，本为养成其国民的需要，谋生的资格，自然也该把知识教育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无害的限度，以便成就其为有用之人。况且现在的世界是列国竞进的，若是我们的中小学程度比起欧美日本同等学校来不如，岂非国家永远落后，即是永远吃亏？在这又要儿童青年健康，又要他们程度不比人差的难题之下，原有的功课已嫌难于安排，若再加上一个千难万难的读经，又怎样办？挖补自儿童的身体呢？挖补自儿童的近代知识呢？

第二、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拿些教师自己半懂半不懂的东西给学生。若是教师自己说实话，“不懂”，或说“尚无人真正懂得”；诚不足以服受教者之心，若自欺欺人，强作解事，无论根据汉儒宋儒或杜撰，岂不是以学校为行诈之练习所，以读经为售欺之妙法门？凡常与欧美人接触的，或者如我一样，

不免觉得，我们这大国民有个精神上的不了之局，就是不求深解，浑沌混过；又有个可耻之事，就是信口乱说，空话连篇。西洋人并不比中国人聪明，只比我们认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以上第一件说明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第二件说明‘教不成’它。我想，这也很够反对这件事的‘充足’原理了。至于六经中的社会不同于近代，因而六经中若干立义不适用于民国，整个用它训练青年不定出什么怪样子，更是不消说的了。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觉得人文之精华萃于中国先秦，真正陋极了！

至于感觉目下中小学国文及历史教材之浅陋荒谬，我却与若干时贤同意见，这是必须赶快想法的。政府或书店还应编些嘉言集，故事集，模范人格的传记以作教训，以为启发。国文，公民，及历史的教材中，也当充实以此等有用的材料。这些材料不必以中国的为限，其中国的自不妨一部分取资于六经中之易懂的，有启发性的，不违时代的材料。这就足够了。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现代作家、历史学家。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升入本科。1918年发起成立新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团体新潮社，“五四”运动时担任北大学生总指挥。后成为右翼知识分子。曾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代理校长。1949年始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有《东北史纲》、《傅斯年选集》行世。

再论线装书

□陈西滢

世界上还没有包治百病的万应丹。平常所谓良药，用了得法固然可以起沉痾，用了不得法也许可以杀死人。世上也没有绳之万古都相宜的真理。太戈尔劝人少读书。他对于东方的文艺，虽然洞见症结，对准了毛病发药，可是说给现在的中国人听，实在如像煎了一剂催命汤。新中国诚然有许多地方用得着外国朋友的指道，可是不读书那一层是已经毋须劝驾的了，虽然不读了书也不见得就与自然相接近。

自然是要亲近的，人生是要观察的，生活是要经验的，同时书也是要读的，虽然不一定要至少读破多少卷。许多的天才是不用读什么书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博览群书的。许多的天才是没有经过学习时期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花了多少年的心血才逐渐成熟的。况且天才向来是凤毛麟角般少见的，大多数以天才自负，或是被朋友以天才见许的人也许不过是野鸡毛鹿角之类吧？自从有书已经有二千多年，这二千几百年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在艺术之园里培养了多少花草，在理智之塔上加了多少砖。谁能在艺术之园里去种一枝还不曾有过的花树，或是在理智之塔上砌上一块小石，已经尽了天才的能事。你不进园细细的赏鉴，或是不费力爬到塔顶，这希望是容易落空的。

书是要读的，可是不一定要读中国书。不但这样，努力于新文

学的人,我以为,虽然不能如吴老先生所说,完全不读线装书,也得少读线装书,多读蟹行文。我不是说中国没有优美的文学。我们的祖宗实在曾经给我们无数的宝山。只恨子孙不争气,非但不能发扬光大他们的先业,却在宝山上厌着层层砂碛,弄得我们的文学成了一种矫揉造作的虚伪的文学,与自然没有一点关连,与人生更没有一点关连。近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 讷闻式 ’的文学,因为讷闻很可以代表中国人表示情感或意见的方式。“ 不孝 □□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显妣 ’了;“ 孤哀子□□等泣血稽首稽顙 ”了;“ 苦块昏迷,语无伦次 ”了,甚而至于“ 所以不即死者,徒以有… …”了,哪一句是真话?大家明明知道这是假话,可是大家还得用它,正因为大家觉得自古以来大家就这样用。在文艺里也是如此:你自己的情感,或是没有情感,是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古人对于这事怎样的情感。所以,最美妙的文章得‘ 无一字无来历 ’结果争事模拟,陈陈相因的牢不可破,再没有半点新鲜活泼的气象。

我们觉得一个人能说一句自己心腔中的话,胜于运用一百个巧妙的典故——不用说大多数的典故是粗笨无聊的了——一个人能写一段自己亲见的风物,胜于堆砌一千句别人的典丽妩媚的文章。文学家的天才正在他的感觉特别的灵敏,表现力特别的强,他能看到人所不能见,听到人所不能闻,感受到人所不能觉察,再活泼泼地写出来。同一风景,我们不能十分领略它的美,可是读了天才的作品,他好像给了我们一双新眼睛,我们对于那风景增加了欣赏。同一人事,我们也许漠然的看过了,经天才作家的赤裸裸的一描写,我们就油然生了同情心。所以世间伟大天才的作品,我们非但不能不读,还得浸润在里面。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要模拟他们的作品,不是为了要抄袭他们的文章,只是为了要增高我们的了解力,扩充我们的同情心,使我们能够赞美自然的神秘,认识人生的正义。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样说来,线装书不是不可读,只是读的人

不得法。要是换了方法，线装书还不一样可读么？线装书本来不是不可读。就是吴老先生也不过“约三十年不读线装书”罢了。可是，第一，披沙寻金，应当是专门学者的工作，文艺作者没有那许多功夫，也不应当费许多功夫去钻求。第二，适之先生说过：“人类的性情本来是趋易避难，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古文的积弊既久，同化力非常的大，一受了它的毒，小言之，种种的烂调套语，大言之，种种的陈旧思想，就不免争向那最没有抵抗的地方挤过来。你一方面想创造新东西，一方面又时时刻刻的尽力排弃旧东西，当然非常的的经济。所以要是你想在文艺的园里开一条新路，开一片新地，最简单的方法，是暂时避开那旧有的园地，省得做许多无聊的消极的工作。将来你的新路筑成之后，尽可以回头赏鉴那旧园里的风物。

书是要读的，并且得浸润在里面，只是那得是外国书。中国人的大错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他们以为外国人胜过我们的就是在物质方面，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及别人。就是以文学来说，我们何尝胜过欧洲呢？就算中国与欧洲的文学各有它们不能比较的特点，欧洲文学也不能不作我们新文学的“因斯披里纯”他们的文学，从希腊以来，虽然古典主义也常擅势力，特殊的精神还是在尊自由，重个性，描写自然，实现人生的里面。这当然是新的文学，活的文学当取的唯一的途径。中国的文学里虽然不是没有这样的精神，例如陶渊明，李太白，也窥探过自然的神秘，杜少陵，曹雪芹，吴敬梓，也搜索过人生的意义，可是他们在几乎不变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只是沙漠中的几个小小的绿洲罢了。

我们只要一读各国的文学史，就知道文学不是循序渐进不生不灭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文艺好像是火山，最初只见烟雾，渐渐的有了火焰，继而喷火飞石，熔质四溢，极宇宙之奇观，久而久之，火势渐杀，只见烟雾，再多少时烟消雾散，只留下已过的陈迹。有些火山过了多少年便一发，所以在两个发动期之间，静止不过是休息，

有些却一发之后,不再发了。文学运动也是如此。由小而大,渐达澎湃扬厉的全盛时期,又由盛而衰,也许由衰而歇,如希腊文学一样,也许改弦更张,又达美境,这样盛衰往复,循环不已,如近代欧洲的文学。每一种运动,在崛起的时候,都有奋斗的精神,新鲜的朝气,一到了全盛之后,暮气渐渐加增,创造的精神既然消失,大家弃了根本去雕琢枝叶,舍了精神去模仿皮毛,甚而至于铺张的正是它的弊病,崇尚的正是它的流毒。在这时候,精神强健的民族,自然就有反动,它们或是回溯往古,如韩退之的“非秦汉以前之文不敢观”,或是饮别国的甘泉,去作革新运动,它们的方法虽然不同,对于已过的运动,大都不问良莠,排斥不遗余力,是一样的。复古的办法,虽然也可以一爽耳目,可是仍旧徘徊在古典文学范围之内,好像散种子在不毛之地,难望它开花结果。在别国的文学里去求“因斯披里纯”;结果却往往异常的丰美,犹之移植异方的花木,只要培养得法,往往可得色香与原来大异的美本。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这自然不过是开端,将来的收获如何,要看他们和其他作家努力的结果了。

可是很不幸的,提倡新文学的恰巧是胡适之先生,一个对于研究国故最有兴趣的人。国故是应当研究的,而且不比其余的科学不重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三期里有一篇极好的文章,把这一层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几乎没有一句话不同意。可是让顾先生胡先生去研究他们的国故好了,正如让其余的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等,好了。不幸的是胡先生是在民众心目中代表新文学运动的唯一的人物。他研究国故固然很好,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哑起来,那就糟了。新

文学运动的结果弄得北京的旧书长了几倍价——几年前百元可买的同文馆版二十四史现在得卖三百元——这是许多人常常引了来代新文学运动夸张的，可是这是我觉得最伤心的事。

陈西滢（1896—1970），江苏无锡人。现代作家、翻译家。早年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主任。与胡适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45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从此定居伦敦。主要有散文集《西滢闲话》、译作《父与子》、《梅立克小说集》等。

坚持自学 学无止境

□曹靖华

要谈我的“读书生活”，其实很简单，我只是个四年旧制中学的毕业生，中学毕业后，无钱升学，就走上谋生自学的道路。

我出生在豫西八百里伏牛山的腹地，从小就拾柴，割草，放牛，农闲时读点书。最初我跟本家一位伯父读书。那已是八十年前的事了。他教书只叫死读死背，不讲书的意思，因此读了几年，连《三字经》上头一个字；“人之初”的“人”字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那时我父亲在离家三十里路的朱阳关“义学”教书。父亲知道我的情况，就把我带到他身边，跟着他读书。这时我才真正开始了读书生活。父亲教书，要求认一个字要知道一个字的意思，不但会读，还要会用。他用同一个字（词）造各种不同的句子作比较，讲它的活用方法。那时正是清末，在方圆几百里的读书人中，父亲的思想最新，最进步。他最先接受了反清统治的新思潮，并且很推崇白话文，说白话文宣传新道理。当时开封出了一种通俗刊物《白话报》，父亲就是这刊物的传布者。那时一般读书人都瞧不起白话文，而父亲却最爱“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我也最早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新思潮。

农村里读书，一般都是半耕半读。白天劳动，有时也能读书，比如放牛时可以读书，推磨时就把书本放在磨盘上，推一圈，读一句。但多半还是利用“三余”读书的，三余者，即“冬者岁之余，夜者

日之余,雨者晴之余”冬季天寒地冻,田间无活,下雨不能下地,傍晚收工之后,都是读书的好时间。生活穷,买不起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或蘸水在方砖上练字。

我跟父亲读了几年之后,就考上县城的高小,那是全县唯一的“学府”,学制三年。小学毕业后,凑了些盘费,步行四五天到洛阳,当年称“东路”,再搭火车到省城开封投考中学。我还记得临行前,姐姐为了替我壮行,到邻居家借了一点白面,一匙油,替我包了一顿饺子。那时的旧制中学四年,中学毕业后,有钱人家的子弟都投考大学预科读两年,再入大学本科读四年。而我勉强支撑到中学毕业,无钱继续升学,我的学生生活也就从此结束。

这以后我先是到上海一家书局当校对,后来又回到安徽大通的一个小岛上教小学,一边谋生,一边自学。工余课后,别人用来吃喝玩乐的时间,我都用来读书,有一分钟时间就用在在学习上,手不释卷,持之以恒。不久,上海渔阳里成立了SY(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我被派到国外。回国后参加北伐,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年月,也坚持不懈,读书自学。起初水平低,看什么都是似懂非懂。但看不懂也硬看,无人可问,懂多少是多少,由不懂到懂,慢慢积少成多,由懂得少到懂得多。

我自学了一辈子。俗云:“学问之道无穷”,又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坚持看书,坚持自学,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紧跟着时代前进,稍一停步,就会落伍,就会被时代所抛弃。这就是我自己走过的路。没有什么秘诀,也没有什么窍门。

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县人。著名文学翻译家、散文家。曾被派往苏联留学并任教。建国后任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成就卓著。主要有《三姊妹》、《铁流》、《苏联

作家七人集》、《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契诃夫戏剧集》等，另有散文集《花》、《飞花集》。

谈读书

□朱光潜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读书，这问题实在是谈不尽，而且这些年来我的见解也有些变迁，现在再就这问题谈一回，趁便把上次谈学问有未尽的话略加补充。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工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湮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里程碑。我们就现阶段的文化学术求前进，必定根据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做出发点。如果抹煞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我们说不定要把出发点移回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纵然能前进，也还是开倒车落伍。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帐，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才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现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

一部，口诵心惟，嘴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浮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任何一种学问的书籍现在都可装满一个图书馆，其中真正绝对不可不读的基本著作往往不过数千部甚至于数部。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的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的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做学问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就成了“消耗战”。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譬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的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静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借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的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却不能割开。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目前我国一般青年学子动辄喜言专门，以至于许多专门学者对于极基本的学科毫无常识。这种风气也许是在国外大学做博士论文的先生们所酿成的。它影响到我们的大学课程，许多学系所设的科目‘专’到不近情理，在外国大学研究院里也不一定有。这好像逼吃奶的小孩去嚼肉骨，岂不是误人子弟？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在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胜兴味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使读书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我的朋友中有专读冷僻书籍，对于正经正史从未过问的，他在文学上虽有造就，但不能算是专门学者。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

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书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对于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枯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一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

读书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的要籍，一部一部地从头到尾读，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高深研究的准备。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朗书曾谈到这个方法：

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做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他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入部，是水部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段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在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预备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记笔记和做卡片的训练，宜于早下功夫。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学家。1918年考入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去英法留学。1933年回国，历任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曾任中国文联理事、全国美学学会会长。早年与丰子恺、叶圣陶等创办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代表作有《西方美学史》、《文艺心理学》、《美学批判论文集》、《诗论》，译著有黑格尔《美学》、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

读书与自动的研究

□宗白华

我们的思想、见解、学识，可以从两个源泉中得来（一）从过去学者的遗籍（二）从社会、人生与自然的直接观察。第一种思想的源泉叫做‘读书’，第二种思想的源泉叫做‘自动的研究’，或‘自动的思想’。这两种思想源泉孰优孰劣，是我今天所讨论的问题。

读书，是把古人的思想重复思想一遍。这中间有几种好处，就是（一）脑力经济：古人由无数直接经验和研究得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如科学中的种种律令，我们可以不费许多脑力，不费许多劳动就得着了。这不是很经济吗？（二）时间经济：古人用毕生的时间得着的新发现，像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律令，我们可以在一点钟的时间内就领会了，这不是很经济的吗？所以‘读书’确有很大的价值，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但是它也有很多的流弊，我们不可不知道，不可不预防。流弊中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读书读久了，安于读书，习于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渐渐的把自己‘自动研究’‘自动思想’的能力消灭了。关于这一层我记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得极透彻，我就把他书中的话，暂时代表我的自动的研究贡献诸君。

叔本华说：读书是拿他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思想。读书读久了，当会使自己的思想，不能成一个有系统的自内的发展。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许多外来的思想，这种外来思想纷呈堆积，东一块，西一块，好像一堆乱石；不比那由我们自己心中亲切体验发展出来

的思想，可以自成一个有生气的、有机体的系统。我们既常常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以读书为唯一的思索的时间，离了书本，就茫然不能思索，得了书本，就犹鱼得水，这种脑筋是没有用了，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条理的藏书楼。所以，我们要直接的向大自然的大书中读那一切真理的符号，不要专在书房中，守着古人的几篇陈言。我们要晓得古人留下来的书籍，好比是他在一片沙岸上行走时留下来的足印。我们虽可以从他这足印中看出他所行走的道路与方向；但却不能知道他在道路所看见的是些什么景物，所发生的是些什么感想；我们果真要了解这书籍中的话，获得这书籍的益，还是要自己按着这书籍所指示的道路，亲自去行走一番，直接的看这路上有些什么景物，能发生些什么感想。（按 叔本华这个譬喻，同庄子的糟粕菁华的譬喻有点相似，且更觉亲切。）

所以叔本华并不是绝对的反对读书，——他自己读书之多，在欧洲学者中要算得很稀少的——不过他极力鼓吹自动的观察，自动的思想，他还有个譬喻说得好，他说书籍中的知识，譬如武士的盾甲，一个强有力的武士，运用沉重的盾甲，可以自卫，可以攻战；一个能力薄弱的人担负了一身沉重的盾甲，反而不能行动了。所以天才能多读书而不为书籍学问所拖累；普通人多读了书，反而减少了常识，对于社会、人生、自然失去了亲切的了解，只牢记得些书本中的死知识，不能运用，不能理解。

以上我引了叔本华书本中的几句死话。他这话对不对，还要我们亲自去看。不过人家要问我 我们不去专读死书，又怎么样呢 我们怎样去自动的研究，怎样去自动的思想呢？我必答道，我们自动的研究也要有方法，有途径。不是盲动的，乱动的，乃是有条理、有步骤的活泼有趣的动作。这种动作是什么？这种动作就是科学方法的活动研究。这种活动就是走到大自然中，自动的观察，自动的归纳。从这种自由动作中得来的思想，才是创造的思想，才是真实的学问，才是亲切的知识。这是一切学术进步的途径，这是一切天才

成功的秘诀。这个途径不唯近代大科学家如是，就是古代天才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就看中国周秦时的庄子，我们从他的书中，可以知道他每天并不是坐在家中读死书，他是常常走到自然中观察一切，思想一切，到处可以触动他的灵机，发挥他的妙想。他书中引用自然现象作譬喻的非常之多。以他那种爱在自然中活动，又富于伟大的理解能力，若生于现在，知道了许多科学实验的方法与器具，不也是一个大科学家吗？但是他所得的结果也已经不小了。以我所知道的中国哲学家看来，创造的思想之丰富，恐怕要推庄子第一。

庄子是中国学术史上最与自然接近的人，最富于自动的观察的人，所以也是个最富于创造的思想的人。我们模仿他的学者人格，再具有精密的科学方法，抱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向着大自然间，作自动的研究，发挥自动的思想，恐怕这神秘万方的自然，也要悄悄的告诉我们几件未曾公开的秘密呢！

宗白华（1897—1986），江苏常熟人。哲学家、美学家、诗人。“五四”时期的新诗代表人物之一，曾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出版《三叶集》（与郭沫若、田汉的通信集）。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另著有《美学散步》、《美学与意境》，译有《判断力批判》等。

致孙伏园信^①

□徐志摩

伏园：

方才我看了《东方杂志》上译的惠尔思那篇世界十大名著，忽然想起了年前你寄给我那封青年应读书十部的征文^②，现在趁机会答复你吧。我却不愿意充前辈板着教书匠的脸沉着口音吩咐青年们说这部书应得读的，那部书不应得念的；认真的说，我们一辈子读进去的书能有几部，且不说整部的书；这一辈子真读懂了的书能有几行——真能读懂了几行书我们在这地面上短短的几十年时光也就尽够受用不是？贵国人是爱博学的，所以恭维读书人不是说是两脚书柜子，就说他读完了万卷书——只要多就可以吓人，实在你来不及读，书架上多摆几本也好，有许多人走进屋子看见书多就起敬，我以前脑筋也曾简单过来，现在学坏了，上当的机会也递减了。

我并不是完全看不起数量、面积、普及教育、平民主义等等，“看不起什么”是一种奢侈品，您得有相当的身份，我哪配？但同时我有我的癖气，单是多，单是“横阔”，单是“竖大”，是不容易吓倒我的。比如有人对我说某人学问真不错，他念了至少有二千本书——我只当没有听见。第二个朋友对我说某人的经历真不少，他环游地球好几回，什么地方都到过——我只当没有听见。第三个朋友报告我某人的交游真广，哪一个不是他的好友——我只当没有听见。反

过来说：假如我听说某人真爱柏拉图的《共和国》，他老是念不厌；或是某人真爱某城子某山某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间屋子一条街道都像是他自己的家里似的；或是某人真懂得某人全世界骂他是贼，他一个人说他是圣人；——这一说我就听见我就懂得了。到过英国的谁没有逛过大英博物院——可是先生您发现了什么；您也去过国王油画馆不是，您看中了哪几幅画？近几年我们派出去的考查团很多，在伦敦纽约的街道上常见有一群背后拖着燕子尾巴的黄脸绅士施施地走着路，像一群初放出笼的扁嘴鸭子，他们照例到什么地方一定得游玩名胜的——很好，很好，不错，不错，真不错，纽约的高楼有五十七，唔，五十八层，自由神像的脑袋里都爬得进去，我们全到过，全看过真好。你如其不知趣再要往下问时他们就到他们的抽屉里去找他们的报告书给你看，有图有表顶整齐的报告书，这里面多的是材料，真细心的调查，不错，维也纳的强迫教育比柏林的强迫教育差百分之四零二，孟赛斯德比利物浦多五十三个纱厂五十个铁厂，不错不错，我们是调查教育的，我们是调查实业的，不错不错，下面^③你到外国去，我有朋友介绍给你。

念书也有这种情形。现代的看书更是这个问题了。从前的书是手印手装手钉的，出书不容易，得书不容易，看书人也就不肯随便看过。现在不同了，书也是机器造的，一分钟可以印几千，一年出的书可以拿万来计数，还只嫌出版界迟钝，著作界沉闷哪！这来您看我们念书的人可不着了大忙？眼睛还只是一双，脑筋还只是一副，同时这世界加快了几十倍，事情加多了几十倍，我们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

再说念书也是一种冒险。什么是冒险除了凭你自己的力量与胆量到不曾去过的地方去找出一个新境界来？真爱探险真敢冒险的朋友们永远不去请教向导：他们用不着；好奇的精神便是他们的指南。念书要先生就比如游历谁^④向导；稳当是稳当了，意味可也就平淡了。结果先生愈有良心，向导愈尽责任，你得好处的机会愈

少。小孩子瞒着大人偷出去爬树，就使闪破了皮直流血他不但不嚷痛哭倒反得意的；要是在大人跟前吃了一点子小亏他就不肯随便过去，不嚷出一只大苹果来就得三块牛奶糖去补他的亏。这自走路自跌跤就不怨，是一个教育学的大原则。我妈时常调着我说你看某人的家庭不是顶好的，他们又何尝是新式；某家的夫妇当初还不是自相情愿的现在糟得不成话，谁说新式一定好老式一定坏，我就不信！我就说妈呀，你懂事，我给你打比如：年轻人恨的不是栽筋斗，他恨的是人家做好了筋斗叫他栽，让他自己做筋斗栽去，栽断了颈根他也没话说！

婚姻是大事情，读书也是大事情。要我充老前辈定下一大幅体面的书目单吩咐后辈去念，我就怕年轻人回头骂我不该做成了筋斗叫他去栽。介绍——谈何容易 介绍一个朋友，介绍一部书，介绍一件喜事——一样的负责任，一样的不容易讨好；比较的做媒老爷的责任还算是顶轻的。老太爷替你定了亲要你结婚你不愿意；不错，难道前辈替你定下了书你就愿意看了吗？

就说惠尔思先生吧。他的学问，他的见解，不是比我们高明了万倍。他也应了《京报》记者的征文，替我们选了十部名著，当然你信仰我还不如你信仰他；可是你来照他的话试试去。他的书单上第一第二就是《新旧约》书，第三种就是我们自己家有的《大学》，第四是回回的《可兰经》……得了，得了，那我早知道，那是经书教书，与我们青年人有什么相干！您看，惠尔思的书单还不曾开全早就叫你一句话踢跑了。不，就使你真有耐心赶快去买《保罗书》、《可兰经》、《中庸》、《大学》来念时，要不了十五二十分钟你不打哈欠不皱眉头才怪哪！

不，这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容易。青年人所要的是一种‘开窍’的工夫；我们做先生的是好比拿着钻子替他们“混沌”的天真开窍来了。有了窍灵性才能外现，有了窍才能看才能听才能呼吸才能闻香臭辨味道。“爱窍”不通，比如说，哪能懂得生命；“美窍”不通哪能懂

得艺术“；知识窍”不通哪能认识真理“；灵窍”不通哪会想望上帝……不成，这话愈说愈远愈不可收拾了！得想法说回来才好。记得我应得说的是哪十部书是青年人应该读的。我想起了胡适之博士定下的那一本书目，我也曾经大胆看过一遍。惭愧！十本书里至少有九本是不认识它的，碰巧那天我在他那里，他问我定的好不好，我吞了一口唾液，点点头说不错。唔，不错！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也很听他话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叫我生吞铁弹了！

所以我懂得，诱人读书是一种功德——但就这诱字难，孔夫子不可及就为他会循循的诱人进径；他决不叫人直着嗓子吞铁弹，你信不信？我喜欢柏拉图，因为他从没有替我定过书目；我恨美国的大学教授，因为他们开口是参考闭口是书。

Up! Up! my friend, and clear your books;

Why all this toil and trouble?

.....

Books! 'tis a dull and endless strife . ⑤

这是我的先生的话！你瞧，你的哪儿比得上我的！顶好是不必读书：——

Come hear the woodland linnet

How sweet his music! Oh my life.

There's more of wisdom in it. ⑥

可是留神，这不读书的受教育比读书难；明知画不成老虎你就不用画老虎；能画成狗也就不坏，最怕是你想画老虎偏像狗，成心画狗又不像狗了。上策总是做不到的；下去你就逃不了书；其实读书也不坏，就要你不靠傍先生；你要探险家就不要向导；这是中策。但中策也往往是难的，听你的下策吧。我又得打比喻。学生比如一条牛，(不要生气，这是比喻)先生是牧童哥。牧童哥知道草地在哪里，山边的草青，还是河边的草肥——牛，不知道。最知趣的牧

童就会牵了他的朋友到草青草肥的田里去，这一“领到”他的事情就完了，他可以舒舒服服的选一个荫凉的树荫下做好梦去，或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芦笛来吹它的《梅花三弄》，我们只能羡慕他的清福。至于他的朋友的口味，它爱咬什么，凤尾草还是团边草；夹金钱花的青草还是夹狗尾巴的莠草，等等，他就管不着，也不用管，就使牛先生大嚼时有牛虱来麻烦它的后部，也自有它的小尾巴照拂，再不劳牧童哥费心。

这比喻尽够条畅了不是？再往下说就是废话了。其实伏园，你这次征求的意思当作探问各家书呆子读书的口味倒是很有趣的，至于青年人实际的念书我怕这忙帮不了多少，为的是各家口味一定不同。宁波人喜欢打翻酱缸不怕口高；贵州人是很少知道盐味的；苏州人爱吃醋；杭州人爱吃臭；湖南人吃生辣椒；山东人咬大蒜，这一来你看多难，叫一大群张着大口想尝异味的青年朋友跟谁去‘试他一试’去？

湖南人学会吃辣椒，跟山东人学会吃大蒜，都没有什么，只要你吞得下，消得了；真不合适时你一口吐了去漱漱口也就完事不是？就是一句话得记在心里，舌头是你自己的，肚子也是你自己的，点菜有时不妨让人，尝味辨味是不能替代的；你的口味还得你自己去发现（比如胡先生说《九命奇冤》是一部名著你就跟着说《九命奇冤》是一部名著，其实你自己并不曾看出他名在哪里，那我就得怪你），不要借人家的口味来充你自己的口味，自骗自决不是一条通道。

我不是个书虫，我也不十分信得过我自己的口味；竟许我并不会发现我自己真的口味；但我却自喜我从来不曾上过先生的当，我宁可在黑弄里仰着头瞎摸，不肯拿鼻孔去凑人穴的铁钩^⑦。你们有看得起我愿意学我的，学这一点就够了。趁高兴……我也把我生平受益（应作受感）最深的书开出来给你们看看，不知道有没有十部：《庄子》（十四五篇）

《史记》(小半部)

道施妥奄夫斯基^⑧《罪与罚》

汤麦司哈代的《Jude the Obscure》^⑨

尼采的《Birth of Tragedy》^⑩柏拉图的《共和国》

卢骚的《忏悔录》

华尔德斐德(Walter Pater):《Renaissance》^⑪

葛德《浮士德》的前部

George Henry Lewes 的《葛德评传》^⑫

够了。

徐志摩

①原刊1925年2月16日《京报副刊》。

②时孙伏园任《京报副刊》编辑，他在1925年1月“京副”栏上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

③疑为“回”。

④疑为“请”。

⑤即“起来！起来！我的朋友，丢开你那些书本吧，干嘛要陷入这些劳作和烦恼中呢？……书本！那是一种沉闷而无休止的劳作。”

⑥即“来吧，到林中空地来倾听那红雀的啁啾，它的叫声是多么的美妙！啊，我的生命，那中间有多少智慧。

⑦‘穴’疑为‘家’。

⑧即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纪俄国大作家。

⑨即《无名的裘德》

⑩即《悲剧的诞生》

⑪即英国唯美主义理论家佩特的《文艺复兴》

⑫乔治·亨利·刘易斯，英国作家。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著名诗人、散文家、教授。

1916 年入北京大学法科学学习。1922 年留学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为“五四”时期新诗的倡导者，“新月派”代表人物。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流行。

《经典常谈》序

□朱自清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圇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

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的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甚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甚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

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1898—1948），江苏扬州人，原籍浙江绍兴。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攻读，1920年毕业。英国留学归来，任清华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晚年宁可饿死，拒绝美援，毛泽东赞曰：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著作二十余种，大都收入《朱自清文集》和《朱自清选集》。有散文名篇《荷塘月色》、《背影》等广泛流传。

读书并非为黄金

——我的不读书的经验

□孙福熙

中国人太把‘读书’看得严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说法，先认读书为苦不可耐，于是用黄金利禄来引诱，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意思。

本刊征求我读书的经验，我不敢以读书人自居（虽然读书人的“书生气”的坏处依然是很多），我能说的不是读书的经验，而是不读书的经验。

我三周岁以后就读书，读书这样早，完全因为我幼年时太活泼，毁坏了许多东西的缘故。一直到十二岁，全是旧式灌注的教育，除了识字的成绩以外，到现在是毫无益处。因为读书没有趣味的缘故，此后入学校，直至师范学校毕业为止，凡有书本的功课我都不大喜欢。所喜欢的是手工图画以及书本以外兼有实物的理化博物。再后则半工半读或者整日工作而夜间自己读书而已。

尤其是在法国的时候，因为经济的能力是不能读书的，所以，一方面分出时间去工作，一方面又节省读书应有的一切工具与方法，欲读书而不可得了。没有人教我法文，为了节省起见，不懂一句法文，就进美术学校学画去了。自己看看法文书，弄出许多的错误。为了这个缘故，我的一点知识，都与事实有关，例如法文中的“兰花”一字，是同学在公园中告我的，所以至今联想到这同学与公园，“延长”一字联想下雨与房东老太婆，因为并不是从读书得来，所以我没有什么字是可以联想书本的。

这该是很大的耻辱。

不但如此，许多人是先读了书，后来证之事实，惊叹古人深思明辨，于是豁然贯通地说一声：“此诚所谓‘学于古训乃有获，监于成宪永无愆’也。”

而我则不然，我的肚皮里没有书，没有把有系统的书本知识作为辨别事理的根据，每遇到事物上有疑问，只得乱翻书本来求解答而已。

我以为，中国人把读书看得太苦亦太尊贵了，于是与世界事物脱离了关系。读书与散步、踢球、看电影、游山玩水，并不冲突，而且是互有补益。（大学生天天进跳舞场未必有益，但偶然去一次，未必带回满身的恶果，这全在自己的处置如何耳）。

我觉得，一个法国人走进图书馆去，简直同走进戏院电影场去是一样的性质。星期或假日，不必工作的时候，法国人就要利用这一天时间，作有益身心之事。我不是说法国人愚笨，肯以读书苦事视为看看看电影一样的快乐；我要说的是读书得法的时候，与戏剧电影之后发知识，涵养德性，陶冶情感的消遣性质者，完全是一样的。

中国的电影太受美国影响的缘故，游嬉的性质太多，学术的意味太少了。

反之，中国的读书，或者说，学术的意味太多，而引动趣味太少，内容则平板陈腐，文字则枯燥生硬，虽有黄金利禄的引诱，天下尽有未用读书作“敲门砖”而骗到了黄金与利禄者。

著书者与读书者的态度都可以改变一下。

孙福熙(1898—1962)，浙江绍兴人。现代画家、散文家。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后经鲁迅介绍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1920年后曾两次留学法国学习绘画和文学。建国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山野掇拾》、《归航》、《北京乎》、《春城》等。通行本有《孙福熙散文》。

谈谈怎样读书

□王 力

首先谈谈什么书。

中国的书是很多的，光古书也浩如烟海，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读书要有选择。清末张之洞写了一本书叫《书目答问》，是为他的学生写的，他的学生等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他说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给这些学生指出一个门径，从何入手；第二个目的是要他们选择良莠，即好不好，好的书才念，不好的书不念；第三个目的是分门别类，再加些注解，以帮助学生念书。从《书目答问》看，读书就有个选择的问题，好书才读，不好的就不用读。他开的书单于是很长的，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把他提到的书都读过也不可能，今天读书恐怕要比《书目答问》提出的书少得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此，选择书很重要。不加选择，如果读的是一本没有用处的书，或者是一本坏书，那就是浪费时间。不只是浪费时间，有时还接受些错误的东西。到底读什么不读什么？这要根据各人的专业来定。如对搞汉语史的来说，倘若一本书是专门研究六书的，或者专门研究什么叫转注的，像这样的书就不必读，因为对研究汉语史没什么帮助。而像《说文段注》、《马氏文通》这样的书就不可不读了。因为《马氏文通》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语法书，而读了《说文段注》，对《说文解字》就容易理解多了，这对研究汉语史很有帮助。读书要有选择，这是第一点，可以叫去粗取精。

第二点叫由博返约。对于由博返约，现在大家不很注意，所以要讲一讲。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别的书我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陷于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这题目也相当尖，但只写论文了，别的书都没念，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将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搞汉语史的，除了关于汉语史的一些书要读，还有很多别的书也要读，首先是历史，其次是文学。多了，还是应该由博到专，即所谓由博返约。

第三点，要厚今薄古。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从前人的书，如果有好的，现代人已经研究，并加以总结发挥了。我们念今人的书，古人的书也包括在里边了。如果这书质量不高，没什么价值，那就大可不必念。《书目答问》就曾提到过这一点，他说他选的大多是清朝的书，有些古书，也是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比如经书，十三经，也是经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从前，好的书，经清朝人整理就行了，不好的书，清朝人就不管它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意思。他的话可适用于现在，并不需要把很多古书都读完，那也做不到。

再谈谈怎样读书。

首先应读书的序例，即序文和凡例。过去我们有个坏习惯，以为看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其实序例里有很多好东西。序例常常讲到写书的纲领、目的。替别人作序的，还讲书的优点。凡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些都很好，而我们常常忽略。《说文》的序是在最后的，我建议你们念《说文段注》把序提到前面来念。

《说文序》，段玉裁也加了注，更应该念，《说文段注》有王念孙的序，很重要，主要讲《说文段注》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作者讲究音韵，掌握了古音，能从音到义。王序把段注整部书的优点都讲了。再如《马氏文通》序和凡例是很好的东西，序里有句话：“会集众字以成

文,其道终不变。’意思是说许多单词集合起来就成文章了,它的道理永远不变。他上面讲到了字形常有变化,字音也常有变化,只有语法自始至终是一样的。当然,他这话并不全面,语法也会有变化的,但他讲了一个道理,即语法的稳定性。我们的语法自古至今变化不大,比起语音的变化差得远,语法有它的稳定性。另外,序里还有一句话:“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这句意思是说研究语法,首先要分词类,然后是这些词跟词怎么搭配成为句子。语法就是讲这个东西,这句话把语法的定义下了,这定义至少对汉语是适用的。《马氏文通》的凡例更重要。里边说,《孟子》有两句话:“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之’是‘他’的意思;‘其’也是‘他’的意思。为什么不能互换呢?又如《论语》里有两句话:“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两句格式很相像,为什么一句用‘之’,一句用‘焉’?《论语》里还有两句话:“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则未之学也。”这两句话也差不多,为什么一句用‘矣’,一句用‘也’呢?这你就非懂语法不可。不懂,这句话就不能解释。从前人念书,都不懂这些,谁也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来,更不知怎么解答了。这些问题从语法上很好解释,根据马氏的说法,参照我的意见,可以这样解释:“亲之欲其贵也,……”为什么“之”“其”不能互换,因为“之”只能用作宾语;“其”相反,不能用作宾语。“之”“其”的任务是区别开的,所以不能互换。“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为什么前一句用‘之’,后一句用‘焉’?因为‘爱’是及物动词,“忠”是不及物动词;‘爱’及物,用‘之’;‘之’是直接宾语;“忠”不及物,只能用‘焉’,因为‘焉’是间接宾语。再有“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则未之学也。”矣’是表示既成事实,事情已完成;“未之学也”,是说这事没完成,没这事,所以不能用‘矣’,只能用‘也’。凡没完成的事,只能用‘也’,不能用‘矣’。从语法讲,很清楚。不懂语法,古汉语无从解释。他这样一个凡例有什么好处呢?说明了人们为什么要学语法,他为什么要写一本语法书。不单是

《说文段注》和《马氏文通》这两部书,别的书也一样,看书必须十分注意序文和凡例。

其次,要摘要作笔记。现在人们喜欢在书的旁边圈点,表示重要。这很好,但是还不够。最好把重要的地方抄下来。这有什么好处呢 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一本书,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不重要,你看不出来,那就劳而无功,你白念了。现在有些人念书能把有用的东西吸收进去,有的人并没有吸收进去,看了就都忘了。为什么?因为他就知道看,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好的,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最精彩的,即张之洞所谓的要领,他不知道,这个书就白念了。有些人就知道死记硬背,背得很多,背下来有没有用处呢?也还是没有用处。这叫劳而无功。有些人并不死记硬背,有些地方甚至马马虎虎就看过去了,但念到重要的地方,他就一点不放过,把它记下来。所以,读书要摘要作笔记。

第三点,应考虑试着作眉批,在书的天头上加自己的评论。看一本书如果自己一点意见都没有,可以说你没有好好看。你好好看的时候,总会有些意见的。所以,最好在书眉,又叫天头,即书上空的地方作些眉批。试试看,我觉得这本书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合适,都可以加上评论。昨天,我看从前我念过的那本《马氏文通》,看到上面都写有眉批,那时我才二十六岁。我在某一点不同意书的意见,有我的看法,就都写在上边了。今天拿来看,拿五十年前批的来看,有些批的是对的,有些批错了,但没关系,因为经过了你自己的考虑。批人家,你自己就得用一番心思,这样,对那本书的印象就特别深。自己作眉批,可以帮你读书,帮你把书的内容吸收进去。现在,我们自己买不到书,也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把笔记和书评结合在一起,把书评写在笔记里,这样很方便。用笔记本一方面把重要的记下来,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我不同意书里的讲法,可以写上一段自己的看法,表示自己的意思。把笔记眉批

并为一个东西。

另外，要写读书报告，如果你作了笔记，又作了眉批以后，读书报告就很好写了。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一篇很好的读书报告，就是赵振铎的《读〈广雅疏证〉》，可以向他学习。《广雅疏证》是怎么写的，有什么优点，他都讲到了。像这样写个读书报告就很好，好的读书报告简直就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人。现代著名语言学家。1925年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留学法国，获博士学位。先后在清华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校任教。1954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学术专著《汉语史稿》、《古代汉语》、《汉语诗律学》，杂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著作汇编为《王力文集》行世。

忆读书

□冰 心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就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便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就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时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

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迫民反’的《水浒传》大加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勉强强地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若有所失”的无聊情绪。

到得我十一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有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岁时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八〇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

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榜》，看了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乏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那怕只有几百上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己！

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有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几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家、文学翻译家。五四时期即开始文学创作。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其间写成著名的书信体散文《寄小读者》。回国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写作。其散文清新流畅，含蓄隽永，有极高的成就。作品主要有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小橘灯》、《樱花赞》，译作《泰戈尔剧作集》、《印度童话集》等。现有《冰心选集》、《冰心文集》行世。

读书的意义

□俞平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仅有关连，是一桩事情的两种看法而已。游历者，活动的书本。读书则曰卧游，山川如指掌，古今如对面，乃广义的游览。现在，因交通工具的方便，走几万里路不算什么，读万卷书的日见其少了。当有种种的原因，最浅显的看法，是读书的动机环境空气无不缺乏。

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为功名富贵，依目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要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这无怪喜欢读书，懂得怎样读的人一天一天的减少了。读书空气的稀薄，读书种子的稀少，互为因果循环。

现在有一些人，你对他说身心性命则以为迂阔，对他说因果报应则以为荒谬，对他说风花雪月则以为无聊。不错，是迂阔，荒谬，无聊。你试问他，不迂阔，不荒谬，不无聊的是啥？他会有种种漂亮的说法。但你不可过于信他，他只是要钱而已。文言谓之好利。有一个故事，不见得靠得住，只可以算笑话。乾隆帝下江南，在金山寺登高，望见江中大大小小的船，戏问随銮的纪晓岚，共有几只。这原是难题，拿来开玩笑的，若回答说不知道，那未免杀风景。纪回答得好，臣只见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在那时，这故事讽刺世情已觉刻露，但现在看来，不免古色古香。意存忠厚，应该

对答皇帝道，只有一条船。

好利之心压倒一切，非一朝一夕之故。古人说：“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利是遥远的古话。退一步说，以名为利。然名利双收，话虽好听，利必不大。惟有不恤声名的干，以利为利，始专而且厚。道德名誉的观念本多半从书本中来，不恤声名与不好读书亦有相互的关连。

在这一味好利的空气中寻求读书乐，岂不难于上青天，除非我们把两者混合。假如我们能够立一种制度，使天下之俊秀求官位利禄之途必出于读书，近乎从前科举的办法，这或者还有人肯下十载寒窗的苦功，严格说来，这已失却读书的真意义，何况这制度的确立还遥遥无期。

现在有一种情形，这十年以来，说得远一点，二三十年以来都如此，就是国文程度显著的低落，别字广泛地流行着，在各级学校任教的，人人皆知，人人皱眉头痛，认为不大好办的事情。这严重的光景，不仅象征着读书阶级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生长。

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我们常夸说神州立国几千年，华夏提封数万里，这种时空的超卓并不必由于天赋，实半出于人为，皆先民积久辛勤努力所致，我们应如何欢喜惭愧，却不可有恃无恐。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从时间说，我们读古书如《论语》，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那不必提周秦两汉，就是唐宋，也就很遥远而隔膜，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再从空间说，北自满洲，南迄岭海，虽分南北中三部，细分还有更多的区域，然而中国始终只是一个，譬如说广东话与北京话完全两样，而

纸上文字完全一致。我国屡经外夷侵略，或暂被征服，而于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不失者，上面已表过是先民血汗的成绩，而在民族的团结上，文字确也帮忙不少。历史事实具在，不容易否认的。

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自非好作危言耸人听闻，废书不读可谓今日之流行病。用功的人难道没有？即有少数的人好学潜修也不足挽回这颓风。即以学校教育而论，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课业，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我不敢轻量天下之士，武断地说或者不多罢。如何使人安心向学，对读书感到兴味，似是小事，却是牵连社会生计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了。

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人。文史学家、红学专家、诗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曾加入北京大学新潮社，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一员。任北京大学教授，教授中国文学多年。著有《红楼梦研究》、《读词偶得》等。

读书苦 读书乐？

□ 梁实秋

从开蒙说起

读书苦 读书乐？一言难尽。

从前读书自识字起。开蒙时首先是念字号，方块纸上写大字，一天读三五个，慢慢增加到十来个，先是由父母手写，后来书局也有印制成盒的，背面还往往有画图，名曰看图识字。小孩子淘气，谁肯沉下心来一遍一遍地认识那几个单字？若不是靠父母的抚慰，甚至糖果的奖诱，我想孩子开始识字时不会有多大的乐趣。

光是认字还不够，需要练习写字，于是以描红模子开始，“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再不就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或是“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洞中才一日，世上几千年”。手搦毛笔管，硬是不听使唤，若不是先由父母把着小手写，多半就会描出一串串的大墨猪。事实上，没有一次写字不曾打翻墨盒砚台弄得满手乌黑，狼藉不堪。稍后写小楷，白折子乌丝栏，写上三五行就觉得很吃力。大致说来，写字还算是愉快的事。

进过私塾或从“人，手，足，刀，尺”读过初小教科书的人，对于体罚一事大概不觉陌生。念背打三部曲，是我们传统的教学法。一目十行而能牢记于心，那是天才的行径。普通智商的儿童，非打是

很难背诵如流的。英国十八世纪的约翰孙博士就赞成体罚，他说那是最直截了当的教学法，颇合于我们所谓‘扑作教刑’之意。私塾老师大概都爱抽旱烟，一二尺长的旱烟袋总是随时不离手的，那烟袋锅子最可怕，白铜制，如果孩子背书疙疙瘩瘩的上气不接下气，当心那烟袋锅子敲在脑袋壳上，砰的一声就是一个大疱。谁疼谁知道。小学教室讲台桌子抽屉里通常藏有戒尺一条，古所谓榎梃，也就是竹板一块，打在手掌上其声清脆，感觉是又热又辣又麻又疼。早年的孩子没尝过打手板的滋味的大概不太多。如今体罚悬为禁例，偶一为之便会成为新闻。现代的孩子比较有福了。

从前的孩子认字，全凭记忆，记不住便要硬打进去。如今的孩子读书，开端第一册是先学注音符号，这是一大改革。本来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我们的文字不是拼音的，虽然其中一部分是形声字，究竟无法看字即能读出声音，或是发音即能写出文字。注音符号（比反切高明多了）是帮助把语言文字合而为一的一种工具，对于儿童读书实在是无比的方便。我们中国的文字不是没有严密的体系，所谓六书即是一套提纲挈领的理论，虽然号称‘小学’，小学生谁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说文解字》五百四十个部首就会使得人晕头转向。章太炎编了一个‘部首歌’：‘一、上、示、三、王、玉、珏……’煞费苦心，谁能背得上来。陈独秀编了一部《小学识字读本》（台湾印行改名为《文字新论》），是文字学方面一部杰出的大作，但是显然不是适合小学识字的读本。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说难不难，说易不易，高本汉说过这样一段话——

北京语实在是一种最可怜的方言，总共只有四百二十个音缀；普通的语词有不下四千个，这四千多个的语词，统须支配于四百二十个音缀当中。同音语词的增进，使听受者受了极大的困难，于此也可以想见了……（见《中国语与中国文》）

这是外国人对外国人所说的话。我们中国儿童国语娴熟，四声准确，并不觉得北京语“可怜”。我们的困难不在语言，在语言与文字之间的不易沟通。所以读书从注音符号开始，这方法是绝对正确的。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旧式的启蒙的教材。《百家姓》有其实用价值，对初学并不相宜，且置勿论。《三字经》《千字文》都编得不错，内容丰富妥当，而且文字简练，应该是很好的教材，所以直至今日还有人怀念这两部匠心独运的著作，但是对于儿童并不相宜。孩子懂得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1912年，我在北平陶氏学堂读过一个时期的小学，记得国文一课是由老师领头高吟“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全班一遍遍地循声朗诵，老师喉咙干了，就指派一个学生（班长之类）代表他领头高吟。朗诵一个小时，下课。好多首《诗经》作品就是这样的注入我的记忆，可是过了五六十年之后自己摸索才略知那几首诗的大意，小时候多少时间都浪费掉了。教我读《诗经》的那位老师的姓名已不记得，他那副不讨人敬爱的音容道貌至今不能忘！

新式的语文教科书顾及儿童心理及生活环境，读起来自然较有趣味。1912年的国文教科书，“一人二手，开门见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老人，入市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这一类课文还多少带有一点文言的味道。后来仿效西人的作风，就有了“小猫叫，小狗跳……”一类的句子，为某些人所诟病。其实孩子喜欢小动物，由此而入读书识字之门，亦未可厚非。抗战初期我曾负责主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深知其中艰苦，大概越是初级的越是难于编写，因为牵涉到儿童心理与教学方法。现在台湾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无论在内容上或印刷上较前都日益进步，学生面对这样的教科书至少应该不至于望而生畏。

纪律与兴趣

高中与大学一二年级是读书求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现在所谓读书,和从前所谓‘读圣贤书’意义不同,所读之书范围较广,学有各门各科,书有各种各类。但是国、英、算是基本学科,这三门不读好,以后荆棘丛生,一无是处。而这三门课,全无速成之方,必须按部就班,耐着性子苦熬。读书是一种纪律,谈不到什么兴趣。

梁启超先生是我所敬仰的一位学者,他的一篇《学问与兴趣》广受大众欢迎,很多人读书全凭兴趣,无形中受了此文的影响。我也是他所影响到的一个。我在清华读书,窃自比附于‘少小爱文辞’之列,对于数学不屑一顾,以为性情不近,自甘暴弃,勉强及格而已。留学国外,学校当局强迫我补修立体几何及三角二课,我这才知道发愤补修。可巧我所遇到的数学教师,是真正循循善诱的一个人,他讲解一条定律一项原理,不厌其详,远譬近喻的要学生彻底理解而后已。因此我在这两门课中居然培养出兴趣,得到优异的成绩,蒙准免予参加期终考试。我举这一个例,为的说明一件事,吾人读书上课,无所谓性情近与不近,无所谓有无兴趣。读书上课就是纪律,越是自己不喜欢的学科,越要加倍鞭策自己努力钻研。克制自己欲望的这套功夫,要从小时候开始锻炼。读书求学,自有一条正路可循,由不得自己任性。梁启超先生所倡导趣味之说,是对有志研究学问的人士说教,不是对读书求学的青年致词。

一般人称大学为最高学府,易令人滋生误解,大学只是又一读书求学的阶段,直到毕业之日才可称之为做学问的‘开始’。大学仍然是一个准备阶段,大学所讲授的仍然是基本知识。所以大学生在读书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凡是课程规定的以及教师指定的读物都是必须读的,青年人常有反抗的心理,越是规定必须读的,越是不愿去读,宁愿自己去海阔天空的穷搜冥讨。到头来是枉费精

力自己吃亏，五四时代我还是个学生，求知的欲望很盛，反抗的情绪很强，亦曾有志于读书而不知所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不足以履所望。有一天几个同学和我以《清华周刊》记者的名义进城去就教于北大的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慨允为我们开一个最低的国学必读书目，后来就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内容非常充实，名为最低，实则庞大得惊人。梁启超先生看到了，凭他渊博的学识开了一个更详尽的书目。没有人能按图索骥地去读，能约略翻阅一遍认识其中较重要的人名书名就很不错了。吴稚晖先生看到这两个书目，气得发出一切线装书都该丢进茅坑里去的名言！现在想想，我们当时惹出来的这个书目风波，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罢了。我们的举动表示我们不肯枯守学校规定的读书纪律，而对于更广泛更自由的读书的要求开始展露了天真的兴趣。

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到三十岁左右开始以教书为业的时候，发现自己学识不足，读书太少，应该确有把握的题目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缺口，自己没有全部搞通，如何可以教人？既已荒疏于前，只好恶补于后，而恶补亦非易事。我忘记是谁写的一副对联：“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很有意思，下句好像是左宗棠的，上句不知是谁的。这副对联表面上语气很谦逊，细味之则自视甚高。以上句而论，天下之书浩如烟海，当然无法遍读，而居然发现自己尚有未曾读过之书，则其已经读过之书必已不在少数，这口气何等狂傲！我爱这句话，不是因为我也感染了几分狂傲，而是因为我确实知道自己的谫陋，许多该读而未读的书太多，故此时时记挂着这句名言，勉励自己用功。

我自三十岁才知道自动的读书恶补。恶补之道首要的是先开

列书目，何者宜优先研读，何者宜稍加参阅，版本问题也是非常重要。此时我因兼任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长，一切均在草创，经费甚为充足，除了国文系以外各系申请购书并不踊跃，我乃利用机会在英国文学图书方面广事购储。标准版本的重要典籍以及参考用书乃大致齐全。有了书并不等于问题解决，要逐步一本一本地看。我哪里有充分时间读书？我当时最羡慕英国诗人米尔顿，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听从他父亲的安排到郝尔顿乡下别墅下帷读书五年之久，大有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之慨，然后他才出而问世。我的父亲也曾经对我有过类似的愿望，愿我苦读几年书，但是格于环境，事与愿违。我一面教书，一面恶补有关的图书，真所谓是困而后学。例如莎士比亚剧本，我当时熟悉的不超过三分之一，例如米尔顿，我只读过前六卷。这重大的缺失，以后才得慢慢弥补过来。至于国学方面更是多少年茫然不知如何下手。

读书乐

读书好像是苦事，小时嬉戏，谁爱读书？既读书，还要经过无数次的考试，面临威胁，担惊害怕。长大就业之后，不想奋发精进则已，否则仍然要继续读书，我从前认识一位银行家，整日价筹划盈虚，但是他床头摆着一套英译《法朗士全集》，每晚翻阅几页，日久读毕全书，引以为乐。官场中、商场中有不少可敬的人物，品位很高，嗜读不倦，可见到处都有读书种子，以读书为乐，并非全是只知道争权夺利之辈。我们中国自古就重视读书，据说秦始皇日读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公文才就寝。《鹤林玉露》载：“唐张参为国子司业，手写九经，每言读书不如写书。高宗以万乘之尊，万畿之繁，乃亦亲洒宸翰，遍写九经，云章粲然，始终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从前没有印刷的时候讲究抄书，抄书一遍比读书一遍还要受用。如今印

刷发达,得书容易,又有缩印影印之术,无辗转抄写之烦,读书之乐乃大为增加。想想从前所谓‘学富五车’,是指以牛车载竹简,仅等于今之十万字弱。纪元前一千年以羊皮纸抄写一部《圣经》需要三百张羊皮!那时候图书馆里的书是用铁链锁在桌上的!《听雨纪谈》有一段话:

苏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曰:“予犹及见老儒先生言其少时,《史记》《汉书》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诸子百家,转相摹刻,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其文辞学术当倍蓰昔人。而后学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苏公此言切中今时学者之病,盖古人书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录。盖以其得之之难故,其读亦不苟。至唐世始有板刻,至宋而益盛,虽云便于学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读,或读之而不灭裂,则以有板刻之故。无怪乎今之不如古也。

其言虽似言之成理,但其结论今不如古则非事实。今日书多易得,有便于学子,读书之乐岂古人之所能想象。今之读书人所面临之一大问题乃图书之选择。开卷有益,实未必然,即有益之书其价值亦大有差别。罗斯金说得好:“所有的书可分为两大类:风行一时的书与永久不朽的书。”我们的时间有限,读书当有选择。各人志趣不同,当读之书自然亦异,惟有一共同标准可适用于我们全体国人。凡是中国人皆应熟读我国之经典,如《诗》、《书》、《礼》,以及《论语》、《孟子》,再如《春秋左氏传》、《史记》、《汉书》以及《资治通鉴》或近人所著《通史》,这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之所寄。如谓文字艰深,则多有今注今译之版本在。其他如子集之类,则各随所愿。

人生苦短,而应读之书太多。人生到了一个境界,读书不是为了应付外界需求,不是为人,是为己,是为了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吾故曰:读书

乐。我想起英国十八世纪诗人一句诗——

“ Stuff the head

With all such reading as was never read ”

大意是：“把从未读过的书籍,赶快塞进脑袋里去。”

梁实秋(1902—1987)，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生于北京。著名文学评论家、翻译家。1926年留美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授。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苦茶》、《新月》月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等，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多次撰文论战。1934年任北京大学英文系研究教授，后兼任系主任，同时主编《自由评论》。1949年去台湾，晚年致力于文学翻译。主要学术成就是，撰写文学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偏见集》、《看云集》、《文学的纪律》，译著《莎士比亚全集》，主编大型双语辞典《远东英汉大辞典》等。

买 书

口叶公超

以译《鲁拜集》传名于后世的 Fitzgerald 有一天呆坐在他的小书房里，怒视着围绕他的书。愤怒之下，致书友人云：“我写这信告诉你我最近的决断。我想把所有的书都卖去，或烧去，只留下圣经、字典、失乐园、颇普的诗各一部，放在我书案上，最好都就在手边，那样，我再不会找不着我要用的书了，至少我会知道我此处只有这四部书，别的，世间别的书都在别处，不在我的书架上。你一定觉得可笑，假使我告诉你我刚才白生一阵气，找了半天一部我并没有的书……我忽感到我书架上无用的书实在太多了……”这是一八七三年写的，这位先生已然是六十四岁了。他买了我想至少有四十年的书才悟到这步，未免令人感觉此道之难也。最苦恼的是，他决不忍真的卖去这些“无用”的书的，至于烧那更不必追究了。不卖不烧就是继续的保存着它们的“无用”，其实也就是它们的“用”。书的有用与无用者不在书而在人。人用着它，它便有用，大有“相公厚我，我厚相公”之势；人用不着它，它便无用，顿时变成寄生虫一般的可恶，甚至要为人变卖，付焚，其潦倒狼狈之状犹不能击动我们的同情与容忍。我要替书说句公道话：不要这样没有良心，书是有生命的东西，有脉搏有知觉的朋友。朋友也只是一时之用，或仅仅一度的关系，但日后遇见总不免打个招呼，甚而停下寒暄一阵。你想他总算朋友，他想你居然以朋友看待，于是彼此拿出笑容，彼此容忍，彼此

拉手再见。这样之后,便算朋友了。既为朋友,见面自必招呼,自必寒暄,自必拿出笑容,自必容忍。书从铺里到我们的架上不能说不是一度的关系,至少你曾看过它,看过之后,或敬它,或爱它,或憎它,或恨它。既有这种经过,我便主张容忍它与你的关系。

藏书家我想一定不会有这种麻烦,至少如汲古阁、海源阁、丽宋楼等等的主人们决不是我们这样慈悲的善心人。在他们,取舍一经决定似乎就不再有别的问题了,除非后来发现自己被骗了,但这也容易解决,只是难过而已。买书来看,或预备来看的人,久而久之总得容忍一些‘此刻无用’的朋友们,否则一面买,一面卖,或一面烧,生活更不堪忍受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已。同样困难的还有买什么或先买什么再买什么;对于愤于树立原则的人,就是,哪类的书应当自己买,哪类的书应当到图书馆去借。这样一来,问题马上就严重起来了。古人没有图书馆的方便,反倒容易处置:有钱见着要的书就买,买了不用,安排在架上,望望也好,再为子孙留下一点书香,更觉可为。二十世纪的读书人可苦了。除非你住的靠近伦敦博物院,或国会图书馆,或牛津博得利安,总有你要的书图书馆没有的。就是明知道它有,你也未必总愿意去借,况且还有许多不许你借回家的书,而惯于在孤静的斗室中看书的你又不肯天天按着钟点到那公众阅览室里去看。同时,个人的经济能力又有限,禁不住要妄想买到一部永久有用的书。前几年我曾把个人的书分放在三面书架上,一面是要读的各种书,一面是备查的参考书,再一面是既不读又不查的书。我当时并且立下一条原则:参考书以后不买了,不读不查的书决不买,要读的书,非读不可的,先到图书馆去借,没有,再决定买不买。今天,三年后,三面书架上的书已不分彼此了,同时放不下的书又另占了一整面墙的架子。关于买书,我如今只有感慨,没有原则了。

美，获哈佛大学与剑桥大学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教授。1949 至 1958 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后为台湾驻美国“大使”、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有《中国古代文化生活》，另刊有《叶公超文集》等。

读书与生活

□李霁野

到白沙来,原是应了朋友的约,来看看梅花的,听说有三百棵,很羡慕诸位的幸福。不料却有同学来找我演讲,我不免叹了一口气,心想说书的命,到甚么地方也逃不脱。不过我实在没有甚么可说,因为我只带来一个空空的脑袋,预备装满了好风景,好印象回去;却原来也要付代价。这年头,穷日子真难过。幸而听几位先生说,诸位很爱读书,我因此想到现在要讲题目。诸位也许笑我:“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想这样笑我是不应该的,因为读书也罢,生活也罢,我都外行得很。现在纠缠到一块来说,恐怕更说不好了。

听一般人的说话,读书仿佛是怪令人头痛的事情。不是“一部廿四史无从读起”,分量太多,就是天气不好;“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又凉来冬又冷,收拾书包好过年。”——这首好诗,别处的学生听说都是很心会的。说是进学堂读书来的,为甚么这样为难呢?我想,现在的教育制度要负一部分责任:拿死的知识填塞了之后,再拿考试来测量结果,不要几年,学生就变为完全被动的了,读书的兴趣也被消灭。我记得自己在学校读英文时,先生曾经用过几种英国文学名著作教本,结果我往往想到这些书的颜色和样式便觉得厌恶。我这样怀着偏见来厌恶的,有那位“写起文章来像天使”的高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以后我每看他的文章,特别看到他那聪明的高额头,便觉得怪对他不住。连对莎士比

亚（William Shakespeare）我都表示过不敬，诸位就想一想这些教育家的本事！幸而我自己碰到一本《天方夜谭》，使我对外国文的兴趣，没有完全被闷死。从此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在课堂上虽然不免常打盹，课外却往往懒得睡觉。我用不着再听先生三番五次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或“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知道他们只使我见到“颜如铁”，我倒不如闭眼念几声佛。我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怎样，不过我相信在塞与考两重夹板中间，总压不出很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要想培养读书的兴趣，非将态度根本改变了不可。读书不是要应付考试，不是要敷衍外来的要求，却是要满足内心的需要，充实自己的生活。换了话说，读书必须是自己的有机的一部分。必须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熔为一炉。若是书和生活经验发生了亲切的关系，书便有了味道，变为知己的朋友一样了。若是生活经验从读书扩大推广，充实的机会就无限的增多了。书将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根本改变，是常有的例子。反之，生活的经验越丰富，读书的欣赏和理解力也就越深广，也就越能领略书中的真味。所以读书与生活是相辅相成的，必须两者并进，才可以达到佳境。光读书而无生活，只尝得到间接的经验，和吃嚼过的饭差不多；光生活而不读书，却势必空虚，狭小。

我现在来举几个小小的例子，说明我这一点点的意思。我说读书可以增广加深生活的经验，因为名著是最好的感情和思想的结晶，我们可以从其中吸收无穷的精神的养料。很平常的东西，经过名著的作者，特别是诗人，描写之后，便有了意味，在读者的心中形成了联想。这样的诗句便成了“Open Sesame”（《阿利巴巴与四十大盗》中开门的咒语）一样的咒语，可以替读者打开了珍贵的宝库。诸位知道，罗马有一位大诗人维吉尔（veigil），他在中世纪被人认为魔术师，因为他的半行一行的诗，往往可以在读者心里唤起无穷的联想，仿佛是咒语一样。

最近翻译吉辛（George Gissing）的《四季随笔》（The private pa-

pers of Henry Ryecroft)，其中有一段将这个意思讲得最好。他引约翰生(Samuol Johnson)的话：在读过书和没有读过书的人之间，同死人与活人之间，有同样大的差别。接着他说蝙蝠和枭鸟，若不是因为入了诗人的世界，他也许看到它们，听到它们，只怀着厌恶或迷信。可是，

Then nightly sings the staring owl

To—whit!

To—who! —a merry note

(凝目的枭鸟夜夜歌唱着，

To—whit!

To—who—欢快的歌调。)

On the bat's back I do fly

After Summer merrily

(我在蝙蝠的背上飞来飞去，

快快乐乐地过着夏季。)

这两种鸟便入了超凡的境地，变为富于诗的联想的了。可是对于不读诗的人，它们和麻雀有甚么不同呢？夜莺、云雀、布谷，也因为诗的联想，更被人珍视。这种微妙的经验，不读诗的人却无福领略。我因为韩愈的诗句——

黄昏到寺蝙蝠飞，

对于蝙蝠也颇怀好感，而且每见到它，往往想起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

仿佛见到了诗人辛弃疾独宿的凄凉情景。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过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其他如树木花草，本身固然是美的，也因为诗的联想而更美。梅呀、柳呀、梧桐

呀、芭蕉呀,在不读书的人的心目中,假如引起甚么情绪的话,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读书使我们的生活丰富。

吉辛又说到中夜的钟声使他惊醒,若不是为了莎士比亚的联想,他也许会诅咒它扰乱睡眠呢。读过张继的

夜半钟声到客船,

假如诸位中有人中夜被钟声惊醒,不会因此感到喜悦吗?

生活的方式和态度被读书所改变,是所以还要办教育的基本理由,恐怕诸位从教育家听的已多,见的已多,我用不着多说了。我只说一件小事。多年前我读到一篇论散步的文章,作者特夫莱严(G. M. Trevelyan)说他有两位大夫,一位是他的左腿,一位是他的右腿,在身心失调的时候,他总请他们医治,而且一治必好。那时我还在穷学生时代,而且颇有人担心我活不下去,所以常请这两位大夫侍候我,是最合理,也是最经济的事。决然下聘约。不像目前许多教授,只兼挂名的差事,他们倒是很热心服务的。几年后旧同学见到我,却惊讶我居然不但没有入墓,却比以前健康些了。这还是小益处。他们给了我更多的精神上的快乐。我觉得我的整个的人生观,都差不多因为他们改变了。别的人听说都是用脑子思想的,我却用腿思想的时候也颇多。我向诸位保证,腿实在不像许多脑子那样空虚。假如我早几年读到这篇文章,我不知要多得多少益处;特别他论到青春苦恼期的一段,会给我最健全的启示。我先说到蝙蝠,诸位也许有讥笑我悬空的;这一回可脚踏实地了。

我说生活的经验也可以增加读书的理解和欣赏,让我也来举一点小小的例子。记得有一回,和在坐的台静农先生谈到中国诗的意境,我说很喜欢柳永词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他问我,前一句“今宵酒醒何处”如何。我摇摇头,因为我不善喝酒。他却觉得酒醒后那境界更好。这有点不好商量。不过他继续说,有一次回故乡的途中,却亲身经历过这境界。我只有甘拜下风,承认他的欣赏更真切。在我“杨柳岸”和“晓风残月”从没有合成过一张和谐的图画。

我在北平，教学生读过一点诗，有一位坦然承认念不出甚么味道。多半是情诗，他正在厌恶女性，难怪的。暑假后，他见我第一句话便说他喜欢那些诗了。我笑了笑，他也心会我知道他不是厌恶中过日子了。

对于名著的欣赏，有许多地方很受自己的经验限制，所以脍炙人口的名著，有时读不出甚么好，也不必扫兴的。怎样的名著也往往有不精彩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自己的了解力过差。就是最精彩的地方，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同样领略。有人说，一年读一次莎士比亚，每次都可以有新发现。真正的名著，大体都很耐咀嚼，咀嚼一回，总可以得到些真味。不要只相信别人的说法，虽然明达的批评可以帮助我们欣赏，可惜这样的批评并不多。我们和十个人相交，未必有两三位可以成为朋友；众书中所得的友谊温情，比例却比较高。有时我们自己的经验没有成熟，不能了解欣赏一部作品；有时同一作品，因为读的时间不同，给我们很不同的印象，可以证明自己的经验往往在读书上有绝大的决定作用。所以我们要想深入到书里去，非同时将生活经验尽力扩大不可。有批评家说，少年人读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吉珂德先生》(Don Quixote)会发笑，中年人读了会思想，老年人读了却要哭，也就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生活同读书是分不开来的。一方面不要作书呆子，将脑袋里装满着死书；一方面也不要空着脑袋过生活。读书应当是生活的一种享乐，不是令人头痛的工作。生活应当用书籍来陶冶，使它美化并充实。读书，我们可以接近古今中外的良师益友，生活，我们才可以接受它们给予的恩惠。这样将生活和读书熔为一炉，我想英国诗人勃莱克所说：

“ ……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 ”

(一粒沙里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一个天国，)

这境界我们有时候可以领略到。

谢谢诸位的耐心，费不少时间来听这几句很平常的话。

李霁野(1904—1997),安徽霍丘人。著名作家、翻译家、教授。1925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后在辅仁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任教。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以翻译苏俄、英国作品著称,如《简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斯大林格勒》等。也创作诗歌、小说、散文、杂文,如杂文集《鲁迅精神》、诗集《海河集》、小说集《影》。

书和读书

□冯 至

读书人与书的关系，不像人们想得那样单纯。有人买书成癖，琳琅满架，若是你问他，“这些书都读过吗？”他将难以回答，或者说：“哪里能读这么多”，或者说：“先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与此相反，有人身边只有少量的几本书，你问他：“近来读些什么？”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读的就是这几本。”这两种情况我都有过。前者是在当年的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后者是在战争时期的昆明。这正如在一个地方住久了的人，对那里所有的特点失去敏感，经常注意不到，纵使有什么名胜古迹，总觉得随时都能去看，结果往往始终没有去过，倒不如短期来游的旅客，到一个地方便探奇访胜，仔细观察，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一生难忘。我在昆明，仅只有摆在肥皂木箱里的几十本书，联大图书馆里的书也很贫乏，若相信开卷有益，任意浏览，是不可能的。幸而清华大学带来一部分图书，外文书放在外文系的图书室里，都是比较好的版本，我经常借阅，这是我读书的一个主要来源。其次是昆明为数不多的旧书店，里边好书也很少，但我在出卖用过的旧书时，也会偶然发现一两种稀奇或有用的书籍。此外，我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出乎意料在法律系办公室里看到几十本德语文学书，这是法律系教授费青在德国留学时买的，由此可见这位法学家读书兴趣的广泛，也许是因为生活困难，他把这些书卖给学校了。书放在法律系，无人借阅，可能我是唯一的借阅

者。总之,书很有限,而且得来不易,那么,自己带来的书,就翻来覆去地读,借来的书要按期归还,就迅速地读,旧书店里买来的书,就爱不释手地读。这样,我读书就不能随意浏览,而要专心致志了。

前边提到过,我从一九四一年春起始翻译并注释《歌德年谱》,从外文系图书室借用四十卷本的《歌德全集》。这部《歌德全集》是德国科塔出版社为了纪念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于本世纪初期约请研究歌德的专家们编纂的,虽然有些过时,但还有学术上的权威性。那时我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下课后上山,背包里常装着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上买的菜蔬,一是几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几本,就掉换几本,它们不仅帮助我注释《歌德年谱》,也给我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歌德的作品,实际上也不能全读,有时只查一查与年谱有关的地方,参照我随身带来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选》、《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歌德谈话选》等,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加深了我对于歌德的理解。而且外文系的图书室不只有这部《歌德全集》,还有几部研究歌德的专著,若是没有这些书,我自从一九四三年以后发表的几篇关于歌德的论文是写不出来的。

至于法律系办公室里的德语文学书,我只看作是一个意外的发现,里边不是没有好书,却不是我当时迫切需要的,我借阅过几次,是些什么书我记不清了。

值得怀念的是青云街的一个旧书店,它并没有什么珍本奇书,但我在那里买了几本书,对我很有意义。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记:“卖旧书 130 元,买《圣经辞源》 20 元。”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日记:“购《清六家诗钞》。”这两种书都是袖珍本,便于携带,至今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圣经辞源》可能人们认为是一种不值一顾的书,在米价一石超过千元的一九四二年,仅用二十元就能买到,几乎等于白送。可是它对我很有用,这是一本《圣经》里人名、地名、重要事件和词汇的索引,并有较为详细的解释,用它查阅中文本《圣经》,非常方便。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使用它。《清六家诗钞》

是日本印的清刘执玉编的清初六诗人宋琬、施闰章、王士禛、赵执信、朱彝尊、查慎行的诗选,线装袖珍四册,几乎每首诗都有日本近藤元粹的眉批,前有近藤的序文,写于明治四十年(1907),序文里声明他并不喜欢清诗,所以他的评语有褒有贬。我对于这六位诗人也不感兴趣,不过看看日本学者怎样评论他们,也不无意义。

在我购买《清六家诗钞》的前两天,我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欲买杜少陵诗已售出,知为丁名楠购去。”二十五日的日记:“丁名楠持来杜少陵诗相让,盛情可感。”这可能是我在二十四日以前就看到了杜少陵诗,由于袋里的钱不够没有买,再去时书已卖出,当时遇到丁名楠的一位同学,他把丁名楠买去的事告诉了我,又把我没有买到的事告诉丁名楠。在书籍非常缺乏的时期,丁名楠肯把刚买到的书让给我,真是盛情可感,同时我也要感谢那位传递消息的好心人。丁名楠是联大历史系同学,现在是很有成就的历史学者。

这部杜少陵诗是仇兆鳌的《杜少陵诗详注》,合订二册,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不是什么好版本。自从抗战以来,我就喜读杜诗,苦于身边没有杜甫的全集,如今得到这部平时很容易买到的仇注杜诗,我却视如珍宝。我一首一首地反复研读,把诗的主题和人名、地名以及有关杜甫的事迹分门别类记录在前边已经提到过的“学生选习学程单”的背面,这种“卡片”我积累了数百张。杜甫的诗和他的为人深深地感动我,我起始想给杜甫写一部传记,这时《歌德年谱》的注释工作中断已将及两年了。

歌德的著作与杜甫的诗是我在昆明时期主要的读物,读得比较仔细,比较认真,我之所以能这样,不是由于书多,而是由于书少的原故。此外,我也以热情和兴趣读我随身带来的陆游的诗、鲁迅的杂文、丹麦思想家基尔克郭尔的日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个别著作、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和书信。这些读物对于我的写作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写杂文,虽然针对现实,有时也需要从书本

里得到一些启发，或是摘引一两句名言警句，给自己的文章增加点分量。

《十四行集》里有三首诗分别呈献给鲁迅、杜甫和歌德，现在看来，这三首诗未能较好地体现出他们的伟大精神，我只是在当时认识的水平上向他们表达了崇敬的心情。而且这部诗集里有些篇章，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里尔克的影响。

陆游诗中有许多脍炙人口、广泛流传的名句，《示儿》一诗，在抗战时期更为人所称道。但是我最钦佩他《送芮国器司业》一诗：“往岁淮边虏未归，诸生合疏论危机。人材衰靡方当虑，士气峥嵘未可非。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还朝此段应先及，岂独遗经赖发挥。”这种政见，忧国忧民的杜甫不曾有过，辅佐魏玛公爵的歌德也不曾有过。又如《西村醉归》里的诗句：“一生常耻为身谋”和“剑不虚施细碎仇”，都曾给我以教育。

比较复杂的是基尔克郭尔和尼采。前者生活在欧洲十九世纪中叶，后者在十九世纪末期。他们在世时非常孤立，死后也是毁誉参半。他们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欺骗和庸俗气，如见肺肝，他们毫不容情的揭露与批判无不入木三分。可是他们目无群众，把人民群众跟资产阶级社会混为一谈，这是他们的致命伤。最后基尔克郭尔在丹麦成为众矢之的，在哥本哈根街上散步时昏倒死去；尼采患神经错乱与世长辞。我读他们笔锋锐利的论战文字，时常想到鲁迅在《坟》的《题记》和《写在〈坟〉后面》里的两段话。鲁迅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他还说：“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便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我并不要把基尔克郭尔与尼采跟鲁迅相比，甚至给人以替他们辩解的印象。他们的确给他们那时代的伪善者和乡愿们的“好世界”多留下了一些缺陷，使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服。这是他们值得肯定的积极的方

面。我看到社会上光怪陆离难以容忍的种种现象感到苦闷时，读几段他们的名言隽语，如饮甘醇，精神为之振奋。至于他们蔑视群众、强调个人、自命非凡的方面，往往在我的兴奋中被忽略了。记得在一九四一年秋，可能是参加一次欢迎老舍的聚会，会后晚了，不能回山，我和闻一多在这天夜里住在靛花巷教员宿舍里。我们过去并不熟识，只因他读了我写的一篇介绍基尔克郭尔《对于时代的批评》的文章，甚为赞许，我们一直谈到深夜。

我在昆明读的书不多，那些书的作者却对我说了些真心话，话的种类不同，有过时的老话，有具有现实意义的新话，有的给我以教育，有的给我以慰藉。如今我怀念和它们的交往，也跟怀念当年与朋友和同学们的交往没有两样。

冯至（1905—1993），河北涿州人。著名文学家、诗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开始发表诗作。参加创建“沉钟社”，是中国新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德国留学归来，执教于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有诗集《昨日之歌》、《西郊集》、《十年诗抄》，学术著作《论歌德》、《杜甫传》等。

广博与专精

□傅振伦

问 傅先生,您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档案专家,我们想请您和我们的读者谈谈您的治学经验。

答:我先说明一下,有人说我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方志专家、陶瓷专家,这些都不太准确。最根本的,我想我应是一位爱国的历史学者。我国是六大文明古国之一,我无时无刻不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进行历史研究,从事考古、科技史、方志的研究,都是出于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热爱祖国,是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
精神力量。

问:谈谈您的经历好吗?

答 我6岁就学,启蒙师逊清冯克己先生品学兼优,蜚声乡里,自以为迂拘不合时用,终其身以教育后生为己任。生平循规蹈矩、表率一方。尝教以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一言一行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10岁那年,考入新河县立高级小学。校长吴永培长于文史,治校严明。尝以韩昌黎“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之语训示生徒,要求苦心学习,以为世用。国文教员宋德炳还教以文以载道,当推敲文义文理,要言简意赅、奔放有致,切戒《二郎庙碑记》式的陈词滥调(相传昔有士人撰此碑云:“吾乡有二郎庙,建于三百年前,已历五花甲,盖由来久矣。夫二郎者,乃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庙前有树五株,人皆曰树在庙前,余独曰庙在

树后……”）。这些师长谆谆告诫之言，至今仍不敢忘。

之后，考入冀县省立中学。校长杨廷桂亦治校严格之士，督导学生成为德智体三育俱佳的人材。之后，初试西沽（指北洋大学）备取，再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理科），学习了英文、解析几何、应用排列法则及运筹之术，培育了我的智力和细腻思维能力。后来因故甲部不准我毕业，不得已转入乙部（文、法科）留级学习。这样我又学习了乙部特有的公民学、生物学大意、社会学大意，树立了社会科学的基础。尤其是文科基础课目，对我文史修养有莫大的好处。例如“国学论著要集”课，选读先秦以迄清代关于学术思想等论著，使我明白了历代学术的系统及其变迁，附以批评，兼及训诂、考证、校勘。“文论集要”课，选读了中国文学史上文章源流、体制及其作法等文章，了解到文学的传授及流变系统，也选读了中国文学史上平实明辨的论议、记叙文品和诗歌，初步掌握了修辞谋篇等技术。“选文”课先授训诂条例及字书利用等方法，再选授每个时代的代表作品，附以互相发明及不同的论点。“文法”课讲述研究文法的目的及方法；次述文法与文字学、国语学、修辞学、论理学等关系。内容有定词品及析句读等例及词品用法。句读一章论述句的构造类别及析句的方式和古籍文句的异例，使我读古典书籍能洞悉文义，不致模糊不清或曲解，以致属辞成文，差免不当律令之讥。

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中国上古史教授象山陈汉章先生出俞曲园先生之门，教我以章学诚“学于众人，斯为圣人”之训及其“方智圆神”之理（指史学记注与撰述之业。一见《文史通义·原道上》，一见《书教下》），加强了我向群众学习和博采多识的意志。历史系主任朱希祖教授出章太炎先生之门，不仅指导我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刘知幾《史通》，还启发我从事于方志之学。陈垣先生有一次在中国史学名著选读课堂上讲：治学要有恒，要勤读、勤问、勤动手。邓之诚先生研究中国通史及笔记小说，尝告以读书要用叶子（以纸签夹于书中所需材料处）的札记之法。师友们这些治学之道，

对我都大有启迪,终生行之,收效不小。

在我的前辈导师中,袁同礼、马衡、朱希祖、邓之诚、徐鸿宝、伦明诸先生,对我循循诱导,教诲不倦。我走上研究目录学、方志学、文物考古,都是受他们的启示。诸位师长的道德品行,也是我们的好榜样。

1929年夏,我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受聘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助教,从马衡教授研究金石考古,参加易县燕下都发掘工作。其后,由于政局动荡,战火不断,我的工作也经常调动,很难安下心来,作专门的科研。直到解放以后,我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才算安定下来。1957年,错划为右派,两次降职,由研究员降为助理员,1959年9月调到中华书局古代史组为编辑。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又回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直到1989年退休。

总的来说,师长的教导和启发,对我一生有极大的帮助。只可惜我的兴趣广泛,对历史、史学史、简牍、文物、考古、博物馆学、科技史、陶瓷史,都有兴趣,下至民俗歌谣、世界语、拳术也极爱好。因此,白头而一无所专精,成就不大,以致辜负了师长的期望。

问:傅先生,您从事科学研究已经六十余年了,在这六十多年中,您感受最深的又是什么呢?

答:有两句话,我感受最深。一句是“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一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说明学习的方法应当多请教于良师益友,还要多多读书,特别重要的是调查考察,深入实践。我在北大读书时,就力求遵循这些方法。每天课余之暇,就在图书馆的日报、期刊、图书等阅览室看报看书,遇到有用材料就摘录下来,偶有心得就写下来。北大第二寄宿舍(在沙滩红楼西,俗称东斋)订有京津沪等埠日报,月终归号房工友售去分款。我毕业后有了薪水,就与号房约定,把这些旧报卖给我,我把有用资料剪下,其余仍归还他们。这样,所写日记及剪报资料积有四十余册。另外,我还亲自访求古迹,必有所得。抗战胜利后,经陕晋北上,旅途又在临汾城

内发掘宋代平阳窑址，得瓷片及窑具。这样的读书和实地考察，多少年来，我一直坚持着。它们对我的研究工作有着直接的帮助。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广交益友。前些年我的身体尚好，在京的同学师长，一个月总要拜访一次。大家在一起纵情畅谈，各抒己见，可以互相交流信息，弥补各自闻见之不足，也可启发思维，丰富知识，对于自己的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很大促进作用。当然，这种聚会与那种闲聊空谈是有根本区别的。

问 傅先生，您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很多学科，您都是举世公认的专家。您的这些成就，也令后辈学子仰慕。您能具体地介绍一下您治学的方法吗？

答：我兴趣广泛，对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愿意作些尝试。我认为，尽管各个学科的内容不同，但各科成果的形成过程应该是一致的。即不外乎选题的确定，资料的搜集，资料的甄别，最后形成文字的东西。选题确定以后，最重要的就是搜集资料，这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材料的搜集一定要博而真。博就是广博，材料越多越好。宋代郑樵在《通志·校讎略》中说：“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这就基本上为我们指明了史料搜集的大致范围。但由于年代关系，有些史料可能在书本上难以找到，这又需要借助于文物的考察和到民间去寻找。总之，材料的搜集方面要尽可能多，要不遗余力。

材料搜集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搜集到的材料就是可以利用的材料，这还需要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鉴别。这是一个艰苦而复杂的过程，需要运用多方面的知识。一般来讲，材料出处越早，就越可靠。有些材料，是古人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这样的材料的运用当然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同是古人的叙述，有的因为避讳而有意回避某个问题，有很多史实，就是由于避讳而给后人造成麻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懂点避讳学。有些材料前人相互引用，有的是古人

的夸张,这些都需要我们作认真的分析和研究。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出“四种校勘”方法,这对于校勘工作有很大帮助,也使我在资料的鉴别方面获益匪浅。另外,同样的史实,由于资料来源不同,又存在古今之分、官私之不同、中外之差异,这又要求我们用史料学的知识加以分辨。通过这些工作,可以对已掌握的资料进行去伪存真,从而获得最确实可靠的材料,为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需要做的一项工作是对资料进行梳理编排。我以前一直用西洋人 codium(枝干)方法,将资料进行年代排列。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材料年代一目了然,可以按材料的先后顺序不同进行推证。近年才学到用近人习用的卡片之法,同样按图索骥,方便快捷,不失为资料工作之良法。

这些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使自己的观点见诸笔端,一篇论文即可写成了。

问:您在科学研究领域不断耕耘,成就辉煌,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您能给我们的读者谈谈您的成功经验吗?

答:我一生受古代贤哲言行及良师益友等影响,勤学好问,谨严治学。有一特点,即爱惜光阴,善于安排利用,不敢浪费。以为为人不仅要节约人力、物力,尤其要节约时光,这也等于延长寿命。古人讲,勤能补拙。可见治学,“勤”字也很要紧。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秘法”条说:“生虱断根,必须勤捉。所以,我读书也非常重视‘勤’字。”“勤”含有勤读、勤问、勤写等方面。我还以为,整理古籍或从事科研,当先以有用之学为主。我写《孙臆兵法译注》不仅以其有裨军事,亦以其有助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我研究瓷器史,不仅阐述祖国灿烂的文化艺术,同样有关实业与民生。我研究方志,因为方志可以存史料,资治道,有裨实用,且可宣扬爱乡爱国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也从事研究祖国古代科技。

最后,我还想和青年朋友们说几句。从事科研工作是一项很苦

的差事。要有恒心、毅力，不要浅尝辄止，不要半途而废。治学既要有广博而雄厚的基础，更要由博返约，能精专一门，则对社会贡献之大必能超越前人。希望在青年，我企足待之。

傅振伦(1906—1999)，河北新河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陶瓷专家。1929年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终身研究员。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等名誉理事。主要著作有《新河县志》、《中国方志学通论》、《中国史志论丛》、《博物馆学概论》、《刘知幾年谱》、《中国文学概要》、《孙臬兵法译注》、《明代瓷器工艺》等。

读书有味聊忘老

□谢兴尧

知识分子离不开图书杂志，是书刊的主人，书刊是知识分子的资本，帮助他建功立业，互为之用，相辅相成。日积月累，数量增多，经常翻阅，难免损坏，久而久之，线装书开线，平装书脱皮。每架之上，新旧杂陈，长短不齐，五尺之楼，别无长物，环顾周围，只是一大堆破烂，确乎是真正“寒斋”如古“陋室”。有人给我上一尊号，称为“破烂王”，我居之不悞，并作了四句顺口溜：“图书已满架，破烂也称王，开卷即有益，何必事辉煌。”

所谓破烂，有一部分属历史文物，大部分属于研究的参考资料，每次搬家，常把一时用不着的图书杂志捆存起来，置于廊下。因为这些书刊本身都有一定价值，弃之可惜，留之麻烦，时间久了，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整理，任风吹日晒，总觉得肉烂了在锅里。事物的机遇无常，说不定有一天还要找它，如去年为寻找旧存的《说文解字》，就好不费事。近来要求美化环境，打扫卫生，不能不把捆存的书刊加以清理淘汰，在破烂中见有旧讲义十数册，还是六十年前之物，见之如对故人，无限感触，都是在北京大学时期的课本，其中有陈寅恪讲的史地，胡适之讲的哲学，钱玄同讲的音韵，章太炎讲的《论语》等，这些旧讲义老课本，现在看来，虽不能视为文物，也足称是孤本，回忆当年各名家的讲习情况，亦有足述者。

我是一九二六年在沙滩红楼上学念书，一九三一年毕业，同时

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进修。当时北大还是旧制,预科两年,本科四年,预科分为甲乙两班,简称预甲、预乙,预甲将来入理科,以数理理化打基础,预乙将来入文科法科,以国学文学作根底。我读预乙,主要课程有二,一是采取诸子百家的学说编为《国学概论》,一是摘录《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书,编为《文论集要》。其他还有诗选、词史等。选修科目有三理,即心理、伦理、论理,后来我入史学系。四年本科,学习文史哲方面的课程,随着教授的专长,进入专题研究的范畴,现在所存的几本旧讲义,均属于专题研究的性质。

陈寅恪先生讲的《西北史地》,是典型的专题研究,他论述古代西北民族的发展、迁徙、混同的经过,由地理环境的变迁形成风俗习惯。他特别讲到中国史书上的大夏及大月氏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在地理方面涉及到古印度、波斯、越南等地区。陈先生学通中西,他编写讲义的方法,除了引证中国古史外,旁及《西域记》、佛经诸书,对于当代中外学者的研究著述,亦予引证评论。于是,他把古今各方面的说法,加以综合,有同意的赞许,有不同意的批判,他的讲课比较专门精深,非一般初年级学生所能理解接受。

陈先生身体很弱,高度近视,秋风一起,便穿着厚重的大马褂,坐着讲书,有时反手在黑板上写几个字。课时听讲的人约三四十人,满满一小屋人,逐渐慢慢地消失,到最后只剩六、七个人。其原因,一是他讲话声音很低,后面的人听不见。二是他说话似江西口音,有些人听不懂。三是他所讲的问题窄而深,如所讲大夏、大月氏及突厥、吐鲁番等,广征博引,听起来好像杂乱无章,实则是围绕一个主题,寻根究底,不细心耐心听,是不能理会的。他在清华大学,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你们去问陈先生,可见学者们对他的推重。

胡适之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他编发的讲义题为《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他这份讲义确实是提要,一共三十八页(当时讲义都可订成线装书),分十二讲。他定的中古时代,是从秦始皇到宋真

宗,约计一千二百年。他认为中古时代的特色,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同化,宗教的普遍。在时代上分为两大段,第一阶段是古代思想的混合与演变,第二阶段是佛教思想的侵入。全书十二讲中,前七讲设齐学、道家、儒家。齐学包括阴阳家、神仙家、道家黄老派,多取材于《淮南子》、《吕氏春秋》及《礼记》、《汉书》等,这是他的卓见。谈儒家经常要碰到今文学、古文学的问题,他说“汉朝所出的经传,只有先出后出的次第,并没有两个对立的学派”,并引王国维的说法,“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并天下统一文字,于是古文、籀文并废”他认为此说可信。他在讲学中特别推崇王充,用一个讲章的篇幅介绍,这是胡先生的思想、观点和作学问的根源,王充《论衡》的思想核心,是“疾虚妄”。“论衡者,论之平也”;对于世俗流传书籍,都要“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学问是证实后的知识。这正是胡先生实验哲学的根本。胡先生常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是主观的推测,求证是客观的验证,这是科学的。讲义从第八章起用五讲的篇幅专讲佛教和禅学,过去的学者们谈佛学的很多,真正看过佛经,懂得佛学的很少。胡先生因为讲哲学史,必然要涉及佛学,他曾撰著过《佛教的禅法》及《禅学古史考》等,讲义中采取了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论文及蒋维乔译的《中国佛教史》,引证了中外大量参考书籍才作出佛教在中国的演变。看得出来,胡先生编著的这份讲义,是费了大力气,下了大功夫完成的,是一本杰作。

有一年我在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骑河楼,靠近东华门)听胡先生作报告,两个钟头下来,他穿的羽纱大褂,背全湿透,比之现在在有电扇空调等现代化设备,艰苦多了。

我毕业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教书,和胡先生做了近邻,他住后门米粮库四号,是一座两层小洋楼,我住二号,每星期天上午顺便到他家拜访请教,总是高朋满座,大都是各学校的教师和各机关的研究人员,客人们随便接谈,有学术上的争论,有文化界的传闻,纯粹是一所毫无顾忌的群言堂。当时的梁任公和胡先生都

开门迎宾，贤者胸怀博大，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

所存讲义中，有一本钱玄同先生的《文字学音篇》。这门功课不大容易学，不是深而是难。所谓训诂之学、语言文字音韵，在过去是热门，凡是搞诗词歌赋的人，先得懂音韵，现在恐怕将沦为绝学了。钱先生的讲义分五章，第一章讲纽与韵，讲双声叠韵。古称发音相同之字为“双声”，收音相同之字为“叠韵”。细究起来，古今字音不同，南北方言各异，后来统一为国音字典，较为简单明了。第二章广韵之纽韵，则是发音，有喉音、舌音、齿音、唇音等。发音又分清浊。第三章反切，即是拼音，如公字、古红切，邦字、博江切，乃古人解决乡音之用。在中古时代，有所谓“齐言”（即山东音）和“楚辞”（即湖南湖北音）之分，语言不通，则以反切文字解达之，第四章三代古音，讲阴声、阳声、入声，而入声最难。第五章注音字母，成为现代读书的工具，讲义从学理上说明。全书常引清人钱大昕及其老师章太炎、师兄黄侃（字季刚、太炎大弟子）的说法，在音韵学中，不失为一家之言，现在研究这门课的人，可能太少了。

钱先生精力充沛，声音宏亮，说话有点口吃，在讲台上他常说还……还……还（读如孩）有一个字。在教员休息室，其他先生下课后都有点疲倦，静静坐着，抽烟喝茶，他还有余热高谈阔论，声震四壁。他常穿一套学生服，数年之间，我没见他穿过长衫或西服。他离家住在孔德中学，有人说他很怪，独自一人逛公园，不和别人打招呼。

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北京大学等校迎请章太炎先生北来讲学，我在北大参加听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组用毛边纸大字铅印的讲义，加以句读，讲题是《广论语骈枝》。时先生已六十多岁，每次出台穿着长袍马褂，由四五个人陪同，其中一人手持长城牌香烟一筒，但先生讲书时，从未抽烟。长方形的大教室，坐满听众，均系当时北京大专院校教师，先生年老，声音不大，坐在中排后排的即听不见，先生余杭乡音，即在前排亦听不懂，由魏建功当助教，任翻译。先生按《论语》二十篇次序讲述，详略不一，每次约讲一两小

时。先生讲经，博大精深，总的精神概念，似与汉宋两代经学家对话商榷。在经书中许多方面因语言文字、制度礼仪古今不同，不能理解的条款很多，经学家目的就在注释经义，正如韩愈在《师说》中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先生讲的《乡党篇》最为精辟，原文是“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注谓“受馈之礼，必先尝而谢之，孔子未达其药之故，不敢先尝。”古今学者对这条多表质疑，因为古礼，凡朋友馈赠食物，必先尝后谢，药虽与食物不同，然而朋友送药，总是善意关怀，决不会是毒品，主人似不能说，我不明药性，不敢乱服，只好拜而受之。章先生解释达是打针，引《左传》晋侯故事为证，按《春秋左传》卷二六，成公十年“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肱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章先生云“达者针也，凡病，有先施针然后可用药者，如伤寒论桂枝汤即其一例。孔子病未施针，故不敢尝药，针后自可尝，故仍拜受不辞”。这一下就解释通了。解经是注疏中一大难题，不能附会，不能曲解，必须说通，方能服人。讲义中有两处附太炎弟子钱玄同、吴承仕的案语补充，颇似春秋经传。

我有幸赶上听太炎先生讲学，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本讲义，散发不广，六十年前的学习课本，现在觉得更应该保存。

以上这些讲义内涵，现在看来或已过时，然而学术不能脱离时代，三十年代的学术思想，一方面仍继承乾嘉朴学的遗绪，另一方面则受西洋科学的影响，在研究问题和治学观点上，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摆脱了旧的范围，引出了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新风气。这几种讲义，正代表了当时的学派思潮，以科学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引起学术界极大重视，这是时代的进步带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我在北大时，住理科宿舍“西斋”，在马神庙西口内，离沙滩很近，每天到红楼听课，达六年之久，而今老矣，常过其地，不免伫立徘徊，默计沧桑，上课钟声犹宏亮萦耳，感岁月已逝，愧学业无成，

抚摩旧册，缅怀前辈，往迹如烟，曷胜惆怅。一九八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属我撰写自传，传中附打油诗一首，抄录于此，聊作尾声。

一别红楼五十秋	狂狷少年已白头
学海深渊难探索	文物遗址拟追求
喜闻师友谈今古	未将黑白逐时流
夕阳残照虽云晚	隐居蜗庐再自修

谢兴尧(1906—)，四川射洪人。著名学者，近代史学家。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逸经》杂志和《新生报》文史周刊主编。建国后任《人民日报》社图书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研究太平天国史卓有成就，著有《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太平天国史事论丛》等，今编有《太平天国丛书》13种刊行于世。

北平旧书肆

□商 鸿 逵

我记得在《人间世》某期上读过一篇《书店》，觉得写的很好，很在行，只是所写多偏于上海新式书店，这截止到现在还不失为中国旧文化中心的北平城里那些“旧书肆”，却也蕴藏有不少“奥妙”，趁今闲暇也写它一写。

北平的旧书肆区，在老年，就我所知，有一厂二寺，厂即琉璃厂，它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迄今未衰，“厂肆”二字在中国藏书史上，至少是免不了要提提的一个名词吧。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今名报国寺，在宣武门外）在清初颇兴旺，顺康人间笔记中常见述及，如今却是连一些书影儿也没有的了，隆福寺起初只是些书摊，每逢会期，赶来摊卖，现在发展的也不下二十家肆了，其中还有几家规模够大的。记得去年南方某书店来北平采购旧书，先到隆福寺，进入一家，骤睹琳琅满目，便拣选了些，又进一家，又买了些，顷刻用去数千元，后来又琉璃厂，见藏书之多且十倍于隆福寺，未见大买，囊资已尽，遂赞叹叫绝而返。

过去书中谈及厂肆等地方的很多，专记的有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后记”，叶德辉《买书行》等，以繁不引，只叶氏《书林清话》上有几句话：“吾官京曹时，士大夫犹有乾嘉余韵，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多挟数破帙驱车而归。”这种余韵，今日犹有，什么考究版本的鉴赏家，爱往旧堆里钻的大学教授，附

庸风雅的买书者，侨居我邦，研究所谓“汉学”的洋人等等，都算是书肆的当期主顾。

书肆主人，已往都是江西金溪籍，兼有江浙籍，盖皆南人也。到现在却多换了别地方人了。这里面怎样一个衍递，不甚了了，或谓，在先之南人，多为进京会试，名落孙山的举子，赧颜归里，便思作生意，旁的生意不会作，只好卖书，念书人卖书算最接近的一行了。可是，虽然作生意，究系“由儒而贾”，难免要带点“酸狂气”；对于奉承，自然差忒。偏巧一般买书的达官贵人又好“奉承”这个调调，纯生意人于是便大得手了，主顾一到，装烟倒茶，躬出揖人，一味周旋，再加上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渐渐便夺去江西人之席。就我所知，某书肆主人背包袱时，每串大宅第，常当人面从袋中取食黄粱窝，询以故，则诉曰：“卖书能有多大赚头，不得不吃这个。”如是，人怜其苦，便不与他争值了。这套把戏，酸狂举子，怎末能扮得来！

说到作生意方法，旧书肆与新书出版家又大不相同。新书是要拉些有名作家作后台，旧书却全靠采访所得，大一些的书肆，差不多常年要派人到各省各县去收买，性质颇近古董商，有时虽一无所得，有时可获利无算，像那部哄传一时的《金瓶梅词话》，在山西来时才数十元，一转手便卖了数百元，再转到购主便千数百元了。

近年的刻板书价总都算涨，原刻或刻得精一点的都贵的了不得，宋元版不谈，即小说戏曲之类，一部《贯华堂水浒》就要五六十元，《清晖阁牡丹亭还魂记》非百元莫办。去冬我见着一部《十二律昆腔谱及京腔谱》想买，开口便索价四百，近年更有人搜罗淫词小说，两本《旧刊肉蒲团》也值二十元了。

书价的涨落也看风头，胡适之先生谈了谈“传记文学”，谈到汪晖祖的病榻《梦痕录》，《梦痕录》立刻涨价，林语堂先生表袁中郎，《中郎集》又涨起。

县志近年价也大涨，大概是先有某国欲考索中国风土地理而采买，随着我们也感觉这个重要而争买，一部偏僻不经见的县志，

论本头也须一二十元。前天一书贾向我说，要有一部《香河县志》（属河北）能卖八十元。

“禁书”也了不得，载在禁书目录的书，不消说是卖大价了，即现在还在禁的那部《清史稿》，原定价百元，现售至四五百元，书是不管好坏，一禁便贵。

传抄作假，更是旧书肆的拿手活，遇到罕见的书，不管刻本、抄本，他们能用染制好了的旧样丝栏纸誊写上几部，有时会当“传抄未刻本”卖，一捆烂卷残稿，他们能描改挖补，装帧什袭，杜撰个名目，充“稿本”去骗卖。前年有书贾持一旧纸影印《玉台新咏》，冒称明刊到某图书馆求售，结果，居然被欺，用重价收下。

卖书还须有一种手腕，是攀交名流，要名流作甚呢，名流能替介绍主顾，凭他一言，书既可留，价且多给，名流乐得接近他们，一来能借着多见些好书，长长见识，二来，高明些的书贾，他那点“横通”工夫，却真也“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章实斋语）。原来旧书主顾，尤其好讲究点“版片”的，常离不开这些规模大些的图书馆，中或外，或中外组织的学术团体，少数有力的收藏家，这些，非是名流在那儿主持，也和他有关连，有友谊。

这般书贾的记忆力也特好，谁已有何书，谁尚阙何书，谁欲觅何书，谁不收何书，胸中都有个大概，他在收买时固早在留意，拿来时你也定会十拿九稳。

截至今日止，旧书肆生意，总算不恶，不过，今而后，便不敢说了，图书馆以连续的收买，普通些的都有了，外邦人因金价跌落，搜罗之勇，也大不似从前，私人收藏家又越来越少——最欢迎的自然私人收藏，因私人资财的持久无把握，子弟的优劣无把握，无论到那个无把握时，书便会“流通”出来。图书馆藏书却是“一入侯门深似海”，永远不得再与“市”见，图书馆拍卖藏书，机会总少吧这么一来，所谓“珍惜”能经过书肆人之手者日稀，生意也便日稀了。

一般新出版家的影印旧书，也给打击非小，有了影印精版的，

谁还肯买劣刻的，商务印书馆印了各省通志，通志只好落价，中华书局影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谁还肯花五百元买那集成局两屏纸的匾字本？

以我看来，旧书肆今后若想发展，还须另寻途径。

商鸿逵(1907—1983),河北清苑人。现代著名学者。193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习文史，从事明清史研究。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主持《清会要》编纂工作。有《论康熙》、《赛金花本事》、《校桃花扇传奇》等论著。

《读书文萃》序

□ 张岱年

书是人类认识的载体。有知识的人把所见所闻或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便成为书。有价值的书是智慧的结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表现于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也储存于这个民族长期流传的典籍书册中。

我对于世界有所认识、对于人类的崇高理想有所了解，都得益于读书。通过读书，我认识到人除了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之外，还应有高尚的精神生活。通过读书，我了解到自古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感人肺腑的光辉事迹。

我幼年在家塾读书，读了《论语》、《孟子》，但只是诵读而已，并不理解其中义蕴。十多岁阅读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张载的著作才对于先秦儒家的精义深蕴有所了解。周敦颐在《通书》中说：“颜子一簞食，一瓢饮，一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又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矣。”又说：“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周敦颐《通书》的这些话，阐述精神生活的崇高价值，可谓深切著明，我读了深受启发。

张载《正蒙》说：“恬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显示了博

大的胸怀,宏伟的抱负,使我对于《论语》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进一步的了解。

20年代末,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阅读了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英译本。早年的中译本的译笔不甚通畅,英译本比较明晰。我读这些著作,感到豁然开朗,深受启发。我以辩证唯物论的理论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作了比较,认为辩证唯物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从此,我对唯物论深信不疑。

30年代初期,我广泛阅读了先秦诸子、汉唐哲学、宋明理学以及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颜元等的著作。在深入探索的基础上,撰写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著作,书中对于自古以来的唯物论思想特别是王夫之的唯物论思想有较多的阐发。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尤其其他的坚苦卓绝的高尚志节令我深深感动。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我提出今后应该发扬王船山的哲学。

西方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与罗素都认为西方近代哲学乃是古希腊的哲学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古希腊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我认为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先秦诸子哲学乃是汉唐宋明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论语》、《孟子》、《易传》、《老子》、《庄子》、《荀子》的思想对于后世的思想的发展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多年以来,我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以来我更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常常重温《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传》等书,感到先秦诸子学说确实含有深邃的智慧。举例来说,我认为古代儒家关于人生价值的学说,道家关于宇宙本体的学说,至今犹能给人以启发。

学亦多术,其中一项是读书,书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前人思想的结晶。接受前人累积的知识,必须读书。在思想史上,连提倡“六经注我”的陆象山也还说:“束书不读,游谈无根”。作为学习的途径

之一,书是必须读的。

读书只是学之一术,学不限于读书。孔子弟子子路已经说过:“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读书不是求知唯一途径。求知之道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向有知之人学习。这就是所谓学。学就是接受前人的经验。但是仅仅简单的接受还不行,必须加以消化,消化之道在于思考,这就是所谓思。思就是在接受别人的经验并取得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综合。学与思都是重要的。孔子有两句名言,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虽然是两千年前讲的,在今日仍不失为一个基本原则。

书籍是思想文化的载体,每本书在内容上,必然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在读书时,一方面要虚心体会,努力研求其中的深湛义蕴;另一方面还要有批评态度,要辨识前人思想的偏失。既要虚心,又要保持批评精神,才是正确的态度。只有在读书时勤于思考,加以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在前人已经达到的水平之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若盲目迷信典籍,缺乏批评精神,只能使思想陷于停滞,那是不足取的。

在读书中坚持独立思考,就要以对于实际情况的观察、考察、调查为基础,而观察不可能是静观,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思考的主要基础。在实践中读书,在读书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这是研究学问的必由之路。

读书应选要择精,选择有代表性的典籍细读。古往今来,书亦多矣,卷帙浩繁,蔚为壮观。清代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其数目之多,汗牛充栋。有谁能遍读四库呢?阅尽中外书籍更难实现。即令读尽天下所有的书,如无分析能力,也未必有益。

时至今日,只读中国的书是不够的,还须兼通海外的著作。“言必称希腊”,固然不足,对于西学无所了解,也难免固陋。尤其是研究学问,更必须兼通古今中外。明末思想家方以智说:“坐集千古之智”,引为幸事。当今世界,不但要集中中国的千古之智,更应集中

外千古之智了。只讲‘坐集’，也还不够，还须重视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分析综合，广集中外的千古之智。

人在读书可以各从所好，但在研究学问时，则必须有谦虚的态度，应知自己在知识的海洋中只能涉足于一二小小的角落而已。因此，研究学问，一方面要能独立思考，不受古往今来任何成说的束缚，一方面要有谦虚的态度，承认自己学识寡浅。既要有创新的勇气，又应自视歉然、深感自己的不足。惟其如此，才可能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一二晶莹的真理颗粒。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由钟敬文先生、季羨林先生和邓九平同志主编的《读书文萃》丛书，所选有关当代文人读书之作，精思健笔、心诚意雅、启人神智、发人深思，相信读者在阅读中能得到理趣的享受。

是为序。

张岱年(1909—)，河北献县人。著名哲学家。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求真集》等专著。

由旧书想起的

□张中行

不久前，为找什么材料，翻腾书橱，随手拿出两本，检阅扉页，看看有没有关于买时的记录，这是‘无意地’想温一温旧事。两本都是鲁迅先生著作。一本是《彷徨》，扉页有题记，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买于北京西单商场，价四角。昔在通州有此书，乃李文珍女士所赠，记得为初版，此则为第十三版。李女士为同学赵君之友，情投而未能意合，书则三七年毁于战火。抚今思昔，为之惘然。”书是旧书，有‘虚真藏书’白文印。另一本有些怪，内容是《南腔北调集》，封面和书脊却印《故事新编》，没有版权页，我想这是为了逃避查禁者的‘慧’眼，伪装为《故事新编》的。这个妙计是鲁迅先生还是书店老板想出来的？由书上自然看不出来。书也是旧的，扉页有原主人胡君的名章。我没有题记，什么时候从何处买到是难于知道了。

说起旧书，真是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一位老前辈，是名作家，有一次同我说，他杂览，是因为他不吸烟，闲坐无聊，只好用看书来消遣。我同另外两三个朋友喜欢逛书铺，逛书摊，买点旧书，也可以用吸烟来解释，是求书成瘾，很像吸惯纸烟之难于戒除。买旧书要费些时间，粗略估计，是一周用半天左右。也要费些钱，但不多，因为不求好版本，不求大部头的堂皇典册。买旧书，因书而得有两种。一是因杂收而可以杂览，因杂览而可以杂知。二，我们常常认为

更重要，是因巧遇而获得意外的喜悦。所谓巧遇是买到久已不见于市面的书，因为难得，所以觉得好玩。在这方面，可记的经历很有一些，只举两个例，如友人韩君买到鲁迅弟兄在日本印的《域外小说集》（封面‘域’作‘或’），我买到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光绪只有三十四年），就都是因为罕见而觉得很有意思。

一晃四十年过去，当年零碎收集的旧书，有些由废品站送往造纸厂，有些化为灰烬，还有些残余卧在书橱里。文化大革命风停雨霁之后，像是可以重温旧梦了，但苦于不再有温的条件。主要是已经没有往日猎奇的心情和精力；其次，即使有，也不再能找到弯弓放矢的场所。因而关于旧书，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忆。这正是琐话的题材，所以决定拉杂地说一说。

旧时代，出版业不发达，有名的几家集中上海，印书种类不多，数量不多，售书的处所，尤其在北京，总是由旧书独霸。北京，文化空气比较浓，读书人比较多，因而售书的处所比较多，几乎遍布九城。这方面的情况，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有详细记录，有兴趣卧游的人可以看看。售书的处所，有等级之分，从而有性质之别。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其中又有等级之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专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所售之书也杂，因为买来什么卖什么，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这中级的还有不集中的，那是散布在某些街道的小书铺，如鼓楼之东的‘得利复兴’，之南的‘志诚书局’就是。下级的是散布在各热闹处所的书摊，自然也是买到什么卖什么，古今中外。这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外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的许多书摊就是；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什刹海荷花市场，只有夏季有。此外还有级外的，是德胜门、宣武门几处小市，鼓担和住户卖旧货，间或也有旧书。这

种处所，旧书的出现更富于机遇性，有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甚至有善本。

旧书上市量的多少，价的高低，与治乱有密切关系。量多少与治乱成反比，治少乱多，因为治则买者多而卖者少，乱则买者少而卖者多。价高低与治乱成正比，治高乱低，原因与多少一样，治则大家抢着收，乱则大家抢着扔。抢着扔的情景，记得最惊心动魄的有两次。一次是七七事变之后，以德胜门小市为例，连续多少个早晨，旧书总是堆成几个小丘，记得鼓担的收价是六七分一斤，售价是一角一斤。可是买主还是很少，只好辗转送往造纸厂了。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风暴初起之时，小市的情况如何，因为没有余裕去看，不得而知，且说自己，匆忙点检，把推想可能引起麻烦的中西文书籍百余种清出来，由孩子用自行车推往废品站，回来说，废品站人说不收，愿意扔可以扔在那里，就高兴地扔了。我当时也松了一口气，及至风暴过去，才想到其中有些，扔了实在可惜，想买就再也遇不到了。这使我想到古人“人弃我取”的策略，道理自然不错，但那究竟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至于被迫处于局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还是转回来说平时，旧书价的高低，与售书处所等级的高下成正比，因而一种同样的书，比如说，由东安市场买要两角，由街头书摊买也许只要一角，由级外的小市买也许只要五分。搜寻旧书，更喜欢多逛街头书摊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图省钱。但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中级以上书商收书有个框框，这框框一部分来自师傅所传，一部分来自书架上所常见，总之要是他知道的。街头书摊和小市则不然，以小利速销为原则，所以总是遇书不拒，因而它就有个大优点，是因杂而博。譬如鲁迅弟兄早年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红星佚史》《匈奴奇士录》等，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以及嘉庆八年无名氏稿本记嘉庆皇帝一年活动的《癸亥日记》，等等，我都是从这类地方买来的。

这样说，好像下级的售书处所只能买到破烂，其实不然。自然，这要看机会，如果碰到机会，买到见经传的书也并非不可能。机会是难得的，但日久天长它就会成为必然。比如我现在还喜欢的书，明版绿君亭(汲古阁)刻《苏米志林》，乾隆十二年(1747)初刻沈德潜著《杜诗偶评》，就是由小市地摊上买到的。

五十年代以后，等级较低的售旧书处所逐渐消失。文化大革命以后，旧书稀如星凤，其中的线装刻本成为和璧秦玺，出售处所只剩中国书店一家。有一天，一位喜欢逛书店的朋友谈起琉璃厂的情况，举一些例说明货之少和价之高，只记得劣拓粗裱的《郑文公上下碑》，定价超过千元。这使我想起当年由小市地摊买到乾嘉精拓当时裱本《始平公造像记》的情况，其价只是一角，不免兴起对于“旧游”的回忆。

张中行(1909—)，河北香河人。现代文学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担任该系教授，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著作有《文言和白话》、《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说书集》、《张中行小品》等。

关于书

□ 萧 乾

听出版社的人说，近年来一部销量可观的书是精装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再一打听，原来买主大多是新婚夫妇，而用途则是装饰新房。

最初听了，当然很不是滋味。倘若莎翁在天有灵，对他的遗著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所走的这种鸿运，必然深感痛心。可是想起另外一些只追求多少条腿和几大件的新婚夫妇来，又觉得这种雅兴未可厚非了。

小时上学走过朱门，经常看到上面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有的是逢年贴出来，更多的是红地黑字漆上去的。

所以我从小就认定‘诗书’是高尚的。人不读书，就没出息。大概我母亲当年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宁可出去为人佣工，也一定要我读成书。我十来岁上母亲去世，从此就寄养在一位堂兄家。初中还没毕业，他逼迫我辍学去当邮递员，我就同他崩了。

最早读的书，往往是强迫性的。那就是上私塾时读的《大学》、《中庸》。我后来又上了教会学校，因而除了‘人手足刀尺’还有《圣经》。现在谈读书，指的当然不是这些，而是课外自选的，甚至是偷偷摸摸读的。我头一本接触的这类书是《济公传》。那真是冒了挨板子的风险，放到书桌底下或藏在被窝里读的。我喜欢那位玩世不恭的和尚的仗义，也赞赏他的滑稽。

一九二六年，我同新文艺作品结下不解之缘。那年暑假，我考上了北新书局的练习生。白天，我干的是校对、打包等活儿，还骑着自行车给印刷厂送稿，到作家（鲁迅、冰心、周作人、徐祖正等）府上去取稿，或面送酬金。

我应当感激北新的老板李小峰。那时他准许我下班后，晚上可以从门市部借几本书带回大兴公寓去读。我个人的读书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根本没人指导，什么《太平天国文件》、《吴稚晖文集》、《兰生弟日记》，甚至《性史》，逮着什么读什么。当然，在看鲁迅和冰心早期作品的校样时，我也一边校对一边读了。

最早指导我系统地读中外名著的，是杨振声老师。他不但教我认真地读了鲁迅、郁达夫、蒋光慈、沈从文、茅盾、叶绍钧的书，也把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介绍给我，他讲课总是慢条斯理，井井有条。一边讲，一边还在思索。而且他一向是先介绍作家生平时代背景，然后才一本本地讲作品内容。他的讲课甚至使我对胶东口音也产生了特殊感情。

三十年代初期的大学图书馆不但开架，而且开库！暑假期间，我经常成天呆在燕京、清华或北图的书库里。那真可以说是徜徉于天堂。后来到了剑桥，就更便当了。书库里，一排排书架尽头，迎窗摆着一张张小书桌，桌与桌之间还隔着块木板，以免互相干扰。书嘛，随便从架子上拣。上午看不完，放在桌上，下午再看，甚至今天看不完，也可以搁在那里，第二天接着看。

参观一家图书馆，我首先要看它的卡片做法。七十年代的一天，我去北图查看一位英国小说家生平的资料。拉开卡片匣，里面只插着一个分类卡：“文学”。天哪，那叫什么图书馆。并不是西洋月亮特别圆，而是国外大学图书馆里，不但分类细，交叉卡也多。你找一个作家的资料，不但有专书卡，并且还有交叉卡告诉你，某部文学史或个人文集中，也有关于这位作家的一章或一节。我们的图书馆如今也有了研究员，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希望尽多地搞一些

交叉卡。

有人问过我生平最喜欢哪家食堂。我想了想，还是三十年代北图大楼后身的那个食堂好，饭菜可口，有两三毛钱就能吃个饱。吃完就又回书库去了。剑桥的图书馆就缺这个设备。

在‘文革’后期，我因懂点外文，被编入出版界的一个翻译组。最初只是翻译上边指定的书，什么《美国海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之类。后来，领导给了我一个美差，调查国外新到的书中，有什么值得一译的。于是，经介绍，我就又进了北图的书库。那时梅绍武君正负责国外大学新交换来的书，我每次去，必在他的架子上有所发现。另外，我还同科学院的图书馆也联系上了。我总是先把那些洋书粗略浏览一下，然后选出‘可能值得一读’的对象。他们每次准许我借上十本。好在我那辆自行车前头有个筐子，后头又有架子。我把它们带回我那个用门洞改造成的斗室里，就尽情地捧读起来。忘记了那时的风声鹤唳，也忘记自己那牛鬼蛇神身份。我写的“审读报告”，有的竟超出万言。因为光写评价还不够，对于所建议翻译的书，还得摘要介绍其内容。

“四人帮”倒台之前，在外贸学院任教的友人姚念庆（已歿），曾约我去他的学校做一次讲演。一九七七年，我又在商务印书馆的业务会议上，就这项审书业务的经验做过一次发言。当时，我已经重新被称为‘同志’了，商务还在所出《译书消息》（第1期，1978年6月25日）上，把我的发言提纲刊登出来。那是一九五七年后，我第一回当众那么长篇大论地絮叨。最近偶然在废纸堆中发现了它，今附在本文后，作为我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点读书经验介绍。

生活中，大量的只是泛泛之交，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知音。能通宵达旦深谈的，总是极少数。

书也是这样。大多只是翻翻，有些从头读到尾，而能反复精读，百读不厌的，毕竟也寥若晨星。

然而正如生活中不能没有朋友，生活中也不能没有书。那可是

难以想象的悲惨境地。

书真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它能使人插翅生翼，忽而飞向远方，忽而回到古代，有时甚至把人带到朦胧的未来。忙时，你尽可能冷落它，丢在一边，它也不气恼。但它随时都准备给你快乐，尤其在你孤寂、痛苦或卧病在床时。我就是在国外病榻上接触《好兵帅克》这本书的。它使我忘记了病痛，捧着那本书兀自笑个不停。于是，那个捷克丘八在我心目中就成了个洋济颠。

我最早接触的外国小说家是新西兰的曼殊斐尔（即曼斯菲尔德）。我是通过在北新当学徒的职业关系遇到她的。那时李小峰老板派我去北大红楼图书馆抄录徐志摩译的曼殊斐尔小说。说来这应属于“强迫性”的读书。然而她那些悲恻感人的故事拨动了幼小的心弦。我不时地随抄随呜咽，泪水沾湿了面前的稿纸。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九二七年李安宅兄送给我的那本英文原著：曼殊斐尔的《稚气集》（伦敦康斯勃公司 1924 年版）。

我最怀念老北京的东安市场、隆福寺以及厂甸的旧书摊，正如我怀念剑桥市中心广场那家“大卫书摊”。怀念，是因为如今它们都已消失了。在东安市场买书，还要“斗智”。书商一旦发现你看中了那本书，他必然要大大抬高价码。于是就同时从架子上取下三四本书，请他一一开价。这时就像压宝一样，他摸不清哪本是我真正看中的。等他一一报了价码之后，我才说出自己真正要买的那本。这种办法初试很灵，后来他也不上当了。凡是我挑出的书，他一律都加了码。

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编《大公报·文艺》时，收藏了足足一箱子作家的签名本。八·一三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经香港带到汉口。后来要随杨振声、沈从文二位先生去大西南，实在搬不动了。于是就寄存在法租界的好友刘德伟家，多天真啊！随着战火的蔓延，它们自然早已化为灰烬。

最后一次浩劫，当然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从那以后，我对

藏书再也打不起兴致了。现在，我只求让书能尽量派上用途。八十年代两次访问新加坡，他们送了我四五百本书，我都转送给汕头大学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了。近年来台湾及香港友人陆续送我的上百种书，我也都转送给与台港文学有关的刊物或出版社了。

有一种书我是舍不得送人的，那就是工具书，不管是词典、字典还是百科全书。我把它们当作救火队。成套的书，我也保持完整，不零拆。

三十年代，曾掀起过一阵为青年开书单之风。西方文人也常喜公布自己生平所爱读的书。其中我最欣赏托尔斯泰在一封信中所开列的。

他是按一生不同时期开列的。分为：幼年至十四岁，十四至二十，二十至三十五，三十五至五十，五十至六十三岁（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时期所喜欢的书都不同，并且在每本书后面分别注上“了不起”、“十分伟大”一类评语。他小时候喜欢读童话《小黑母鸡》、青年时期爱读的书中有席勒的《强盗》，入了中年喜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英国一些不见经传的小说，晚年则喜读《圣经》、孔孟之书（“非常伟大”）和佛经。

西方读书界还经常请人开两种书目，一种是“你认为世上最坏的书”，另一种是“假若你定居沙漠，随身只准带书六册，你带何书”。这实际上就是征询最坏及最佳之作。

世界上最早焚书的是秦始皇。公元六四〇年，埃及亚历山大被阿拉伯的统帅峨玛占领后，也烧了二十万册。接着，一四九七年，意大利又由于改革家撒翁拿柔拉宣传异教，而引起一次焚书，连但丁的《神曲》及薄伽丘的《十日谈》也未能幸免。

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文革”，实际上也是一次“焚书”，数量也许打破了纪录。

拿起一本书，我喜欢先看序跋，主要是为了预先知道作者的意

图。一般情形下，我不赞成请旁人写序，因而对这种序读来也总有些保留。序中往往是些空洞的褒嘉之词。我平生只是处女作《篱下集》（1935）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沈从文先生写了一篇“题记”，现在已记不清是他主动写的，或商务要求的，还是我请托的了。从那以后，我的任何一本书，都未再请人写过序。我也一向怕人找我写序。我总觉得一本书应当靠它自身的价值去与读者见面。我本人写的或翻译的书大多印有自己的序跋——尤其是一九七九年以后重印的。我认为不管是创作还是翻译，作者或译者都有义务向读者交代一下自己的初衷和意图。译者尤其有责任详尽地向读者介绍一下原作者的生平、艺术观点以及作品的时代背景，起码要说明翻译时的一些体会，为什么要译它。每当读大厚本的译作而不见译者任何交代时，我就觉得很遗憾，觉得译者可能是不负责任地抓到什么译什么。

尽管最近一个时期，由于主客观原因，书市上出现了不少坏书，然而综观过去这十年，总的来看，这还是出版史上一个繁荣阶段，尤其是出了一些有益的工具书及成套的丛书。希望出版事业在九十年代能进入一个更茁壮、更健康、更繁荣的高潮。

萧乾（1910—1999），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曾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文艺报》副主编、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著有《萧乾选集》、《书评研究》、《这十年》等，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好兵帅克》、《尤利西斯》等。

我和书

□季羨林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爱书如命的人。我愿意加入这一行列。

书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但也能给人带来麻烦,带来灾难。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里,我就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1976年地震的时候,也有人警告我,我坐拥书城,夜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书城将会封锁我的出路。

批斗对我已成过眼云烟,那种万一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我“死不改悔”,爱书如故,至今藏书已经发展到填满了几间房子。除自己购买以外,赠送的书籍越来越多。我究竟有多少书,自己也说不清楚。比较起来,大概是相当多的。搞抗震加固的一位工人师傅就曾多次对我说:这样多的书,他过去没有见过。学校领导对我额外加以照顾,我如今已经有了几间真正的书窝,那种卧室、书斋、会客室三位一体的情况,那种‘初极狭,才通人’的桃花源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

有的年轻人看到我的书,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问我:“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我坦白承认,我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那么,你要这么多书干嘛呢?”这确实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藏书心理学,三言两语,我说不清楚。我相信,古今中外爱书如命者也不一定都能说清楚。即使说出原因来,恐怕也是五花八门的吧。

真正进行科学研究，我自己的书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搞的这一行有点怪。我还没有发现全国任何图书馆能满足，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我的需要。有的题目有时候由于缺书，进行不下去，只好让它搁浅。我抽屉里面就积压着不少这样的搁浅的稿子。我有时候对朋友们开玩笑说：“搞我们这一行，要想有一个满意的图书室简直比搞四化还要难。全国国民收入翻两番的时候，我们也未必真能翻身。”这决非耸人听闻之谈，事实正是这样。同我搞的这一行有类似困难的，全国还有不少。这都怪我们过去底子太薄，解放后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时积重难返。我现在只有寄希望于未来，发呼吁于同行。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日积月累，将来总有一天会彻底改变目前这情况的。古人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让我们大家都来当种树人吧。

季羡林（1911—），山东清平（今临清）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系主任。译有大量印度古代文学作品，如《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等。散文写作造诣极高，有散文集《朗润集》、《天竺心影》和《季羡林选集》行世。

书 缘

□侯仁之

读书人爱书，自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我的记忆中，由于读书爱书而结下的人间情谊，更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因缘，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因以‘书缘’为题，写下这篇小记。

教我爱书的，首先是我的母亲。还记得在我初入小学时，母亲就要我爱惜自己的书本，每册书本，一定要包好书皮，并且不得在书本上乱写乱画。这就开始培养了我爱书的习惯。但是从爱书又为我引发了在人生道路上一种坎坷情谊的，却是从我在初中一年级时偶尔阅读了冰心的《超人》开始的。从这本富有写实意味的新文学创作集中，我获得了自己心灵上一种未曾有过的感受。我曾把它比做‘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命的小溪’；又好像是‘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期的心扉’。从此我开始热衷于当时所谓新文学书刊的涉猎，并且养成了课外阅读的习惯。高中三年我虽然选读了“理科”，却仍然保持着对新文学读物的爱好。完全出乎意外的是这点爱好，对我投考大学又是十分有利的。当时（1932）我所在的潞河中学，可以保送学习成绩达到一定标准的毕业生，参加燕京大学的特别入学考试，只考中文和英文两门。我参加投考的那一次，是要到燕大校内去应试的。这次的英文试题，我已毫无印象。可是国文试题，我却终生难忘。我清楚记得前来考场命题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女老师。她只要求写作‘白话文’和‘文言文’各一篇，并随手把白话

文的题目‘雪夜’和文言文的题目‘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写在黑板上。稍等了一会，不见有问题，她就走了，另有人前来监考。事后我才知道，这次亲来命题的，正是《超人》的作者冰心。而我自己对这两个题目，也颇觉得得心应手。结果也就比较顺利地被录取了，并且获得了入学的奖学金。因此我就一直心许冰心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了。现在冰心师已是 93 岁高龄，我自己也已年逾古稀，而我对冰心师的情谊，自觉有增无已。特别是读了她近年的写作如“我请求”诸文之后，更是如此。最近北大附小的小同学们，在辅导员的组织领导下，有计划地阅读了冰心师的《再寄小读者》之后，纷纷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学校经过精选，要印一本专集，却委托我去面请冰心师题写书名。我欣然前往。冰心师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还立即取出最近刚出版的《冰心近作选》（舒乙、周明明编）送给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那么，你给起个书名吧。”我兴之所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就叫做《我的小读者》”不好么？事后冰心师还是经过进一步的考虑，终于用墨笔写下了《小读者的回响》这个书名。我看了之后十分高兴，因为含义更加明确。同时我也殷切期待着在今天的“小读者”中将会有新一代的作家学者成长起来。

当初我自己升学到燕大之后，以书为缘的人间际遇，真是一言难尽。但是在学业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洪煊莲师。实际上还是在他的课堂教学之外，他的一部并非主要的著作，却对我产生了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就是他的《勺园图录考》。按“勺园”原是晚明大书法家米万钟所亲自设计的郊居别墅，并亲自绘有《勺园修禊图》画卷，流传人间。二十年代初，燕大新辟校园于海淀，勺园故址适在其中。其后又以重价购得《勺园修禊图》。煊莲师遂将该画卷及其作者的有关文献资料，搜集殆尽，然后分类考订，汇集成册，连同复制的《勺园修禊图》，刊行问世（1933 年）。当时正是由于这部书的启迪，我对整个校园的开发过程及其水道源流发生了兴趣。以此为起点，我又进一步对北京西郊园林的兴建与河湖水道的

变迁，陆陆续续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到了抗日战争初期，更扩大到有关北京城内水道演变的探讨。结果终于写成了一篇《北平金水河考》，并以此就教于煨莲师。没想到他竟写给我如下的一段话：“《北平金水河考》已匆匆读过一遍，得见创获累累，胸中为之一快。一年有半以来此为第一次见猎心喜也。中间有尚宜斟酌者若干点，得暇当细为签出，下次相见时，可就而讨论之。’应该说这正是“以书为缘”凝结而成的一种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是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现在煨莲师谢世已十余年，他的遗书中由我珍藏的一种，正是这部《勺园图录考》。

事有凑巧，当我正在考虑起草这篇短文时，北大“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中心”为创刊中的《国学研究》征稿于我，并以‘跋《勺园修禊图》’命题，我不能辞，虽然我所能写下的，也很难超出《勺园图录考》的范围。

最后，我不能不讲到‘以书为缘’，在异国的同好中，也同样是可以结交为良朋好友的。且举最近的一例于下。

1984年春，也就是中美两国首都缔结为友好城市的时候，我正应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进行北京与华盛顿在城市规划上的比较研究。该系瑞溥思(John Reps)教授是研究华盛顿城市建设的专家，承他以所著《杰出的华盛顿——首都中心部分的规划设计及其发展》(1967)一书见赠，以此为主要参考，我得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的专题研究。此后不久，我所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立即寄他一部。他十分高兴，不仅予以高度评价，而且他还和夫人共同手举这部图集，拍了一幅照片寄给我。这就不仅是学术上的交流，而是已经深化为一种‘情谊’上的表示了。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去年4月写信告诉我说，他的一部新著《华盛顿的展视——1970年以来的首都》，将于10月出版，只因这部书太大，将由海运寄我。他先期来信告诉我，因为这部大书写明是献给我和他的一位

研究莫斯科城市建设的好友、莫斯科建筑学院阿茨涅戈尔（Sergey Oznegor）教授的。我再三阅读了这封来信之后，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因为这无异是通过瑞溥思教授这部新著，又进一步把三个各自热爱自己首都的异邦学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去年 8 月我出访荷兰和美国，经过预先联系，也就顺便于 11 月中再访康奈尔大学。又恰逢阿茨涅戈尔教授前来驻校讲学，于是在一个简短的仪式上，我们共同接受了瑞溥思教授的这部新著。书内正文开始前的一整页上，排行整齐地印着：

给我的朋友和同事
在北京和在莫斯科的
侯仁之和阿茨涅戈尔

这不正是“以书为缘”而缔结的一种极为难得的人间情谊么！

侯仁之（1911—），山东恩县人。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1936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英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和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和地理系主任。著有《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的北京城》和《步芳集》等。

尽信书,不如无书

□何其芳

书帮助我们，也害了我们。

这话又怎样讲？

详细一点说，有的书，说了一些真话的书，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推动我们走向人生之正途。而有的书，那些说假话的书，则使我们头脑糊涂，眼睛不亮，做了许多傻事，走了许多冤枉路也。

说来话长。姑举一例以明之。

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拜伦没有好感。其实我并没有好好念过他的诗，而却有了成见，你说怪不怪呢？这完全是法国的有名的传记作家兼资本家安德烈·莫洛亚的《拜伦传》害了我的。莫洛亚先生的文章是蛮轻松的，我读了他的雪莱传（即《爱侬儿》），就又去找他的《拜伦传》来读。那已经是一九三四年左右的事情了。现在还大约记得的，是他写拜伦与其异母姐姐有恋爱关系，同居关系；而且他不断地和这个女的好又接着和那个女的好；在意大利时，他过着很奢侈的生活，他一出游后面就跟着载鳄鱼、猎犬、女人的车子。总之把他写得很荒淫的样子。过去关于拜伦的一点知识抵抗不了这种影响，于是在我脑子里他就成了一个单纯的“堂·璜”了。

一直到抗战以后，读了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中讲拜伦的那一章，我脑子里的拜伦才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才活生生地感到他是一个为自由与民主而战的猛士，一个狂暴地震动了英

国当时的统治阶层，因而受到压制、迫害与诽谤的反叛者。而这正是他成为大诗人的主要原因。

爱伦堡有一篇文章，其中说到莫洛亚是个工厂的老板，而他开舞会介绍他的小姐到社交界之奢华铺张，光怪陆离，刚好说明他自己正是一个荒淫者。他之所以讨厌拜伦，并把拜伦写成一个讨厌的人物，岂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夫子这句话有些道理。但是他这句话也不可尽信。问题在看是什么样的书：说假话的书抑是说真话的书。如何辨别这两类书，与辨别真假都有的第三类书中的真话和假话，除了必要的知识之外，主要还是靠我们读书时有一种思索的批评的态度。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期间，和卞之琳、李广田合出诗集《汉园集》，被称为“汉园三诗人”。1938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4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有《何其芳文集》（1—6卷）、《何其芳散文选集》等行世。

谈读书和‘格式塔’

□金克木

现在人读书有个问题：书越来越多，到底该怎么读？

汉朝人东方朔吹嘘他“三冬，文史足用”。唐朝人杜甫自说“读书破万卷”。宋朝以后的人就不大敢吹大气了。因为印刷术普及，印书多，再加上手抄书，谁也不敢说书读全了。于是只好加以限制，分出“正经书”和“闲书”；“正经书”中又限制为经、史，甚至只有“九经、三史”要读，其他书可多可少了。

现在我们的读书负担更不得了。不但要读中国书，还要读外国书，还有杂志，报纸，即使请电子计算机代劳，我们只按终端电钮望望荧光屏，恐怕也不行。一本一本读也不行，不一本一本读也不行。总而言之是读不过来。光读基本书也不行；数量少了，质量高了，又难懂，读不快，而且只是打基础不行，还得盖楼房。怎么办？不说现代书，就说中国古书吧，等古籍整理出来不知何年何月，印出来的只怕会越多而不是越少，因为许多珍贵古籍和抄本都会印出来。而且古书要加上标点注释和序跋之类，原来很薄的一本书会变成一本厚书。古书整体并没有死亡，现在还在生长。好像数量有限度，其实不然。《易经》、《老子》从汉墓里挖出了不同本子。《红楼梦》从外国弄回来又一个抄本。难保不再出现殷墟、敦煌、吐鲁番之类。少数民族有许多古书还原封未动，或口头流传。古书像出土文物，有增有减，现在是增的多减的少。也许理科的情况好些，不必再

去读欧几里德、哥白尼、牛顿的原著了，都已经现代化进了新书里了；可是新书却多得惊人，只怕比文科的还生长得快。其实无论文理法工农医哪一行，读书都会觉得忙不过来吧？何况各学科的分解、交叉、渗透越来越不可捉摸，书也跟着生长。只管自己一个研究题目，其他书全不看，当然也可以，不过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中的人若总是好像‘套中人’，不无遗憾吧？

现在该怎么读书？这个问题只怕还没到有方案要作可行性审议的时候。不过看来对这问题感到迫切的是成年人或者中年人。儿童和青少年自己未必有此感觉。他们读书还多半靠别人引导。一到成年，便算一进大学吧，开始有人会感觉到了，也未必都那么迫切。有幸进大学的人多半还忙于应付考试，其他人也忙于为各种目的而自学或就业，无暇也无心多读书。老年人还有那么大的好奇心和读书兴趣的怕不太多。读书能力，至少是目力和记忆力，到老年也会大不如前了。所以书读不过来的问题只怕主要是从二十几岁到五六十岁以知识为职业的人的烦恼。实际上，范围恐怕还要小。从事某一专题研究的人未必都有此感觉。读书无兴趣的人也未必着急要读书。所以真正说来，这问题只是少数敏感的大约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人感到迫切。对这些人讲读基本典籍当然对不上口径。这也许是有人想提倡读基本书而未得到响应的原因之一吧？书卖得多的未必读的人多，手不释卷的人也许手中是武侠和侦探小说或则试题答案，嚷没工夫读书的人说不定并不是急于读书，所以不见得需要讲什么读书方法和经验，不过闲谈几句读书似也无妨。

照我的想法，同是读书人，读同类的书，只讲数量，十八岁的不会比八十岁的读得多。这不成问题，所以刚上大学不必为不如老教授读书多而着急。应当问的是：自己究竟超过了那位八十岁的老人在十八岁时的情况没有？若是超过了或大致相等，就可放心；若是还不如，那就该着急了。不会件件不如，应当分析比较一下，再决定怎么办。读书还不能只比数量，还得比质量，读的什么书，读到了什

么。我想,教书的人,特别是教大学的人,应当要求十八岁的学生超过十八岁的自己,不应当要求学生比上现在的自己。我教过小学、中学、大学,每次总觉得学生有的地方比我强。这自然是我本来不行之故,却也可供参考。我自己觉得有不如学生之处,也有胜过学生之处,要教的是后者,不是前者。也许这就是我多次教书都尚未被学生赶走之故吧?甚至还有两三次在讲完课后学生忽然鼓掌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其实那课上讲的并不是我有什么独到之处。由此我向学生学到了一点,读书可以把书当作教师,只要取其所长,不要责其所短。当然有十几年的情况要除外,正如有些书要除外一样。

话说回来,二三十岁的人如果想读自己研究以外的书,如何在书海之中航行呢?我的航行是迷了路的,不能充当罗盘。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诀窍。假如必须说点什么,也许只好说,我觉得最好学会给书‘看相’,最好还能兼有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的本领。这当然都是说的老话,不是指现在的情况。我很佩服这三种人的本领,深感当初若能学到旧社会中这三种人的本领,读起书来可能效率高一点。其实这三样也只是一种本领,用古话说就是‘望气术’。古人常说‘夜观天象’;或则说望见什么地方有什么‘剑气’;什么人有什么‘才气’之类,虽说是迷信,但也有个道理,就是一望而见其整体,发现整体的特点。用外国话说,也许可以算是一八九〇年奥国哲学家艾伦费尔斯(Ehrenfels)首先提出来,后来又为一些心理学家所接受并发展的‘格式塔’(Gestalt 完形)吧?二十世纪有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探讨这个望其整体的问题,不过不是都用这个术语。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世纪末,各门学术,又是分析,又是综合,又是推理,又是实验,现在仿佛有点殊途同归,而且越来越科学化、数学化、哲学化了。这和技术发展是同步前进的。说不定到二十一世纪会像十九世纪那样出现新局面,使人类的眼光更远大而深刻,从而恢复自信,减少文化自杀和自寻毁灭。

从前‘看相’的人常说人有一种‘格局’。这和看‘风水’类似。王充《论衡》有《骨相》篇,可见很古就有。这些迷信说法和人类学、地理学正像炼丹术和化学,占星术和天文学一样,有巫术和科学的根本区别,却又不是毫无联系,一无是处。不论是人还是地,确实有一种‘格局’。王充说的‘骨法’或说是结构、模式,不过从前人由此猜测吉凶祸福是方向错了,结论不对。但不必因此否认人和物自有“格局”。

从前在图书馆工作的人没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甚至书目还是书本式,没有变成一张张分立的卡片。书是放在架上,一眼望去可以看见很多书。因此不大不小的图书馆中的人能像藏书家那样会‘望气’,一见纸墨、版型、字体便知版本新旧。不但能望出书的形式,还能望出书的性质,一直能望到书的价值高低。这在从前是熟能生巧之故。不过有些人注意了,可以练得出一点这种本事,有些人对书不想多了解,就不练这种本事。编书目的,看守书库查找书的,管借书、还书的,都可能自己学得到,却不是每人都必然学得到。对书和对人有点相似,有人会认人,有人不会。书也有点像字画。

从前报馆里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没有这么多栏目互相隔绝,也没有这么多人合管一个版面,更没有电子计算机之类现代工具。那时的编辑‘管得宽’,又要抢时间,要和别的报纸竞争,所以到夜半,发稿截止时间将到而大量新闻稿件正在蜂拥而来之时,真是紧张万分。必须迅速判断而且要胸有全局。一版或一栏(评论、专论)或一方面(副刊、专栏)或整个报纸(总编辑负责全部要看大样),都不能事先印出、传来传去、集体讨论、请示、批准,而要抢时间,要自己动手。不大不小的报纸的编辑和记者,除社外特约的以外,都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其他,既要记住以前,又要想到以后,还要了解别家报纸,更要时时注意辨识社会和本报的风向。这些都有时间系数,很难得从容考虑仔细推敲的工夫,不能慢慢熬时间,当

学徒。这和饭碗有关，不能掉以轻心。许多人由此练出了所谓“新闻眼”、“新闻嗅觉”、“编辑头脑”。当校对也很不容易，要学会一眼望过去错别字仿佛自己跳出来。慢了，排字工人不耐烦；错了，编辑会给脸色看。工资不多，地位不高，责任很重，非有本领不可。

以上说的都是旧社会的事。“看相”早已消灭了，图书馆和报馆也不是手工业式了，人的能力很多都让给机器了。可是读书多半还是手工业式，集体朗诵也得各人自己听，自己领会，所以上面说的“望气”本领至少现在对于读书大概还有点用处。若能“望气”而知书的“格局”，会看书的“相”，又能见书即知在哪一类中、哪一架格上，还具有一望而能迅速判断其“新闻价值”的能力，那就可以有“略览群书”的本领，因而也就可以“博览群书”，不必一字一句读下去，看到后头忘了前头，看完了对全书茫然不知要点，那样花费时间了。据说诸葛亮读书是“但观大略”，不知是不是这样。这也不见得稀奇，注意比较，注意“格局”，就可能做到。当然搜集资料、钻研经典、应付考试都不能这样。

其实以上说的这种“格式塔”知觉在婴儿时期就开始了。辨别妈妈和爸爸的不同不是靠分析、综合、推理而来，也不是单纯条件反射。人人都有这种本领，不过很少人注意自己去锻炼并发展。科学家对此的解说还远未完成，所以好像有点神秘，实际上平常得很。可惜现在图书馆不让人人进书库，书店不让人人走到书架前自己翻阅，书摊子只卖报纸杂志通俗书，报馆不让人人去实习，而且分工太细又互不通气，时间性要求不强，缺少紧迫感，要练这种“略览”又“博览”的“望气”工夫比学武术和气功还难。先练习看目录、做提要当然可以，另外还有个补救办法是把人代替书，在人多的地方练习观察人。这类机会可多了。书和人是大有相似之处的。学学给人做新式“看相”，比较比较，不是为当小说家、戏剧家，为的是学读书，把人当作书读。这对人无害，于己有益。“一法通，百法通”，有可能自己练出一种“格式塔”感来。也许这是“宏观”、“整体观”的本

领，用来读书总是有益无害的吧？

我来不及再学这种读书本领了，说出来“信不信由你”，至少是无害的吧。再重复一句，这说的是“博览”“略览”，不是说研究，只是作为自我教育的一个部分，不是“万应读书方”。

金克木（1912—2000），安徽寿县人。现代作家、学者。早年做过教师、图书馆员、报社编辑等。后历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曾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出版有《雨雪集》、《比较文学论集》、《印度文化论集》、《艺术科学丛谈》，以及翻译的印度文学、戏剧作品等。

“伪书”并不全伪

□任继愈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拥有丰富的文物、典籍。有些文物、典籍的内容、作者与产生它的时代不符,称为赝品。典籍中的赝品,学术界称为“伪书”。

伪书的出现,可以有多种情况:有伪造假古董以谋利的^①;有的为了传播某种观点,挟古人以自重的(如汉初以黄帝命名的书^②);宗教经典多假托得自龙宫、仙山洞府以骗取信徒的(如大乘空宗典籍,道教典籍)。如果揭示出伪书出现的时代,伪书即成为可信的材料。《列子》一书托名列御寇作,经过研究,此书非列御寇作,它出于魏晋时期,反映了魏晋时期的一种流派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子》一书用作研究魏晋时代思潮,有它不可取代的价值。放在先秦是伪书,放在魏晋就不伪。

与世俗典籍并行的佛教、道教典籍中也有不少“伪经”。持正统观点的信仰者,为了保持宗教的纯洁性,不能容忍“泾渭杂流,龙蛇并进”^③的现象存在。如果抛开正统观点,从客观研究的立场着眼,查明伪经出现的时代、作者(作者可能是某一人或某一流派),用它来说明作伪的时代以论证某时代思潮,找出它流行的地区以了解其传播的范围,其史料价值比号称“真经”的还珍贵。

有幸生为近代人,可以不受古人旧传统的局限,有可能从文化整体的高度来看待一切“伪书”、“伪文献”,从而剖析它、驾驭它,使

它为我所用。俘虏兵用好了，和正规军同样发挥战斗作用。好像对待污染环境的废气、废液、废渣一样，经过综合治理，回收利用，即可变废为宝。一切物质都在元素周期表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谁说某种元素是有害元素、无用元素，那是无知。

人们习惯所指的伪书、伪经，无非是说它不是所标榜的那种作品。如确凿地指出它的来历，摆在应当安放的位置上，它就是“真书”“真经”；一点也不伪。《老子》说过：“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二十七章）。这是说，只要善于用人，根本没有无用的人（弃人）；只要善于用物，根本没有无用的物（弃物）。弃人和弃物，不过是那些未被认识，未被发现，没有派上用场的人和物罢了。这一层道理，一经说破，不难理解。

伪书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在于它的伪，而在于它有充实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不可代替的。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最后找到归宿，在历史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从此摘去了伪书的帽子。

历史上有更多的不伪的书，号称学术著作，却没有学术性；号称科学著作，却缺乏科学性。因缘时会，也曾行时过一阵子。时过境迁，便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因为这类“真作品”内容空洞，价值不高，不具备充当“伪书”的资格，日后自然无人提起。这种自生自灭的不伪的作品是大量的，它曾大量产生，大批消逝。主持这个淘汰选择的就是广大读者。靠了这个权威最大的裁判者，才使得伪书得以正位，劣而真的作品得以自然消亡。天地间之大公无过于是者。

①据沈兼士先生讲，甲骨片刚发现时，收藏家潘祖荫喜收集甲骨拓片，琉璃厂书商竟在烤制烧饼的背面拓出纹理冒充甲骨拓片。这是我当年在沈先生文字学课堂亲身听到的掌故。

②《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等。

③晋代名僧道安语。

任继愈（1916—），山东平原人。中国哲学史专家、宗教学家。

193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为北京大学教授。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哲学文学会会长等职。著有《中国哲学史论》、《老子新译》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词典》等。

图书对我的教益

□谢义炳

图书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标志。怎样对待图书，因人而异。同一个人，对待图书的态度，也因年龄、思想感情和文化修养的增长变化而有所不同。

我的初中是在一所大学的实验学校念的，应当说有幸处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社会条件下。我不满足于课堂教学的内容，寒暑假期间，求上大学和任助教的大朋友们带我进入大学图书馆。我选读的是一些文学月刊、季刊，分期连载的“人猿泰山”、“福尔摩斯”等兴趣型小说。

高中与大学时期功课繁重，进图书馆的主要目的，是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复习消化或预习课堂讲授的内容。偶尔进入书库，也只翻阅一些有助于进一步消化课堂教学内容的书籍，做研究生和任教师后直到接近老年的期间，出入书库次数多了，专业期刊翻阅多了。这三四十年间，阅读书籍主要是为了增强专业方面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以求得在社会上有一个立足之地。

进入老年，回首往事，有许多迷惑不解之处，因而常想一些问题。例如：“假定能回到少年，从头走人生之路，我将如何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自己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正确与错误参半？哪些事完全错了？因此进入书库经常翻阅有关历史、社会的书籍。在阅读专业文献时也不仅限于了解其具体内容，还思索这些专业成果

出现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偶尔阅读小说，也不仅限于追随主人翁的思想感情，也想了解小说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读《红楼梦》如此，读《简爱自传》也这样，对于中西艺术和音乐的形成与演变也试图将其与社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总之，是试图把人类整个文化的发展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思索。

这样，接近暮年，我才感到智慧之光稍稍地照耀了我这个糊涂人。我发现我最大的错误，是不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没有把自己自觉地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正确位置。这是三门干部的悲剧。举个例子说，解放后，我投奔祖国，希望参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任务。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前途无限光明。然而，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顽固性估计不足。他们决不甘心看到我们真正站起来。朝鲜战争的胜利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也使我们或多或少地低估了前进途中的艰难险阻。这就导致了近二十年中的一系列失误。总的还是有进展的，但速度慢下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纠正过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出，又使我们快速前进了。成绩是公认的，朋友们叫好，敌人们侧目。

1978年以来，我曾参加过多次国际会议，访问过不少国家，我发现西方真正的科学家还是正直的。可是，其背后的科技组织者的立场却是很明确的，态度也是咄咄逼人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国际会议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舞台，却与政府间谈判的大舞台一样，也有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的斗争。

一位北大毕业的，我们本行的一位颇有成就的中年科学家，1990年参加一次国际会议后，给我看了他写的一首诗：

陋巷雌风压语低，阔人高调与天齐，
科坛似欲容争辩，政际分明尚竞挤，
异国魂消难入梦，故乡戈枕待鸣鸡，
归去同心埋首干，会当盈尺得扬眉。

我读后，也写了一首诗：

漫道书生狂气大，炎黄子孙几代情，
愿提龙泉三尺剑，叱咤风雷万里行。

然而，我个人老矣，能做的事不多了，谨寄希望于当代中华青年。

谢义炳（1917—1995），湖南新田人。1940年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1949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至今。曾任地球物理系主任，《气象学报》主编。现兼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两种读书人

□ 胡 绳

读书人在古代是有特殊优越的身份地位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读了书就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就有权利获得特殊的生活享受，就有资格做官。倘若不做官，去行医，就是‘儒医’，比普通医生高一等，去带兵，就是‘儒将’，比普通将官也高一等。乃至为娼为丐，倘若知书识字，身价也可以比普通的娼妓、乞丐高一点。

读书人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地位，是封建帝王所有意造成的。

封建帝王虽然推崇读书人，但其实他并不愿意人民普遍地读书，又只准人读一定范围内的书。当帝王高兴时，他也可以让唱戏唱得好的，说笑说得好的，人做大官，他之推崇读书人也还是从这种态度出发。所以他所保护的读书人也只是那甘于为帝王“倡优畜之”的读书人。

这一类读书人，念熟了《圣谕广训》、《四书章句集注》，会写成篇的八股文，进学中举，便俨然以‘民之父母’自居。因为得到帝王的特别维护，就无法无天起来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原来他们从来没有学到什么，所做的自然只是贪赃枉法，害民肥己的事了。

古代的读书人就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封建时代，这样的读书人也并不能代表一切知识分子。在封建时代，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读书人，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读书人，也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读书人。这些可说是真正的读书人，他们只

觉得自己对社会负了更多的责任，对于自己的出处进退有更慎重的考虑，而不觉得自己有权利生活在别人的头上。

这样的真正的读书人，因为骨头太“硬”，太不“知趣”，不会“逢迎”，专说些使人“扫兴”的话，所以是封建帝王所不喜欢的。他们也就常常只能过着饥寒流离的生活。他们自己也甘于过这种生活，因为他们羞于和那些厕身于倡优之列的“读书人”为伍！

胡绳（1918—2000），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孙中山研究学会会长。撰有《思想方法》、《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枣下论丛》等。

读廉价书

□汪曾祺

文章滥贱，书价腾踊。我已经有好多年不买书了。这一半也是因为房子太小，买了没有地方放。年轻时倒也有买书的习惯。上街，总要到书店里逛逛，挟一两本回来。但我买的，大都是便宜的书。读廉价书有几样好处。一是买得起，掏出钱时不肉痛；二是无须珍惜，可以随便在上面圈点批注；三是丢了就丢了，不心疼。读廉价书亦有可记之事，爱记之。

一折八扣书

一折八扣书盛行于三十年代。中学生所买的大都是这种书。一折，而又打八扣，即定价如是一元，实售只是八分钱。当然书后面的定价是预先提高了的。但是经过一折八扣，总还是很便宜的。为什么不把定价压低，实价出售，而用这种一折八扣的办法呢？大概是投合买书人贪便宜的心理，这差不多等于白给了。

一折八扣书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等等。但也有文笔好，内容有意思的，如余澹心的《板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也有旧诗词集。我最初读到的《漱玉词》和《断肠词》就是这种一折八扣本。《断肠词》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封面是砖红色的，一侧画一枝滴下雨滴墨水的羽毛

笔。一折八扣书都很薄，但也有较厚的，《剑南诗钞》即是相当厚的两本。这书的封面是米黄色的铜版纸，王西神题签。这在一折八扣书中是相当贵的了。

星期天，上午上街，买买东西（毛巾、牙膏、袜子之类），吃一碗脆鳝面或辣油面（我读高中在江阴，江阴的面我以为是做得最好的，真是细若银丝，汤也极好），几只猪油青韭馅饼（满口清香），到书摊上挑一两本一折八扣书，回校。下午躺在床上吃粉盐豆（江阴的特产），喝白开水，看书，把三角函数、化学分子式暂时都忘在脑后，考试、分数，于我何有哉，这一天实在过得蛮快活。

一折八扣书为什么卖得如此之贱？因为成本低，除了垫出一点纸张油墨，就不须花什么钱。谈不上什么编辑，选一个底本，排印一下就是。大都只是白文，无注释，多数连标点也没有。

我倒希望现在能出这种无前言后记，无注释、评语、考证，只印白文的普及本的书。我不爱读那种塞进长篇大论的前言后记的书，好像被人牵着鼻子走。读了那样板着面孔的前言和啰嗦的后记，常常叫人生气。而且加进这样的东西，书就卖得很贵了。

扫叶山房

扫叶山房是龚半千的斋名，我在南京，曾到清凉山看过其遗址。但这里说的是一家书店。这家书店专出石印线装书，白连史纸，字颇小，但行间加栏，所以看起来不很吃力。所印书大都几册作一部，外加一个蓝布函套。挑选的都是比较严肃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古籍，这对于置不起善本的想做点学问的读书人是方便的。我不知道这家书店的老板是何许人，但是觉得是个有心人，他也想牟利。但也想做一点于人有利益的事。这家书店在什么地方，我不记得了，印象中好像在上海四马路。扫叶山房出的书不少，嘉惠士林，功

不可混。我希望有人调查一下扫叶山房的始末，写一篇报告，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将是有意思的一笔，虽然是小小的一笔。

我买过一些扫叶山房的书，都已失去。前几年架上有一函《景德镇实录》，现在也不知去向了。

旧书摊

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为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闷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

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我应当在昆明旧书店里也买过几本书，是些什么书，记不得了。

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有时是陪黄裳去，有时我自己去。也买过几本书。印象真凿的是买过一本英文的《威尼斯商人》。其时大概是想好好学学英文，但这本《威尼斯商人》始终没有读完。

我倒是在地摊上买到过几本好书。我在福煦路一个中学教

书。有一个工友，姑且叫他老许吧，他管打扫办公室和教室外面的地面，打开水，还包几个无家的单身教员的伙食。伙食极简便，经常提供的是红烧小黄鱼和炒鸡毛菜。他在校门外还摆了一个书摊。他这书摊是名副其实的“地摊”，连一块板子或油布也没有，书直接平摊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老许坐于校门内侧，手里做着事，择菜或清除洋铁壶的水碱，一面拿眼睛向地摊上瞟着。我进进出出，总要蹲下来看看他的书。我曾经买过他一些书——那是和烂纸的价钱差不多的，其中值得纪念的有两本。一本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这本书现在大概还在我家不知哪个角落里。一本在我看来，是很名贵的：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我对董西厢一直有偏爱，以为非王西厢可比。汤显祖的批语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总批，都极精彩。这本书字大，纸厚，汤评是照手书刻印的。汤显祖字似欧阳率更《张翰》帖，秀逸处似陈老莲，极可爱。我未见临川书真迹，得见此影印刻本，而不禁神往不置。“万有文库”算是什么稀罕版本呢？但在我这个向不藏书的人，是视同珍宝的。这书跟随我多年，约十年前为人借去不还，弄得我想引用汤评时，只能于记忆中得其仿佛，不胜怅怅！

小镇书遇

我戴了右派帽子，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沙岭子是宣化至张家口之间的一小站。这里有一个镇，本地叫做“堡”（读如“捕”）。每遇星期天，节假日，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就去堡里逛逛。堡里有一个供销社（卖红黑灯芯绒、风穿牡丹被面、花素直贡呢、动物饼干、果酱面包、油盐酱醋、韭菜花、青椒糊、臭豆腐），一个山货店，一个缝纫社，一个木业生产合作社，一个兽医站。若是逢集，则有一些卖茄子、辣椒、疙瘩白的菜担，一些用绳络网在筐里的小猪秧子。我

他们就怀了很大的兴趣。看风穿牡丹被面，看铁锅，看扫帚，看茄子，看辣椒，看猪秧子。

堡里照例还有一个新华书店。充斥于书架上的当然是毛选，此外还有些宣传计划生育的小册子，介绍化肥农药配制的科普书，连环画《智取威虎山》、《三打白骨精》。有一天，我去逛书店，忽然在一个书架的最高层发现了几本书：《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我不无激动地搬过一张凳子，把这几样书抽下来，请售货员计价。售货员把我打量了一遍，开了发票。

“你们这个书店怎么会进这样的书？”

“谁知道！也除是你，要不然，这几本书永远不会有人要。”

不久，我结束劳动，派到县上去画马铃薯图谱。我就带了这几本书，还有一套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到沽源去了。白天画图谱，夜晚灯下读书，如此右派，当得！

这几本书是按原价卖给我们的，不是廉价书。但这是早先的定价，故不贵。

鸡蛋书

赵树理同志曾希望他的书能在农村的庙会上卖，农民可以拿几个鸡蛋来换。这个理想一直未见实现。用实物换书，有一定困难，因为鸡蛋的价钱是涨落不定的，但是便宜到只值两三个鸡蛋，这样的事原先就有过。

我家在高邮北市开了一片中药店万全堂。万全堂的廊下常年摆着一个书摊。两张板凳支三块门板，“书”就一本一本地平放在上面，为了怕风吹跑，用几根削方了的木棍横压着。摊主用一个小板凳坐在一边，神情古朴。这些书都是唱本，封面一色是浅紫色的很薄的标语纸，上面印了单线的人物画，都与内容有关，左边留出长

方的框,印出书名:《薛丁山征西》、《三请樊梨花》、《李三娘挑水》、《孟姜女哭长城》……里面是白色有光纸石印的“文本”,两句之间空一字,念起来不易串行。我曾经跟摊主借阅过。一本“书”一会儿就看完了,因为只有几页。看完一本,再去换。这种唱本几乎是千篇一律,开头总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五帝是和什么故事都挨得上的。唱词是没有多大文采的,但却文从字顺,合辙押韵(七字句和十字句)。当中当然有许多不必要的字,如“开言有语叫张生”、“叫张生”就得了嘛,干嘛还要“开言”还“有语”呢。不行啊,不这样就凑不足七个字,而且韵也押不好。这种“水词”在唱本中比比皆是,也自成为一种文理。我倒想什么时候有空,专门研究一下曲艺唱本里的“水词”。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们的新诗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水词”,字句之间过于拥挤。这是题外话,我读过的唱本最有趣的一本是《王婆骂鸡》。

这种唱本是卖给农民的。农民进城,打了油,撕了布,称了盐,到万全堂买了治牙疼的“过街笑”治肚子疼的暖脐膏,顺便就到书摊上翻翻,挑两本,放进捎码,带回去了。

农民拿了这种书,不是看,是要人大声念的。会唱“送麒麟”、“看火戏”的还要打起调子唱。一人唱念,就有不少人围坐静听。自娱娱人,这是家乡农村的重要文化生活。

唱本定价壹佰贰拾文左右,与一碗宽汤饺面相等,相当于三个鸡蛋。

这种石印唱本不知是什么地方出的(大概是上海),曲本作者更不知道是什么人。

另外一种极便宜的书是“百本张”的鼓曲段子。这是用毛边纸手抄的,折叠式,不装订,书面写出曲段名,背后有一长方形的墨印“百本张”的印记(大小如豆腐)。里面的字颇大,是蹩脚的馆阁体楷书,面皆微扁。这种曲本是在庙会上卖的。我曾在隆福寺买过几本。后来,就再看不见了。这种唱本的价钱,也就是相当于三个鸡

蛋。

时常想到一个问题。北京的鼓词俗曲的资料极为丰富，可是一直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孙楷第先生曾编过俗曲目录，但只是目录而已，事实上这里可研究的东西很多，从民俗学的角度，从北京方言角度，当然也从文学角度，都是值得钻进去，搞十年八年。一般对北京的曲段多只重视其文学性，重视罗松窗、韩小窗，对于更俚俗的不大看重。其实有些极俗的曲段，如“阔大奶奶逛庙会”“穷大奶奶逛庙会”，单看题目就知道是非常有趣的。车王府有那么多曲本，一直躺在首都图书馆睡觉，太可惜了！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39年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并开始文学创作。毕业后当中学教员，继续写作。建国后，在《北京文艺》、《民间文学》任编辑，后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近年来所写小说、散文风格独特，佳作频出，普遍受到好评。有剧本《沙家浜》、散文集《蒲桥集》等。辑有《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汪曾祺小品》等。

漫谈我的所谓‘做学问’和写文章

□吴小如

我一生只干过两种工作。一是教书。从一九四三到四六年在中学教语文,四七到四八年教家馆(当时是兼操副业),四九年到八〇年一直在大学中文系。二是当编辑。那是在一九四八年,由于混几个编辑费,便由沈从文师介绍给一家报纸编了不足一年的文学副刊。虽属业余性质,总算是另一种工作。今后如果更换职业,我也只想离开高等学府去当编辑。至于学写文章,则从一九三四年即开始试着给报刊投稿,比教书早了近十年。

我最初的梦是当作家。后来知难而退,改钻故纸堆。一度也试图搞翻译,无奈外文过不了关,解放后又多年不动,就更不敢问津了。不过想当作家和想搞翻译却使我养成爱杂览的习惯,因为当时并不懂得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而是迷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即以小说这一门而言,始而是爱看故事,后来便由于想当小说作家而来看小说了。从上小学时我就爱读《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以及《施公案》之类,后来便扩充到神魔小说、谴责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甚至于新老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也学着写过章回体、志怪传奇体的小说。进了初中,开始读鲁迅、茅盾、老舍、冰心等大师五四以来的作品,后来就拼命吞噬翻译小说(也读过一部分英文原著和英译本小说)。当然,我写的东西也由“话说”、“某生者”改成带洋味的短篇了。尽管“写”的梦早已消

失,但读小说的习惯却一直未改。粉碎‘四人帮’后,情不自禁地对当代作品发生了兴趣,这也是风气使然吧。至于其它书籍,尽可依此类推,恕不自我标榜了。

做学问诚然必须读书,而读书却不等于做学问。直到一九三八年入高中,开始听朱经畬老师讲语文课,这才算沾上“学术”的边儿。朱老师从《诗经》、《楚辞》讲起,然后是先秦诸子,《左传》、《国策》、《史记》、《汉书》。我在课堂上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罗根泽这些学者的著作和观点,从而也知道治《诗经》有姚际恒、方玉润,治《左传》要看《新学伪经考》和《刘向歆父子年谱》,读先秦诸子要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古史辨》,以及什么是经学上的今、古文,史学上的‘六家’与‘二体’等等。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我侍先祖母避居北京,每天无事,便钻进北京图书馆手抄了大量有关《诗经》的材料。到四十年代,又因读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而勤搜有关‘四书’的著作。考入北大中文系后,先后从俞平伯师受杜诗、周邦彦词,从游泽承(国恩)师受《楚辞》,从废名(冯文炳)师受陶诗、庾子山赋,从周燕孙(祖谟)师受《尔雅》,从吴晓铃师受戏曲史。每听一门课,便涉猎某一类专书。这就使我扩大了学术视野。于是我沾沾自喜,以为也在‘做学问’了。但这时还未完全甘心放弃笔杆子,时而写点文章求沈从文师指正。自四九年入大学教书,这才闭口不谈创作,一心妄想挤进学者行列,分享‘学术’的一杯羹了。

从所谓‘做学问’这方面看,我受三位老师的影响最深。第一位就是前面说过的朱经畬老师。第二位是俞平伯先生。俞老无论是治经、史、诗、词,还是研究《红楼梦》,始终是从原始材料出发,经过独立思考,在具体问题上时出新见和胜解。俞老所走的正是他曾祖曲园先生所开创的一条治学途径。而我在从俞老受业时因之也学会了如何有根有据地开动脑筋。有一次我曾请教俞老:怎样才能把一篇作品中典故的出处注释确切、讲解清楚。俞老说:“查典故出处首

先要求熟读作品。比如注唐诗，最好唐以前的书你都能熟读。但这显然不可能。那么，至少你必须把所要注的那个作品熟读。然后你只要遇到有关材料，立即会想到那篇作品，从而可以随时随地加以搜辑，自然就得心应手了。’从此，每当我想搞通某一篇文章时，便首先把它记熟，使之寝馈在念；然后再去广泛搜辑资料，庶几一触即发。第三位是逝世已逾两年的游国恩先生。为了悼念游老，今年夏天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里面谈到游老怎样治学问和带徒弟。现在我把它摘抄下来，以供参考。因为其中不仅有游老本人的经验，也包括了我自己的点滴体会：

游老治学的方法和途径，照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尽量述而不作，其次以述为作，最后水到渠成，创为新解；而这些新解却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因此，本固根深，枝荣叶茂，既不会风一吹就倒，更不是昙花一现，昨是今非。所谓述而不作，就是指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部著作，首先掌握尽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不厌其多，力求其全。这是第一步。但材料到手，并非万事大吉，还要加以抉择鉴别，力求去伪存真，汰粗留精，删繁就简，呕心贵当，对前人的成果进行衡量取舍。这就是以述为作。如果步前贤之踵武而犹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成为个人的创见新解。游老毕生孜孜不倦地致力而终于未竟其业的《楚辞长编》，是最能体现这个精神的。……

我在游老主持下，编注了先秦、两汉两本分量较重的文学史参考资料。这实际上是游老在把着手教徒弟。……我通过这一工作，深感游老带徒弟的办法是很科学的。归纳为一句话，即严格要求与放手使用相结合。工作开始时，从选目、体例以及注释中应注意的事项，游老无一不交代得有条不紊。一部分初稿写成，游老仔细批改，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等到我摸熟门径，并表示有信心和决心

完成任务时，游老就郑重宣布：“以后由你自己放手去做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事事请示，我也不再篇篇审阅了。”这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我也敢于动脑筋了。……总之，游老对我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既关心又信任，使我这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既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又体会到做学问的甘苦，既敢于承担重任，又时时不忘游老所指出的方向。……

当然，除这三位老师之外，五十年来，从我上小学直到今天，凡是我接触到的师、友和我教过的青年同学，有不少人都曾给我以后发和影响，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长处。这里就不一一絮表了。

说到写文章，我格外感到惭愧。萧伯纳有句名言：“能者干，不能者教。”我之从梦想当作家而终于变成摇唇鼓舌的教书匠，正说明我是一个无能之辈。十几岁时，我学过作桐城派古文，后来试作骈文不成，才改为摹拟魏晋六朝笔记体，即以《世说新语》为范本，力求文字简洁，不用虚词。结果却使文字失去了光泽，有点像清人写注疏，但又只见其干枯而无其缜密。至于写白话文，始而学老舍，学周作人继而学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学何其芳的《画梦录》。结果学成了四不像：学老舍而失其风趣，成了贫嘴聒舌；学周作人而失其蕴藉，成了文白夹杂；学沈从文而失之艰涩；学何其芳而失之堆砌。记得在中学作文，有一次老师加的批语是：“文章颇像林语堂的‘论语’体，油腔滑调。”这使我大吃一惊。从此大加收敛，力求横平竖直，再不敢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所以我一度曾专门师法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等先生的文章，尽量做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是由于太爱见异思迁，浅尝辄止，不肯痛下苦功，终于没有把文章写成气候。全国解放以后，文风似乎趋向整齐划一，无论写长篇大论或杂文小品，仿佛都存在一种固定的不成文的模式，当然我也如法炮制，并不例外。有时为了想避开这种框框，宁可用浅近文言来写三言五语的札记和随笔，看似开倒车，其实我原是另有考虑的。

说到写学术论文或读书札记，我目前只抱定两条宗旨：一是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哪怕这一看法只与前人相去一间，却毕竟是自己的点滴心得，而非人云亦云的炒冷饭。否则宁缺毋滥，决不凑数或凑趣。二是一定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文章写成，不仅要言之成理，首先须持之有故。要自信，却不可自命不凡；要虚心，却不该心虚胆怯。因为只有味着良心写文章的人才会心虚胆怯的。

吴小如（1922—），安徽泾县人。著名学者、语言学家。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述繁富，有《中国小说讲话及其它》、《古典诗文述略》、《读书丛札》、《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台下人语》等，并译有《巴尔扎克传》。

编书、读书、写书的种种关系

□程毅中

多年来一直在做编辑工作，基本上是读稿而不读书，也就谈不上什么治学了。游国恩先生曾对我们说：“老一辈的人读书是真读，我们这一辈读书主要是翻书了，你们这一辈还是要读点书，至少也要会翻书。”我们当编辑的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主要是翻书，首先是要学会查工具书。翻书当然也能增长知识，也是一种粗略读书的方法，但是代替不了精读。

作为业余的自学，多少也读点书，但少而不精。回顾起来，也有一些正面或反面的经验。首先，业余学习，不能不适应客观条件，最好是结合本职工作来学。既然时间不多，就得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边干边学，在编辑工作中注意发现问题、积累资料和摸索好的工作方法，然后做一些独立的研究，可以事半功倍，对提高书稿质量和个人工作能力都有好处。很多有成就的老编辑都是这样做的，我自己做得并不好，因为意志不坚强，不能排除各种干扰，往往是事倍而功半。

编辑工作的特点之一是杂，因此编辑一向被称为杂家。我在中华书局从事古典文学的编辑工作，比起报刊杂志的编辑，专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然而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刚参加工作时分工较粗，从先秦到晚清，从诗词到小说，从专著到古籍校点，各种类型的稿子都可能碰上，我只能跟着来稿的情况而转移。最初只是跟着书

稿转，觉得很苦恼。后来逐步觉悟到审稿工作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我的个人兴趣不广，知识本来很窄，不大适应编辑工作的需要，但读了一些还没有出版的书，被迫地翻了一些本来不想读的书，多少增长了一些知识。这是有利的一面。经过多年的阅历，我越来越感到搞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需要的知识很多，自己确是“恨不十年读书”；可是十年的大好时光却在‘文革’中消磨了。现在年事渐长，记性日差，再读书也收效甚微，只能秉烛夜游，作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了。

对于编辑工作者说，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至于水平的提高当然是没有止境的。我少年时代比较爱好诗词，散文读得不多，文章也写得不大流畅。建国后开始学了一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到中华书局工作以后，主要从事古籍的整理出版，侧重于资料的整理和文字的校订，应该说是偏于考证一途。多年来墨守于这一专业，对理论的兴趣日益淡薄，对新事物也缺乏敏感，以致性灵汨没，文思枯窘。自己又有意无意地学习词典式的文体，追求简炼，结果写出来的东西面目呆板，语言无味。这显然是一个缺点。如果对自己要求高一些，还应该力求能力更全面一些，知识更广博一些。

当然，一个人精力有限，要真正做到一专多能是很难的，要当一个全能运动员更难。我自己只能量力而为，基础知识主要是结合职务工作来学习，围绕着审稿的需要而查书、翻书。在业余进修时曾打算一个点一个点地摸索，对自己比较熟悉的问题深入研究一下。在学校时导师浦江清先生给我指定的学年论文是宋元话本，浦先生病故后，又改跟吴组缃先生学习。两位导师对古代小说都有精辟独到的研究，我总想遵循他们的教导，把中国小说史学得一些。当我把宋元话本的论文稿改写成一本小书以后，本想接着研究明代小说的。可是明代小说有很多长篇巨制，而且都是珍本书，我没有条件上图书馆去看，于是只能适应客观条件，向上发展去研究唐代小说了。

对于唐代小说，我本来就很有兴趣。少年时代，最早接触的古代小说，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就是郑振铎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我从中才知道了唐人传奇和‘三言’‘二拍’。这时我拿起唐代小说来读，就不止是看故事，还想结合专业做一点古籍整理的实习。就凭着自己的一部《太平广记》和大半部不全的《唐代丛书》，开始做了一些整理和考订，先抄了一些书目卡片。1932年郑振铎先生为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写的序说：“此书著录中国小说，既甚美备，但专载以国语文写成的‘通俗小说’而不录‘传奇文’和文言的小说，似仍留有一个阙憾在。”我就不自量力，试图编一部中国文言小说的书目，以弥补这一阙憾。可是工作刚开始，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就停顿了。拨乱反正以后，又捡起这个项目重新开头，初步整理出了一部分成果，就是已经出版的《古小说简目》和《燕丹子》校本等。由于杂务的负担和疾病的缠扰，业余研究不得不放慢了进度。至今这方面的工作还拖住了我的手脚，长期停留在这一个点上。有的朋友说我在打深井。深是深了一些，可是井口太小，自己掉了进去，真成了井底之蛙了。

编辑工作的特点之二是细。审读书稿要求注意政治性、学术性、技术性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古籍整理，要注意版本的优劣、文字的异同、校勘的是非、标点的正误，都是非常琐细枯燥的工作。前辈们在古籍整理工作上，一贯强调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严密的方法。我们即便照着做，也还是难免常有失误。搞了多年的古籍出版工作，不免会养成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作风。我自己也常感到有些厌烦。尤其是小说，本来是所谓‘小道’，我却为它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和辑佚的工作，只注意于一些小问题，更是小言詹詹，无关大雅了。但我在实践中也体会到古籍的整理工作是既为读者清道、也为古人整容的工作。搞校勘、标点、注释以及资料汇集之类的工作，也和编工具书一样，是一人劳而众人逸的事。整理好一本书，可能给成千上万的读者提供方便，也可能留传给今后几代人

使用。因此还不敢掉以轻心，主观上总想做得认真一些，如引书尽可能用第一手资料，尽可能用可靠的版本，尽可能做一些考订核实的工作。这些事做起来很烦琐，属于很微的微观研究，在整个学术研究中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对于我们培养一种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还有一定作用。我们当编辑的习惯于“吹毛求疵”，往往发现有少数作者，虽然学有专长，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不矜细节”，往往在引文、注释、标点等方面出了一些本来不难避免的失误，不免令人有白璧微瑕之叹。我们在工作中吸取了不少教训，不敢因为它是细节而等闲视之。自己本来是粗枝大叶的人，经过许多失误的教训，慢慢懂得仔细的必要了，可是失误总是不能避免，只能力求减少一些。当然，不同专业的同志在工作中必然要用不同的方法。我们这种微观的工作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只适用于一定的范围。当前有不少同志提倡宏观的研究方法，我也心向往之，觉得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全局观念，从大处着眼。自己虽然习惯于微观的工作，对整个古典文学领域还是要有宏观的了解。我想，无论编书、读书以及自己写书，都应该逐步自觉地把杂和专、广和深、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处理好，才不致陷于片面性、盲目性。我自己并没有处理好，但对这些问题有一些肤浅的理解，也许可以供有志于业余自学的青年同志们参考。

程毅中(1930—)，江苏苏州人。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56年为北京大学研究生。于中华书局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至今。整理《燕丹子》、《隋唐嘉话》、《玄怪录》等。著有《宋元话本》、《古小说简目》。

书 虫

□陈丹晨

从前,中国人俗称士、秀才、知识分子一流为“读书人”。顾名思义,强调人与书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人的知识、本事、职能,以及日常生活方式都与书有关;或者说,这种人的特点、长处就是读书。

这种称呼既然相传已久,也就不必去考证这样解释是否得当。但是,一般来说,知识分子与书的关系确实密切到了难分难解的地步。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或多或少总有藏书若干,至少,这是他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于是,埋首读书的人在过去年代就被讥为埋在故纸堆里出不来,或索性称为书呆子、书虫、虫蠹。他们有了收入,常常都花在书店里,用于购书。即使不买书,也常流连书店,驻足不去。老一辈作家、学者中,有很多是某些书店的老主顾,因此还有与书店老板成了亲密朋友的。老板知道他需要哪方面书,一旦搜罗得来就会送去。

刘半农曾有文记载他购买金圣叹七十一回本《水浒》的过程就是一例。他说,他在近二十年中,到处寻访,梦寐以求,想买一部贯华堂原版《水浒》,即使买不到,就是看看,开开眼界也好。1933年,北京琉璃厂松筠阁书店老板终于为他找到一部完整的,使他如愿以偿,高兴非凡。他说:“在去年上半年平津大局(指日寇武装侵犯华北,危及北平、天津)如此凶险之中,若说我个人还能有什么赏心

快意的事，亦许就只是这一件罢。”可见此事在他生活中有多么重要了。后来刘半农的同事，北大教授傅斯年闻讯，急得跳起来，一把抓住刘半农要他让给他；又去找松筠阁老板纠缠责难：为什么有了好书，不卖给我卖给了他！

这当然都是书呆子的痴人呆话。但是书呆子嗜书若命，藏书成癖，却颇有人在。

前年故去的唐弢先生就是近人中藏书极丰的一位。他主要收藏现代文学书刊。60年代初，他从上海迁到北京定居，曾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住过。我去访见他，也去他的藏书室参观过。那间屋与图书馆的书库无异，不仅环墙都是放满了书的书架，而且屋中央也都是排列成行满载着书籍的书架，人只能在书林中侧身穿行。后来，他迁到永安里寓所后，就没有那么宽敞的地方了。我曾问过他这么多的书怎么办，他两手一摊，无奈地哈哈一笑说：“没办法……都堆在那里呢！”他指指另一间小屋。

书多了，且又还不断在增添新书，于是就有书满之患。在住所的多间居室里，最杂乱的就数书房。这固然也是文人的通病。但在我认识的师友中，书房最乱的还数萧乾先生。他住在永定门外时我去过。那时居住简陋，杂乱自不必说。后来迁到木樨地新居后，杂乱依然。我注意到他的书房里多增加了一个暗红色的罗马尼亚组合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书房里所有柜子、桌子的柜门、抽屉大多都是虽设而常“开”，显然是使用得太频繁之故。书房的每寸地板，每件家具上都是书、文具、纸张等等，都是不规则的，很散漫的、很随意的、倚躺在一处又一处。但是，如果你和萧乾先生谈天，说到某件事、某本书，他马上信手就可以从某个地方、某个柜子、某个抽屉、某本书里，毫不费力地找出来。

据我所知，许多人把这样杂乱的书房视为禁地，不许家里人插手打扫、揩拭、整理。别人说“这么太乱了”，他会说“我自己知道，你们一整理，就乱了，我就找不到了”。这大概也是呆子的一种呆话。

但是,不能否认,书虫们就在这里遨游世界,思考过去和未来,寻找人生的真谛,寄托和排遣感情悲欢的波澜……他拥有的是一片属于他自己的虚幻的宝藏,特别是在商业化社会环境里,别人尽可以不看重,甚至引为痴呆,但却是他人难以分享的。

香港已故作家叶灵凤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曾非常动人地描写过他坐拥书城时那份情趣和境界:

对于人间不能尽然忘怀的我,每当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将自己深锁在这间冷静的书斋中,这间用自己心血所筑成的避难所……在这时候,书籍对于我,便成为唯一的无言的伴侣。他任我从他的蕴藏中搜寻我的欢笑,搜寻我的哀愁……我不仅能忘去了我自己,而且更能获得了我自己。

于是,我竭诚地向那些正在人欲横流的大海里挣扎的人们,向那些流连歌台舞榭、卡位 OK 的青年朋友们,以及被‘下海’浪潮冲击得烦躁不安的知识界同仁进言,何不试一试叶灵凤先生那种寂寞的方式,也许从中将得到一丝异样的情趣和解脱,也未可知哪!

陈丹晨(1931—),浙江宁波人。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文学》杂志编委、《光明日报》文学副刊主编、《文艺报》副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著有《巴金评传》、《陈丹晨文学评论选》、《亚里士多德的故事》、《雪泥鸿爪》等。

回顾往昔谈读书

□金开诚

我读书不多，却多次要写谈论读书的文章，实在不好意思。特别是读书的方法，每人都大致只有一种，谈一次还可以；谈两次就不免重复，谈多次则必然使人厌烦而不屑一顾了。不过这只是作者的苦衷，编书人则另有其新的思路与角度，为此而再三约稿，终于使人感到若再坚拒便不合情理，只得拿起笔来勉为其难。

由于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基本上是工作要求决定了我读什么书及如何读书，因此本文的大部分内容只能结合着工作经历来写。



我在中小学期间读的书，与同龄人相比也许是较多的，内容也很庞杂。因为纯粹是从兴趣出发，所以读得颇为潇洒。我记得在中学里，学校在教学上要求颇严，作业不少，还坚持周考。便不知为何仍比现在的中学生轻松得多，尽有时间可读“闲书”。

由于“闲书”这个观念很深，所以我从来对中小学时期读的书评价不高，以为这无关学问。直到近年来我才发现那时读的书刊及吸取的各种知识还是相当有用的。这主要因为那时记忆力好，读书虽不能说过目不忘，却是印象较深，到如今仍往往可以成为信手拈

来的写作材料。为此我近来写过两篇谈论背书的文章，主张人在幼年要发挥记忆力强的优势，尽可能多背点书或多记住一些知识。

此外，在幼年读书期间，有一件事也还值得一提。大约 50 年前，有一次我听两位老中医谈人类用什么器官想问题。其中一位认为人是用头脑想问题的，所以碰到难题就用手抱着脑袋或拍拍脑袋；另一位则坚持古训“心之官则思”，并认为外国人的看法也如此，所以研究思维的学问叫“心理学”，而不叫“脑理学”。我那时已经确知人是用大脑思考问题的，但“研究思维的学问叫‘心理学’”这句话仍使我很感兴趣。所以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便尽可能找些心理学书籍和报刊文章来读。这件事使我感到，人研究什么学问，其起因有可能纯出偶然，这或许也算“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不过，从我主观上说比较更喜欢这样四句话：“有意栽花，无心插柳，春还大地，柳暗花明。”这是我数年前送给小女的题词。

自我进入大学以后，读书便不大潇洒了。本来，我读的是中文系，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乃是“正业”，又其乐无穷。之所以会不潇洒，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想研究理论，包括文艺学、文艺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研究理论势必要多读艰深的说理之作，又势必把文艺作品作为思考的对象来读，因此无论什么书都读得很苦。二是我强烈思念父母与家乡，一到寒暑假必要回家探亲，而路费又只能来自写稿。如果一个人为了写稿而读书的话，那读书便纯属苦事而非乐事了。这方面的情况，我已写了一篇题为《戏说稿费》的文章，刊登在 1995 年 4 月的《群言》杂志上。

二

由于写稿的缘故，我实际是从读大学的时候起，已经把读书和用书结合起来了。等到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以后，我基本上已是为用

书而读书了。这样做并非出于自觉或自愿，而是因为历经坎坷，工作多变，不得不如此。

我留校后，起初是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而所谓研究，实际是参加现代文学教科书的编写。由于我在大学中对现代文学下的工夫不多，因此为编写教科书的任务所迫，只能“现学现卖”，即一边看书一边用书。

两年之后，正当我对现代文学已有‘入门’之感，并产生较大兴趣时，我的工作却变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资料工作，具体说就是注释两汉乐府诗和部分唐诗，这仍然只能一边看书一边用书。一年多以后又改为参加《楚辞》研究工作，具体说还是编书。另外也要做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起先只教先秦两汉部分，后来改为给外系学生教文学史，便只能从先秦一直教到清代。我在大学期间虽然对古代文学用的工夫较多，但要在完成《楚辞》研究任务之余，再接受这样的教学任务，那毕竟需要有较多的时间来备课。然而我却并没有多多读书、长久备课的福气，还是只能一边看书一边用书。这种情况一直延长到 1965 年下乡参加‘社教’运动；‘社教’未结束，便是‘文化大革命’了。

在这一段读书用书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是值得说一说的。

我虽从小就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兴趣，却有两个例外，那就是不喜欢屈原和关汉卿的作品。但从 1959 年起，我却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屈原辞的资料和研究工作上，这岂不是一件苦事吗？可是这种苦的感觉仅仅只有几个月，我很快就喜欢屈原了；等到 1965 年的时候，我已认定《离骚》是‘天下最有抒情深度的诗’；《九歌》是“天下最完美的诗”。使我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便是一边读书一边用书。用书是会看得摸得着的成果的，而成果感则能使人对所做的工作产生兴趣与热爱。为此我曾对爱因斯坦一句名言做过补充，他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但热爱怎么会产生呢？碰到不热爱的工作又该怎么办呢？我的想法就是要尽可能争取有一点成果，

有了成果便会热爱起来。接下来再问，成果又从何而来呢？我想成果只能出于实干，绝无‘心想事成’之理。因此，人倘若‘运气’不佳，碰到了不喜欢的工作而无可选择，那么与其闹情绪还不如硬着头皮去干一干，说不定就会‘实干事成’；从而使感情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我就冒昧将爱因斯坦的话由一句加到三句，即‘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成果是最好的太老师，不得不干是最好的祖师爷’。

三

我在 1971 年恢复教学工作。起先在新闻专业教《新闻写作》，一年后调到古典文献专业继续搞《楚辞》研究，同时也要开设与古籍整理和研究有关的课程。1978 年起重新研究文艺心理学，很快开出了一门课，并在十年之间写出了三本书和几十篇论文。在此期间也从事书法艺术的研究，发表了大约 20 篇论文。到 1987 年，《楚辞》研究的任务差不多完成了，我所带领的教学组便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的教学和研究，我本人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也发表了大约 20 篇论文；现在工作又变了，但写的文章还是以有关传统文化的为多。这便是最近 20 多年的工作简历，而读书则仍然是围绕着工作需要来读。

我的专业工作如此多变，而读书又直接为了工作，因此很可能成为一个‘学术盲流’。但我觉得自己还不是个‘盲流’，这主要因为我采用了‘滚雪球’和‘建立根据地’的方法。

所谓‘滚雪球’可以用一个事例来说明。1972 年我和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到工厂‘开门办学’，搞了一段之后，带队的支部书记对我说：“咱们下厂，虽说以向工人阶级学习为主，但作为古典文献专业总还要讲点专业知识。”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便要我回校用三

天时间备出个《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课来。我说：“三天怎么能备出这么个课来呢？”他说：“你就本着讲比不讲好这个观念去备，备多少算多少。”于是我就用三天时间备了三小时的课。由于讲后反映不差，他就要我再讲个《中国文学要籍介绍》，也是用三天备出三小时的课。这两次课的内容不但简陋，而且学问家们还会提出质问：“你讲《历史要籍介绍》，你把《二十四史》看遍了吗？我那时的确没有通读《二十四史》，但我必须根据支部书记的指示去办，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讲比不讲好’。从那以后，我年年都讲这两门课，内容则不断充实。到‘文革’以后，这两门课终于成了比较有分量也比较受欢迎的专业课。这便是‘滚雪球’。倘若当初我坚持一定要读遍《二十四史》之后才讲《历史要籍介绍》，那么事实上恐怕就不会有这两门课了。”

所谓“建立根据地”，是指在多变的工作中要力争在每个岗位上做出一点成果，有个立足之地。这些成果虽然分散在各个学术领域，最后却可能连成一片。否则只是流动而始终没有立足点，岂不就成了学术领域中的“盲流”了？一些活得潇洒而有福气的“读书人”，情况便与此相似；他们读过许多书，用作谈资颇有包装作用，真要干活却无真才实学。我这人倘若沿着中小学期间那种读书方法一直读下去，也可能成为这样的“读书人”。后来倒是因为经历坎坷才使我得到学以致用的好处。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我不记得有过什么读书之乐，却总是感受到读书之苦；只有在自己感到取得了一点成果时，才觉得有些乐趣。“建立根据地”的读书法也可以比作在各地办企业，现在的人们也许更易于理解。“盲流”如能在他所流经的地方都办个企业（规模不必大，却不能是“皮包公司”），那也就不是“盲流”了。而且各个企业的业务虽然表面看来没什么联系，但实际上彼此之间却是多有融通之处的，各类业务是可以互相促进的。

四

我谈论读书问题,总要说到三句话,即“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如前所说,我自己读书大致上是为用而读,这是由个人的工作经历决定的,未必适用于他人。但学以致用这个大方向却应该说具有普遍性,适用于所有的读书人。

金开诚(1932—),江苏无锡人。1955年入读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该校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有《文艺心理学论稿》、《艺文丛谈》、《楚辞选注》、《屈原辞研究》等著作。

读书卮言

□褚斌杰

从启蒙时开始读书，如今已年逾花甲，几十年来又忝为人师，照理说谈点读书的事似应不难，但开口举笔之际，却突觉得大为不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首先是读过些书和谈读书是两回事。回想几十年来，日积月累，确读过不少书，但书应该如何读，应读些什么书，采用什么方法来读等等，却从来很少想过，也就是缺乏思考和总结。平时读书，读就是了，现在要我专门来谈，大有无从谈起之感。此其一。再就是要我谈这样的题目，也不免有些顾虑。自思几十年来，跋涉在书山册海之中，往往感到困惑而缺少门径，今要我来解惑指路，岂不汗颜。心一虚，就开不得口，拖不动笔了。

经考虑，我决定以随笔杂谈的方式，写一点有关读书方面的切身体会，这样对我既容易下笔，又避去拉起架式向人说教之嫌，或取或弃，并由读者诸君裁夺。

—

五十年代初，初入大学，师长领着参观图书馆，满室满架的藏书，使我大为震动。小学、中学时，就很喜欢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更希望有更多的书供我来读。岂知洋洋乎书海无垠，不见涯岸，不免大为困惑。不久，大学者冯至先生为我们做学术讲演，座谈时就

提到读书的话题，他讲你们不要为那么多书吓住，书多并不都可读，也非都要读，这要看你的专攻 有必读，有参考，有不读。冯师的话很简单，但对于当时我们一些好高骛远又感手足无措的幼稚学子，确有指点迷津的作用。

二

不管有人把读书标榜得多么清高，实际是离不开功利目的的。

大者说为了服务于社会，贴近说为了谋生，都需要读者。专业不同，所需读的书也就不同。但我以为任何专业性的书都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属基本的、经典性的；一是属于前沿性的，近今人的阐释和研究成果。

别的学科我无知，不敢妄言。如以我所从事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来说，有一些书就是要必读，精读的。如先秦的一些典籍，后世的名家原著，它们大都内涵丰厚，影响深远，有永远解释不尽的特点，要想在本学科发展自己，读它们就是打基础，是学科的基本功。

但是也还要跟学术的时代发展挂上钩。关于本学科的新理论，新视角，新的发展趋势，也必须掌握和研究。否则就无法服务于时代和社会。

有人说，自然科学工作者有“知识更新”的问题，搞古代学科研究的人，研究的对象是古代文献，还有什么“更新”实际上，我所说的后者，就是“更新”，是学术观点的更新，治学方法的更新。

古代经典、古代作家作品、古文献，已是历史的存在，但历代研究者的观点，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如中国古代治学，就有汉学，宋学之分，再细些考察，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一是学术研究、人的认识在发展；二是学术必然也应反映时代的需要。就从近代学术的发展

来说“五四”以前与“五四”以后,以至建国后直到当今,治学观点、方法就屡经变迁。古代典籍,古代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没有变化,但治学者对它们的认识,阐释,已经几经更新变迁了。

因此,读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我主张要抓两头儿。要熟悉、精读经典性的,有巨大历史影响的原著;同时,要不脱离学术发展的前沿,掌握学术研究的新动向,新成果。

两方面的书,都要读,用心读。

三

读书要会读,方法是各种各样的。但也有行之有效的常规,依我个人来说,往往采取这样的读法:

一、粗读。一本书到手,首先翻检一下,了解其概貌,统摄其大意。即通过前言,后记,章节的划分,大体知其内容和性质。

二、精读。如果以为可读和需要读,那么就一章一节读下去,弄清其基本观点、引证的资料和论证的方式、方法。边读边思,边思边读,可以手勤一点,做摘录和札记。如是自己的藏书,还可以做批注。

三、多角度地读。读书总是有目的的。如果这部书是你的研究对象,那么在全面精读的基础上,还可以根据需要,从不同的角度重读。譬如说你读的是《庄子》,要对庄子进行全面或某一方面的研究,就可以分角度地再读,如庄子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美学思想、文章结构、语言修辞,以及寓言、比喻等等等等,在重读时或作记号,作摘录,记心得,与全面读相比,这已有解剖性质了。粗读是侦察,准备阶段 精读是基础 多角度读,就是为具体研究工作、动手写出课题论文做进一步准备了。

四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过的了，说是读书要把一部厚书读薄了。我想这是从读书要领会其精神，择其精华说的。

读书需记，需思，还需通悟。近代学者杨树达就曾说过，学者既要强识(记)，还须通悟；如不能兼，则宁取通悟而舍强识（《温故知新说》）。读书贵在通过思考而消化，不是曾有人讽刺那些读书不少，但食而不化的人为“两脚书橱”吗？死读书，死记硬背，于人于己何益？

五

读书是雅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此话出现在过去社会，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一样，有历史的、阶级的偏见。但社会发展需要文化，读书是人们在知识上、修养上走向高层次之所必需。故可说是“雅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人都需要读书，且已不是什么人的专利。其实读书也是“俗事”，是每个人谋生，服务于社会的通常事。

但硬要分雅、俗的话，我想也可以分，有的无聊之人，为了打发日子寻求刺激，而专门找些打斗、言情和迎合一些所谓的潮流的书来读，既无知识的增长，也无益于身心，读来读去，“俗人”一个罢了。

六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中国最早的师尊孔子说

的话，意在说明在读书学习上，古人比今人（当时之今）正确。这话初读起来实不够明白。“为己”与“为人”似乎应说后者可取。其实原意所指是这样的：孔夫子崇古，是借古说教。“为己”是说为了个人的身心修养，读书是为了学做人。而“为人”则是指将读书做给人看，为了炫耀自己，为了获取别人的赞美，邀取别人的赏识。这样来说，孔子之论，确指出了某些读书人的通病，是有道理的。

七

归根结蒂，读书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故贵在有得。有得则需要融会，需要贯通。这就要靠“思”。生吞活剥，死记硬背的读书是难有大收获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庶几成焉。外国名人弗兰克林也说过这样的话：“读书是难事，思索更不易，而两者缺一，就毫无用途。”依我的经验，读书，特别是重要的书，不能读得太快，也不能只读一遍，咀嚼，深思，品味，达到产生出豁然之感，才真的有获。

八

世上的书浩如烟海，有些书是应该，也经得起反复读的。这些有读头儿的书，往往每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所以新书要读，已读书也要读。所谓“温故而知新”。温故非简单反复，要同样地用心思索。“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病也庸；不温故而知新者，其病也妄”（杨树达语）。为了避免“庸”，往往需间隔一阵再去读，体会自然不同。

九

鲁迅就曾劝导治学的人，要读全著，不要信选本。并举研究陶渊明为例，说有人受了选家观点的左右，对陶渊明未窥全豹，而做出了片面的理解和评价。所谓“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这确是应警惕的。

但从实说，选本也并非全无需要和皆不可读。还是以研究古典文学来说，如你重在研究某一代或某一体文学，那么对这一代的诸多典籍，名著，要尽量读全集，原著，但毕竟应读书太多，量太大了。而对其它一些文史名著，则挑选些靠得住的名选本来读，作为必要的知识和素养，也就可以了。这要看与你所专攻的对象，课题关系的大小来决定。

如果你只是个古典文学爱好者，选本一般就可以满足了，一律去读原著，全集，实际并无太多必要。

十

专业性的读书之外，还有兴趣性的读书。兴趣所在，甚至兴之所至，随便翻翻，开卷有益。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即欣然忘食”大约就指的这类性质的读书。这类读书，东一本，西一本，了无计划，亦无目的。但只要不是什么邪书，坏书，照样增加不少知识，照样增长不少见识。

褚斌杰(1933—)，北京市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为中华书局编辑，70年代重返北京大学，现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古代神话》、《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古典新论》等。

开卷有益乐无穷

□胡经之

以教书、写书为生的人,要靠自己“行万里路”,恐非易事,但若想“读万卷书”,大概不算太难。

为了要教书、写书,就必须读书。由读书进而又发展到买书、藏书。50年代初,我先在江南教过书,再到北京读了十年书,然后三十多年一直在教书、写书,这辈子就是同书打交道了。

能多读书,自然是好事。开卷有益,读书能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有了知识,学以致用,用来研究学问,发展学科,那就更好了。再说,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享受,一卷在手,人乎其内,其乐融融,烦恼尽消。

大学四年,只是多读中外古今文学名著,向图书馆去借就是了。待到跟随杨晦、朱光潜、宗白华攻读副博士研究生课程,顿感书籍不够,于是登堂入室,去向老师们借书读,出入于一些学者教授的书斋,深为他们的丰富藏书所吸引。杨晦的藏书,以文艺学为主,为了买书,他借了冯至一大笔款。朱光潜、宗白华则多美学著作。何其芳、王瑶有丰富的现当代文学史料。游国恩收藏的文学古籍最多。我曾拜访过南京大学罗根泽,他搜集的古典文论极为丰富,印象很深。我研究《红楼梦》曾出入于吴世昌、周汝昌、吴恩裕的书斋。吴世昌特地邀我去他的家庭书库一看,使我大为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多书!

渐渐,我自己买起书来。读书多了。为便于记忆,喜欢在书上

圈点勾画。这，必须有自己的书才行。偏偏，我研究的专业是美学、文艺学，涉及面极广，人生哲学，艺术文学，古今中外，都要涉猎，需要的书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无异自找苦吃，我的研究生助学金是五十二元，除了必要生活费用花去一半，剩下的就全都丢到书海里了。幸而，不时有点稿费补偿。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我一本文学评论小书，一下子给了近千元，相当于一年多的津贴。我喜出望外，去王府井挑了一小车书，由书店送到燕园，慢慢享用，倒也自得其乐。

于是，买书也成了一种嗜好。日积月累三十年，到 80 年代搬进畅春园新居而有了间书房时，把书一摆开，书橱竟把三面墙都占满了。正在发愁，书再多下去怎么办，我却来到了深圳，有了另一间书房，可以再在这里买书。一晃八年，不知不觉，书又堆了一屋。伤脑筋的是要把两处书合拢恐摆不下，看来，有些只能留在母校了。

书要读才能尽其用。买来的书，我当即坐下浏览，快速翻阅一遍，了解总体轮廓，有个初步印象。等到教书、编书、写书，就把有关课题的书再找来集中细读。因为对自己的藏书胸有全局，心中有数，所以用起来得心应手，颇有成效。我撰写专著《文艺美学》，广泛利用了我的藏书。以我读书所得，我为国家教育委员会主编了两套教科书一百万字，相应的教学参考书七卷四百万字，分别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和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为培养硕士研究生，我编选出版了四十万字的《中国现代美学丛编》和八十万字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获“特区十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都充分利用了我自己的藏书。物尽其用，出了书，亦是一乐。

我爱在优美的音乐声中读书。优美的乐曲使我更易入读，而且创造出和谐气氛，其乐无穷，真是高雅的审美享受。现在，我最爱读的书，除艺术哲学以外，就数描写作家、艺术家创作过程的书了，也爱读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的传记，了解这些人的生平历程，也领略了人生乐趣。

胡经之(1933—)，江苏苏州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1960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为深圳大学国际文化系主任、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编著有《文艺美学》、《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国古典美学丛编》等。

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

□ 裘锡圭

我们想在这篇短文里，给喜欢念古书的青年同志们简单介绍一下考古资料在传世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所说的考古资料泛指古代遗留下来的甲骨、金文、简牍等类文字资料以及各种器物 and 遗迹，并不一定是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而获得的资料；传世古籍主要指传世的先秦秦汉古籍，因为考古资料对这些著作时代早的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显得特别重要。

古代学者很早就在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使用考古资料了。例如，西汉时代的有些学者曾用景帝时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战国时代经书抄本，即所谓古文经，来校正流传的今文经。西晋时代的有些学者在汲冢（今河南汲县）战国古墓的竹书发现后不久，就用其中的一种编年史，即所谓《竹书纪年》，来纠正《史记》的错误。对非文字的考古资料，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古代学者也早就注意到了。例如汉魏之际的经学家王肃，曾据魏太和年间鲁郡（今山东曲阜）出土的铸成牛形的古铜尊，纠正前人认为经书里提到的牺尊、象尊是由于其花纹或装饰得名的错误说法，指出牺尊就是牛形尊，象尊应为象形尊（见《诗·鲁颂·閟宫》正义）。北宋时发现了铸成象形的古铜尊，王肃的说法完全得到了证实（参看《博古图》7·10“周象尊”）。

清末以来，由于传统的金石学的发达以及考古学的兴起，古代

文物大量发现，其中包括很多重要的文字资料，如殷墟甲骨文、汉简和敦煌卷子等等。同时，照相、印刷等技术的进步，为学者们利用各种考古资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因此，清末以来的学者在利用考古资料整理研究古籍方面，取得了许多超越前人的成就。

建国后，考古事业发展得非常迅速，对整理研究古籍有用的考古资料不断发现。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一些西汉墓葬和一座秦墓里发现了大量竹书、帛书。例如 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里发现了《吴孙子》、《齐孙子》、《晏子》、《太公》、《尉繚子》等竹书的残本；1973 年在河北定县西汉后期的中山王墓里发现了《论语》、《文子》等竹书的残本；同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前期的三号墓里发现了《老子》、《周易》等大批帛书和一些竹书；1975 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里发现了《秦律》的部分抄本和《日书》等竹书；1977 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前期的汝阴侯墓里发现了《诗经》、《仓颉篇》等竹书的残本；1983 至 1984 年间在江陵张家山西汉前期的 247 号墓里发现了《汉律》的部分抄本和《秦谡书》等竹书。这些竹书帛书，有的是长期失传的重要佚书，有的是尚有传本的古书的现存最古抄本，价值比过去在敦煌发现的六朝和唐代的古书抄本高得多。因此，考古资料对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就愈来愈突出了。

考古资料在传世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有助于研究古籍的时代和源流；二、有助于校正、解读古籍。下面先谈前一方面的作用。

地下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铜器铭文，是丝毫未经后人篡改的商周时代文献，可以用作检验某些传世古籍的时代的标准。我们现在所以能够断定《尚书》里过去被视为我国最古文献的《尧典》、《禹贡》等篇虞夏书的编定时代不能早于战国，而过去被怀疑为战国时人伪作的记武王灭商之事的《逸周书·世俘》篇，却基本上是可信的实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已经通过甲骨、

文等资料获得了很多关于商周时代的语言、历史和思想等方面的可靠知识，可以用作判断这些传世古文献时代的依据。例如：西周春秋铜器铭文总是以‘妣’与‘祖’配；‘考’与‘母’配（《诗经》亦同），“考妣”相配是战国以后的事，而《尧典》却有‘百姓如丧考妣三载’之语，其时代便可想而知了（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19—21页）。《世俘》所记武王征伐时杀戮、俘获敌人的数字以及田猎获兽、祭祀用牲的数字都非常大，而且还有用人牲之事。这类内容过去被视为夸诞不经。甚至被斥为战国时人对古代圣王的污蔑，事实上却跟殷墟甲骨文所反映的这一时代的情况正相符合；以后人头脑，就要夸张也夸张不到的”（郭沫若《十批判书》，《全集·历史编2》23页。参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之七，《全集·历史编1》299—301页）。

自从疑古的学风在宋代兴起以来，有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钞本为好几种这一类古书恢复了名誉。例如今本《晏子春秋》（《汉书·艺文志》称晏子作《六韬》（由《艺文志》的《太公》分出）《尉繚子》，都有人怀疑它们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原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但是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里却发现了这几种书的部分抄本，内容跟今本基本相同。从一部书的开始出现到广泛传抄，通常总要经历不太短的一段时间。这几种书的著作时代应该不会晚于战国。今本《鹖冠子》过去也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作。马王堆三号墓所出西汉前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有很多跟今本《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看来这部书大概确是战国末期的著作。从定县中山王墓出土的《文子》残简来看，今本《文子》也不会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主要根据《淮南子》编成的一部伪书。

非文字的考古资料对研究古书时代也是有用的。例如有的考古工作者把《仪礼》的《士丧礼》和《既夕礼》所记的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式，跟考古发掘中所见的实际情况对照，认为《仪礼》所反映的大

约是战国初期情况（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4期）。这对于判断《仪礼》的时代就很有参考价值。

在研究传世古籍的源流方面，地下发现的时代较早的抄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例如：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里发现的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代的《仪礼》木简、竹简，证明《仪礼·丧服》的《传》本来是单行的。通过简文用字的特点，还可以断定《丧服传》原为古文本（参看沈文倬《汉简〈服传〉考》，《文史》24、25辑）。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次序跟今本完全不同，经文也有出入，易传有部分内容多于今本的《系辞》，章节次序跟今本略有不同，多出部分包含今本《说卦》的前三节。这些情况对研究《周易》源流和易传“十翼”的形成有重要价值。马王堆帛书《老子》和银雀山竹书《晏子》，也为研究这两部书的篇章的分合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地下发现的有些佚书，对研究传世古籍的源流也很有用。例如：银雀山竹书中的《王兵》篇是一篇佚书，但是其全部内容分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兵法》等篇，文字基本相同。经过对比研究，可以断定《参患》等篇是由《王兵》篇加上其他一些作品的内容改编而成的（参看《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文物》1976年12期）。这为研究《管子》的成书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通过对西汉墓葬出土的大量竹书、帛书的全面观察，我们对当时的书籍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为前人已经提出来的早期古书没有专用的书名，不署作者之名，多以部分篇卷或单篇别行等特点，找到了很多实证。通过把古书的流传之本、类书引文和敦煌写本等跟竹书、帛书本对照，可以看出比起宋以后的刻本来，唐代类书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写本跟竹书、帛书本要接近得多。

考古资料有助于研究传世古书的时代和源流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多举了。下面谈谈考古资料在校正、解读传世古籍方面的作用。

考古发现的古书，有些就是传世古籍的古抄本，有些虽是佚书，但是跟传世古籍有某些共同的内容（由于古代的书常常抄来抄去，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它们都是可以用来校读传世古籍的极好资料。如：《孙子·计》篇有一句话，今本作：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银雀山竹书本则作：

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

今本脱落了“高下”这两个很重要的字。又如上面提到了竹书《王兵》篇，也解决了《管子》各篇文字上的一些问题。

即使是跟传世古籍没有上述那些关系的佚书和其他文字资料，在校读传世古籍方面也能起重要作用。在传世古籍里，有不少词语和通用字由于罕见而不为后人所理解。这是我们读不通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词语和通用字，有一些在考古发现的同时代或时代相近的文字资料里却是常见的、易于理解的，也有一些虽然并不常见但意义是明确的，或者跟传世古籍对照起来看，意义就明确了。传世古籍文字上的有些错误，也可以通过跟这些文字资料相对照而得到纠正。我们在《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5期）和《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1年6期）两文里，已经举出不少例子，在这里再稍作补充。先举两个利用甲骨、金文校读《尚书》的例子。

《尚书·费誓》记鲁侯跟徐戎作战前的誓师之辞，有如下一句：

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复之，我商贾汝。

《伪孔传》释末一句为“我则商度汝功赐与汝”把“商”解释为“商度汝功”，有增字解经之嫌，而且从情理上说，鲁侯在当时也没

有必要去强调进行赏赐必须先‘商度汝功’；《伪孔传》的解释显然难以相信。在殷周金文里，常常用‘商’字来表示赏赐之‘赏’这个词。《费誓》的‘商賚’无疑应该读为‘赏賚’，就是赏赐的意思。这一点清末研究金文的学者方濬益和刘心源都已经指出来了。如刘氏就说：“商用为赏，古刻通例……，不见雅训，惟《费誓》云‘我商賚汝’，仅存古文。后儒不识通假，乃以商度解之，非也。”（《奇觚室吉金文述》1·27下）这是利用金文释读古书中后人不理解的通用字的一个例子。后来，于省吾《尚书新证》、杨筠如《尚书覈诂》也都持与刘氏相同的见解。但是1982年出版的《尚书译注》却仍然把‘商賚’之‘商’解释为‘度量’（288页），新版《辞源》在‘商’字第一义项“计量”下也仍然以‘我商賚汝’为例句，未免对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太不重视了。

《尚书·君奭》：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

《伪孔传》把‘予不惠若兹多诰’解释为‘我不顺若此多诰而已’，简直不知所云。殷墟甲骨文里有一个常用的虚词“惠”，作用跟‘惟’（甲骨文一般作“佳”）相似，古文字学者大都认为这个字应读为“惠”，当可信（参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1431—1432页、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02页。下文引用此字时径书作‘惠’）。殷墟甲骨文里的有些占辞（卜问后判断卜兆所示之意之辞）以‘不惟’与‘惠’或‘惟’与‘不惠’对言：

王曰：‘𠄎。惟庚。不惟庚，惠丙。（《殷墟文字丙编》84）

王曰：吉。‘𠄎。惟甲，不惠丁。（同上42）

《君奭》也是以‘不惠’与‘惟’对言的，可见《君奭》的‘惠’就是甲骨文里的虚词‘惠’。这个虚词后人已不熟悉，所以《伪孔传》就把它错释为‘顺’了。在甲骨文的虚词‘惠’被释出之前，杨筠如《尚书覈诂》已经根据《酒诰》有‘予不惟若兹多诰’之语，并以‘不惟’与‘予惟’对言的现象，指出《君奭》的‘惠’与‘惟’同义，可谓卓识。但是他认

为“惠”当作“惟”；古惠、惟声近相假”(253页)，还是不够妥当的。如果“惠”和“惟”所代表的确是同一个词，上下句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字呢？还有人认为“惠”是“惟”的声近误字(曾运乾《尚书正读》234页)，同样难以讲通。紧接的两句为什么一句误一句不误呢？而且这种以“不惠”与“惟”对言的句子，不但见于《君奭》，也见于甲骨文，显然不能以误字等偶然原因来作解释。“惠”和“惟”应该是一对音、义皆近的虚词，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还有待研究(很多古文字学者认为甲骨文“惠”、“惟”用法无别，是不对的)。《诗·大雅·云汉》有“曷惠其宁”语，吴闿生《诗义会通》认为“易惠”犹“曷维也”(《邶风·绿衣》有“易维其已”语)。这个“惠”跟《君奭》的“惠”应该是一个词。上面提到过的《尚书译注》把《君奭》的“不惠”读为“不慧”。1980年出版的《诗经今注》、1981年出版的《诗经全译》、1985年出版的《诗经译注》，都把《云汉》的“惠”解释为“赐”。这些书的作者对甲骨文的虚词“惠”恐怕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秦汉的传世古籍里的某些问题，可以根据考古发现的秦汉的文字资料来加以解决。如：《盐铁论·复古》中提到“扇水都尉彭祖”。汉代并无“扇水”地名，扇水都尉是什么官从来没有人知道。三十年代初在甘肃和内蒙的额济纳河两岸地区发现了大量汉简，从这批简文知道西汉时曾在这一地区的北部设居延都尉，南部设肩水都尉，都属于张掖郡。劳胥认为《盐铁论》的扇水都尉“或为肩水都尉之误”(《居延汉简考释序》，《劳胥学术论文集甲编》250页)，显然是对的。这是根据考古资料校正古书错字的一个例子。《盐铁论简注》说“有人说扇水就是居延汉简的‘肩水’，是不可信的”(42—43页)，可是丝毫也没有提出否定此说的理由，实在太主观武断了。

有时候，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还能帮助解决古书里比较重大的问题。例如：《荀子·非十二子》责罪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思、孟所谓五行究竟是什么？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悬

案。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的第一篇，专讲儒家的五行说。通过这篇佚书，才弄清楚思、孟所谓五行就是“仁、义、礼、智、圣”，从而为思想史家深入研究思、孟学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要弄清楚古书里提到的各种器物的形制和某些制度（如服饰制度、墓葬制度等），往往需要借助于非文字的考古资料。本文开头曾举过王肃根据出土古铜器解释‘牺尊’、‘象尊’的例子，这类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宋代金石学家按照古书里的器物名称，为多种古铜器定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就是根据出土实物研究古书所记器物的形制。《汉书·律历志》所记的嘉量之制，如果没有王莽嘉量的实物可供参考，就很难完全解释清楚。古书里屡次提到的贵人墓葬里的题凑之制，也只是在七十年代发现了比较完整地保存着题凑之制的汉代大墓以后，才为大家所真正理解的（参看《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辞海》新版‘题凑’条仍袭误说）。《盐铁论·散不足》说：“唯瑚琏觴豆而后彫文彤漆。”《简注》把‘彤漆’解释为‘红色的漆’（228页）。这是由于不注意考古资料而造成一个错误。出土汉代漆器绝大多数里面是朱红色的，外面是黑褐色的。汉代人单说漆，往往指黑褐色的漆。《散不足》的‘彤漆’无疑是指涂红漆和黑褐色漆而言的，决不可能单指涂红漆（参看朱德熙、裘锡圭《马王堆一号汉墓遗策考释补正》，《文史》10辑68—70页）。限于篇幅，不能多举例了。

通过上面的简单介绍，已经可以看出考古资料对传世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了。但是在近年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字典、词典的编纂工作中，考古资料却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前人在利用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传世古籍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往往受到忽视。这是很不正常的。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很快改变。同时也希望真正有志于研读古书的青年同志，养成注意考古资料的习惯。

裘锡圭(1935—),浙江宁波人。著名古文字学家、古籍整理专家。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论著有《文字学概要》、《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等。

书 趣

□袁行霈

到我识字的时候家里藏书已经不多了，父母督责又不严，所以我小时候并没有认真地读什么书，当然也领略不到书的乐趣。只是因为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父母又不肯放我出去“撒野”，便只好取书为伴，胡乱地读来解闷。在读过的书里真正喜欢的也不多，只有一部《聊斋志异》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本耽于幻想，但任凭我想入非非，也幻化不出聊斋那么多瑰奇的故事。我对蒲家庄那位老秀才佩服极了。至于外国文学的知识，多半是靠了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这书印刷精美，又有许多插图，成了我经常摩挲翻阅的读物。陆放翁说他小时候偶然见到陶渊明的诗，欣然会心，爱不释手。日暮，家人喊他用饭，至夜卒不就食。那真是一种福气。我远未达到他这样痴迷的程度。

1953年我考入北大，经常钻图书馆，这才日益体验了书趣。当时的图书馆在办公楼南侧，负责出纳的馆员，论年纪有的是师辈，和蔼可亲，颇有书卷气。递上索书条，略等片刻，书已到手。书库在楼上，有一类似烟囱的通道通到一楼的出纳台，借还的书籍都是由这通道吊下吊上的。等书的时候，那吊索、吊索上的书笼和书笼里放置的各种各样的书刊，便成为我注视欣赏的对象。那时阅览室里还有两样东西使我感兴趣，一是开架的工具书，有的厚极了，两手托不住，平摊在一个固定的支架上，任读者随时翻阅；另一样是铅

笔刀，似乎是固定在一扇不开的门的框上，铅笔插进去，用手摇几下就行了。这些小设施体现了管理人员对读者的一份细心的关照。那时的馆长是向达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懂得读书人想亲近书的心情，所以允许教师入库。我一毕业留校任助教，便享受了这种优待，于是常常登上楼梯，钻进书库，随意浏览。身子挤在高大的书架之间的小‘胡同’里，前后左右除了书还是书。伴着淡淡的书香，一呆就是半天，比看电影、逛公园还惬意。有时被好奇心驱使，专取那些尘封已久的书来翻，弄得两手都是灰。看书的同时，留意书后借阅者的签名和年月也挺有意思。有一部书从三十年代郭绍虞先生借阅以后从未有人借过。郭先生的签名十分隽秀，至今难忘。进库的规定‘文化大革命’中取消了，八十年代初得以恢复。有一段时间我的体力不佳，偶尔带个小马扎进去，站累了可以坐下歇歇。小马扎允许带入书库，是管理人员的优待和信任，心里很感激。

入库省了我很多精力和时间。有些书本来只要查阅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麻烦管理员为我们取出来，彼此都省事。有时为了研究一个题目，要查阅许多书，入库就更方便了。更重要的是入库可以激发做学问的兴趣，在无意的浏览中还可以发现新的有意义的研究课题。1982年至1983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教书，课余曾到八家著名的图书馆访书，有时也获准入库。著名的静嘉堂文库是收藏原属我国南宋楼藏书的一家图书馆。馆长亲自陪我入库，不少国内已看不到的宋元善本，整齐地存放在樟木制做的书柜里，欢迎读者借阅。更使我感叹的是东京大学的汉籍中心，索性发给我一把书库的钥匙，供我随时入库读书，真是方便极了。

逛书店也是一件趣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都有不少旧书店，书多而且便宜，偶尔还能碰上善本。可惜当学生时零用钱很少，当了助教月薪也不过五六十块，能有多少钱买书呢？实际上是把书店当成图书馆来逛。近几年收入增

加了,可是书价也涨了。线装的古旧书,以前几十元一部的,现在恨不得卖到千元,仍然是买不起。隆福寺的旧书店关闭了,东安市场的旧书店消逝了,只剩下琉璃厂还有几家,俨乎其然的,早已不是当年那副欢迎读书人来买的样子。物以稀为贵嘛,也难怪。不过平心而论,这些年我还是买了点书。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走进书店万不得已不要空手出来,总得买一两本才对得起书店和书的作者们。就这样,有自己买的,有朋友写了书赠送的,加起来我这间14平方米的书房几乎摆满了三面墙的书。陶渊明有诗曰:“我土日已广,桑麻日已长。”我看着自己的藏书常常想起这两句诗来,借用其意以表示藏书增长的喜悦。

不过,做研究还得靠图书馆,个人的书远远不够。一些老师不愿离开北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恋这儿的藏书。尽管别处住房宽敞奖金优厚,但是书少,做研究不方便。我希望政府多拨些图书经费,使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更丰富些,也希望北大图书馆多做些方便读者的事。读者的研究工作取得成绩,决不会忘记图书馆里那些忙忙碌碌供给他们图书资料的人们。

袁行霈(1936—),生于山东济南,原籍江苏武进。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编著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山海经初探》等。

断章取‘艺’

□刘绍棠

我这个人上学早，识字快，7岁就看闲书。开头是因为听评书而想看原著，都是武侠小说。后来，由于连看几出京剧中的红楼戏，又想见识《红楼梦》。那一年，我9岁，两册互不衔接的石印《红楼梦》残本，被我囫圇吞枣，吃进肚里。

虽是黄口小儿的浮光掠影，却也水过地皮湿，对《红楼梦》中的某些人物产生了数十年守恒不变的印象和评价：王熙凤，够毒的；贾琏，够坏的；尤二姐，够贱的；平儿，够难的；宝钗，够阴的；晴雯，够俊的；尤三姐，够硬的……从9岁到眼下年近花甲，我自称十读红楼，其实并无精确统计，但敢保读过十遍以上。只是我读《红楼梦》不是索隐探秘做‘红学’，而是为了从中偷艺写小说。

偷艺，也就是学以致用。

在中国写小说的人不读《红楼梦》，我觉得就像基督徒不读《圣经》一样，可算不通情理，说不过去。有一位‘新潮’文艺理论家，拿《红楼梦》跟西方现代派小说比较，说《红楼梦》只够初中水平。这就更加令人忍无可忍，惹得我多次撰文和发言反驳他。如今，此人到西方寄人篱下，‘比较’来‘比较’去，还是靠卖《红楼梦》挣口饭吃。面对西方‘蓝眼睛’，大谈《红楼梦》比西方现代派小说高出百倍、千倍、万倍、万万倍，唬得那些‘初中水平’以上的蓝精灵如醉如痴，走火入魔。

闲言少叙。且说我向《红楼梦》学习语言艺术,是重点进攻,条块分割,全面推进。

我的重点进攻对象是王熙凤、林黛玉和晴雯。这三位女性的语言最有鲜明特色,个性最为突出。闻其声如见其人,听其言而发人深思。

条块分割便是对各系统(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和各单位(如怡红院、潇湘馆、梨香院……)的不同人物进行个别和综合对比研究。贾政、王夫人和赵姨娘的搭配,薛姨妈、薛蟠、薛宝钗一家的组合,真是亏他(曹雪芹)想得出,骂人不吐核儿。

凡在《红楼梦》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哪怕微不足道,一闪而过,我也在“全面推进”中解剖“麻雀”。

深受贾宝玉的精神感染,全盘接受这位“无事忙”先生的高论,我对《红楼梦》中的男性兴趣不大,在女性中对已婚者也不太感兴趣,而对未婚少女,在丫头身上下力多,小姐身上用心少。

通过我对《红楼梦》的阅读和思考,通过我在创作上借鉴和学习《红楼梦》的深刻体会,我写小说是追求以个性语言,来刻画人物的个性和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以人物在动态中的准确的细节描写,描绘人物形象。由于个人气质和生活经验不同,我写不出《家》、《三家巷》那样跟《红楼梦》靠色的作品。但是,我在我的乡土文学小说中,写过不少“乡土晴雯”、“乡土芳官”、“乡土金钏”、“乡土袭人”……只是没有依样画葫芦,不那么显眼。

《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和人际关系,我已十分熟悉,这几年便不再通读。出于个人情趣和创作需要,我对《红楼梦》的阅读改为“听折子戏”的方法,也就是将《红楼梦》的精彩片段,分割成若干中篇或短篇,类似《水浒》的宋 10 回、武 10 回、林 6 回、鲁 3 回……凡以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秦可卿、贾宝玉、刘姥姥、晴雯等为主角的章节,或表现重大事件和复杂纷争的段落,我都节选出来,反复精读和寻思。如“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我节选了两千多字。晴雯那多

层次多侧面的心理活动，完全从她那有声有色、泼辣含蓄、丰富优美的语言中流露表现出来。“不肖种种大受笞撻”一段，我前后节选了五千多字。在这五千多字里，或隐或现将贾府男女老幼、尊卑上下、亲疏远近、真假虚实的众生相，暴露无遗。在这些“折子戏”里，每个人物的一言一笑，一动一静，都话里有话，弦外有音，意犹未尽，令人回味无穷。

后 40 回的“折子戏”，我只看中黛玉之死和袭人之嫁两节。

不仅对于《红楼梦》我是如此重读，而且对于过去阅读的所有名著，我也是如此复习。

如此如此，我称之为断章取“艺”。

刘绍棠（1936—1997），北京通县人。当代作家。1954 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76 年后为中国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小荷才露尖尖角》、《蒲柳人家》、《运河的桨声》等。

真的书

□钱理群

我向北大的同学郑重推荐两部著作。

一是《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或者其他你能找到的鲁迅著作单行本与选本也可以。

一是《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推荐理由有二：

这是本世纪两个“真的人”写的“真的书”。借用鲁迅的话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要忘了现代中国人开创的现代中国文化传统。

鲁迅著作中有“现代中国民族魂”，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精神和20世纪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现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顾准著作中有“现代独立自由精神”，他作为四、五、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对鲁迅之后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所提出的最尖锐、最复杂的问题，作出了清醒的反思，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因此，他们的著作活在“现实中国”的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愿意并正在思考的普通人都可以和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

钱理群（1939—），四川重庆（今重庆市）人。儿童文学家、周作人

研究专家。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做过中专语文教师。现任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著作多种。

日坐书城

□叶永烈

一家杂志刊登了我在书房里的照片，用了“日坐书城”为题。我觉得颇为贴切。

我家号称“万卷户”。其实，我的藏书何止万册，虽说我也不知究竟有多少册——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去逐一清点，而且随着邮递员每一回光临，我的书几乎每天都在增多。

眼下，家家户户时兴“精装”居室，四壁糊上漂漂亮亮的墙纸。我家的“墙纸”与众不同。一位记者在报道中称之为“特殊墙纸”四壁，是我亲手设计的“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密密麻麻站满了书。这书架，成了我家的“特殊墙纸”。

不过，能够在书架上抛头露脸的，大都是我常用书。一些不大用的书，只得“躲”进书架里面——书太多，书架上不得不分内外两层放书。还有些不大用的书，更为“委屈”，堆放在壁橱或床下。有些几乎不用的书，则整箱整箱送给初学写作者或图书馆（这些书大都是一般的文学小说，看过一遍，不大会再看）。

我是一个对文学、对科学都有兴趣的人。大体上一个房间里放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另一房间放自然科学书籍。在书架上占居显要地位的，往往是工具书、资料性书籍，是我写作时常用的。比如，那部《辞海》的边沿已被我翻得泛黑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处处留下我翻阅的印记，种种大事记、辞典同样不时接到我的“调

令”来到我的书桌上。人们常常误以为作家大约不用那种中小學生常用的《新华字典》,其实不然,我已翻烂了好几本《新华字典》——从最初灰绿封皮的那种,到蓝封皮的,到现今正在用的紫罗兰封面的。因为我在写作时,仿佛觉得千千万万读者在看着我的稿纸,写错一个字,一印出来便成了上千上万个错字——这万万使不得。这样,遇上自己‘吃不准’的字,宁可翻一下《新华字典》。至于《成语辞典》、《名句辞典》之类,也总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

家中书已成‘灾’,我仍不断买书。尤其是出差,谁都怕行囊太重,而书恰恰是‘重货’。可是,我每逢外出,总要进书店。越是边远的小城书店,我偏要去。在那里,往往能‘淘’到一些冷僻的好书,放进旅行袋,远途运回上海。这些书,我往往一边旅行一边看,在旅馆的台灯下,在候机室、候车室,不断地看着。回到家中,根据我的初读印象,给它们在书架上安排“住宿”之地。给我留下良好印象的,便能挤入书架的‘显要’位置。

“书到用时方恨少。”即便家中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我仍感到不够用,不得不跑到图书馆借书。我拥有好多图书馆的借书证。有的书,则是汇款到各出版社邮购。我手头备有各地的邮购部通讯处。比如,最近我听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共两党关系史》,但不知书价;‘毛估估’汇去30元,结果对方来信说这套书40多元,我赶紧补寄……

我不断地买书、借书,不断地读书。日坐书城,书使我能够识古知今,使我识外知中,使我悟得人生的价值,懂得知识的力量。越是读书,越是感到自己浅薄。读书无止境,求知无止境。我常常后悔,少年时不知时光的珍贵,没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用于读书,而今年过半百,写作繁忙,读书时间只能在忙中挤,无法畅读。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眼下,用有限的时间去读无限的书,我只能缺什么读什么。书的海洋,那么博大,那般精深,何时得闲,从从容容地纵横上下随意遨游。看来,最现实的,只有一个字:挤。挤时间读,多

读一本书，多一份智慧，多一份力量。

叶永烈（1940—），浙江温州人。当代作家。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任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学幻想小说协会理事等。著述丰富，以科普作品、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为主。

情痴不关风与月

□陈建功

和书的缘分大约是在十四、五岁时结下的，那时候我是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或许是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政治上比较松动，学校图书馆那间只为教员开放的阅览室，居然对学生敞开了大门。每天下午例行的体育锻炼一完成，我就一头扎进了那四壁满布书架，中间也立着一排排书架的大厅。那时我觉得，让我走进这么一个地方，又赋予我在这里东翻西翻的权利，就跟把我放进了天堂一样。是的，我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更没有这样的权利，我只能读老师和家长推荐的图书，不管它是否能引起我的兴趣。更坦率地说，它往往引不起我的兴趣。而现在，我发现，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书，它们并非全如过去所见，只是那一个味儿！就不用说从未见过的那些精美的画册了，也不用说一直只是听到批判，却从来也没读过的《红与黑》、《拍案惊奇》之类了。就说书里写到的英雄吧，也不光是黄继光和夏伯阳。我就在这阅览室里，见识了在“生存还是毁灭”中折腾的“哈姆莱特”，妒火中烧的“奥塞罗”……少年人的感觉，当然并不准确，把哈姆莱特、奥塞罗和黄继光、夏伯阳相比就是明证，不过，生活的确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感受到，书，把人的一生所拥有的可怜兮兮的空间和时间拓展了。它带领我们到远古去寻觅，到未来去探访，到海外天外游历，到微观世界领略其

神奇，到别人经历的人生里共享悲欢……读书的妙处，恰恰就是因为它能使有限的人生得到无限的拓展。后来我在一篇作文中谈过类似的体会，我说，曹丕《与吴质书》叹道：“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何如把“秉烛夜游”为“秉烛夜读”？……年少气盛，想来可笑，然爱读之心，也可见一斑吧？

那时候读书真是读疯了，不敢说像某位前辈年轻时那样，“一日一书”，至少也“每周一书”。读过的不仅有文艺小说，而且还有社会科学著作，甚至连《自然辩证法》也啃了下来，因为看不懂，又先去读了龚育之的论文，还去查了不少自然科学著作……

不难想像，没过多久，当“文革”的烈火把我所痴迷的东西化为一炬的时候，我会是个什么样子。

18岁那年，我到京西当了一名采掘工人，我的行李里有一套《红楼梦》，这书不是我的，它的主人是人大的何干之教授，书上还有他的大名。我猜是红卫兵抄了他的书，后来流传到了我的手里。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得了这本书，当时绝没有要还他的念头，因为我太需要它了，再说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它的主人，再说那时候这书还被当作“四旧”。可惜的是，这套书没多久就失去了：我的一个朋友借去看，事后他告诉我，当他在列车上看这本书时，被列车员没收了。天知道是真是假，更有可能的是，没收了我的书的是我的这位朋友。对一位和我一样的嗜书者，我能说些什么？唯一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后，我似乎还在人大的院儿里见过何干之先生，我心里挺惭愧，没能把书还给老先生。

没有书读的日子有如漫漫长夜，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为得到一本好书，我甚至干过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盗窃。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和暖的冬日，有朋友来偷偷告知我，矿上的图书馆在腾房子，一个老头儿在把所有的“四旧”书

打捆、清理，准备送到造纸厂去化浆。我特意为这次有计划的盗窃歇了一天班，穿上了一件宽大的棉大衣，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踱入爆土扬烟的书库，和老头儿搭话，聊天儿，乘其不备，把一本一本书塞进裤腰里，用棉大衣掩着，一趟又一趟，那次偷来的书有：《战争与和平》、《贝姨》、《曹禺剧作选》，还有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跟高尔基说的一样，那几天，我就像饿鬼扑到了面包上：天天躺在我的床上，拧亮那盏用纸盒子做灯罩的床头灯，看得昏天黑地，不知东方之既白。你可以想像，一个政治上正受到挤压、歧视的青年人，《红字》所给予他的，会是什么？一个被艰苦的工作压弯了腰的知识青年，他能跟着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到美学的天地去遨游，该是何等的幸运！

这一次行动给我带来的，也未必全是幸运。大约是几个月以后，因为我看了曹禺先生的那篇《日出》，又给同屋的朋友们背了一段方达生：“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被人揭发出来，落了个“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去开了几次“宽严大会”如果不是工人们保护我，恐怕真的让公安局铐了去。

一点儿也不后悔，想的是欧阳修那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社会人生的风风雨雨，也权当一本大书可否？

情之所钟，痴迷至此，风清月朗抑或风雨如磐，又可奈何。

说起来这么洒脱，当时代进入 1979 年，一大批被打成“四旧”的图书重新面世时，我也和我的北大同学们一道，挤在新华书店的柜台前，喊着“这本！……那本！”时有一朋友指着被人抢着买走的《安娜·卡列尼娜》喊道：“安娜是我的！”人皆轰然大笑，我却忽觉有“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的悲怆。

是的，情痴不关风与月，不过，读书，还是月朗风清好些。

陈建功（1949—），广西北海人。当代作家。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职。有《丹凤眼》、《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等行于世。

闲话读书

□曹文轩

古人对读书很在意，尽管读书人在社会上位置不高。但读书与读书人是两回事。看不起读书人，但看得起读书。于是留下了许多发愤读书的故事。如“萤入疏囊”（《晋书·车胤传》：“胤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如“雪映窗纱”（《尚友录》卷四：“孙康，晋京兆人，性敏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尝映雪读书。”）。如“凿壁偷光”（《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还有“头悬梁，锥刺股”之类，不胜枚举。

但是古人对读书的益处，认识似乎并不深刻。在某些高雅之士那里，也有“读书可以修身养性”的认识，但在一般人眼里，读书的目的也就只剩下一个功利：“书中自有黄金屋。”因此，中国的一般读书人，总不在一个较高的境界。虽也孜孜不倦，但读来读去，还是脱不去一番俗气。他们没有看见一个精神的殿堂，没有看出那书原是一级一级的台阶，读书则是拾级而上，往那上方的殿堂里去的。因为如此，古人读书常常就只有一个“苦”的记忆，而很少有阅读的快意，更有达抵人生审美境界的陶醉。

读书是对人经验的壮大。天下事多不计其数，人不可件件躬身力行。人这一辈子，实际上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经验生活，经验人生，个人的经验实在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由于如此，人认知世

界，十有八九是盲人摸象，永无全象，因而实际上也就无象。由于如此，人匆匆一生，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也就一片苍白，乃至空洞。由于如此，人对活着的享受，也就微乎其微，生命实际上是虚晃一世。因而，人发明了文字，进而用文字写书。书呈现了不同时空里的不同经验。你只需坐在家中，或案前，或榻上，或瓜棚豆架之下，便可走出你可怜的生活圈子，而走入一个无边的世界。你从别人的文字里知道了沙漠驼影、雪山马鸣、深宫秘事、上流情趣……读书渐久，经验渐丰，你会一日一日地发现，读书使你变得心灵充实。其情形犹如你从前只有几文小钱，而随着对书的阅读，你的仓库一日一日丰厚起来，到临终时，你居然觉得自己已有金银一库，而你曾因拥有它而着实豪华地享受了一生。此时，你会觉得死而无憾，满足地最后一笑，撒手人寰。

更有一点，未被多少人揭示：读书还会有助于你创造经验。这世界上的许多写书人，不仅仅是将自己所有的特别经验复述于人，还在于他们常仰望星空，利用自己的幻造能力，在企图创造知识，以引发新的经验。这些知识导你进行新的实践。这些知识预设于脑，使你在面对从前司空见惯的事情时忽然发现了新意。甚至干脆让你发现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在未得这些预设之前，它们虽与你朝夕相处，你却并未将其发现。一条水牛从梨树下过，碰落了一些梨花。一个农人，也许对此事浑然不觉，空空走过，但废名先生却觉得“落花水牛”的图景很美，于是有了一番享受。废名是个读书人。你也是个读书人。你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倘若日后你做事不顺，但终究还是将事做成了——虽然此事从表面上看犹如“一袭马林鱼的骨架”，但你记得《老人与海》，于是你在失败中忽然有了一种优雅的感觉。你读过尼采的文章，也读过劳伦斯的作品，同样的床第生活，尼采的生活哲学导你进入一番境界，而劳伦斯的“审美之性”又导你进入一番境界。知识使你的经验屡屡增加，并使你的经验获得了深度。你也活一辈子，但你这一辈子密度甚大。倘

若浮到形而上的层面来论时间长短，你这样高密度的一生与一个低密度或者没有密度的一生相比，你扯下来就不是活了一生。寿有限而知无涯，而知却可以使寿获得形而上的延长，甚至是大大的延长。读书人有这点好处。

读书养性。人之初，性本就浮躁。落草而长，渐入世俗，于滚滚不息、尘土飞扬的人流中，人几乎很难驻足稍作休息，更难脱洪流而出，静处一隅，凝思独想。只有书可助你一臂之力，挽你出狂浪浊流。且不说书的内容会教你如何静心，就读书这一形式本身，就能使你在喧哗与骚动之中步入静态。在这里，读书具有仪式的作用。仪式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过仪式的内容。时至今日，大工业轰轰烈烈，商业化铺天盖地，自由主义无节制张扬，现代情绪漫延滋长，人虽日益感到孤独，却又在众人吵嚷中心神不定，陷入了更大的浮躁。如此情状，人深感不安，从心底深处渴求宁静的绿荫。此时，人的出路也大概只在读书了。我在东京时，我的研究生秦立德、戴清都来信，说了他们工作之后的心态，觉得自己现在变得难以沉静下来，对未来颇感惶恐。我写信给他们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不将书丢掉，就一切都不会丢掉。

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就是不一样，这从气质上便可看出。读书人的气质是读书人的气质，这气质是由连绵不断的阅读潜移默化养就的。有些人，就造物主创造了他们这些毛坯而言，是毫无魅力的，甚至是丑的。然而，读书生涯居然使他们获得了新生。依然还是从前的身材与面孔，却有了一种比身材、面孔贵重得多的叫‘气质’的东西。我认识的一些先生，当他们坐在藤椅里向你平易近人地叙事或论理，当他们站在讲台上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地讲述他们的发现，当他们在餐桌上很随意地诙谐了一下，你就会觉得这些先生真是很有神采，使你对你眼前的形象过目不忘，永耸心中。有时我会恶想：如果这些先生不是读书人又将如何？我且不说他们的内心因精神缺失会陷平庸与俗气，就说其表，大概也是很难让人恭维的。此

时，我就会惊叹读书的后天大力，它居然能将一个外表平平甚至偏下的人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使你觉得他们的奕奕风范，好不让人仰慕。此时，你就会真正领略‘书卷气’的迷人之处。

我们还可以将读书当宗教来看待——读书也是一种宗教。尼采言：上帝已经死亡。于是，世界觉得此事十分严重。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这个虚设的上帝去了就去了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是还有书在吗？书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依托。我们何不将书也看成是上帝？而且这是可以与我们平等对话的可亲可爱的上帝。寂寥无依的夜晚，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将心中的委屈、怨恨以及无法言表的一切向它毫无保留地倾诉，并可得到它的指引。每一本好书，都是暗中的一道亮光。这一道道亮光，将给我们一叶一叶暗空下的扁舟引航，直至寻找到风平浪静且又万家灯火的港湾。我们应有这样的古风：沐浴双手，然后捧卷。在一番宗教感觉之中，你必将会得到书的神谕。

我们对读书作了如此一番几近诗化的赞美，却并不含这样的意思：读书便是一切，读就是一切。

从长知识、增智慧、养精神诸方面讲，不是单纯的读书就能达到完满境界的。还得有人生的经验垫底，才能将书读好。人生的经验越厚实，书就读得越好。世界上凡读书读得好的人，在人生的经验方面都不是很简单的人。经验决定着读书的成效。而读书的成效又转而影响人生经验的深度与广度。如此这般，那书读得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读书本身来讲，自然还得有所讲究。有这些讲究，才能有助于将书读好。

读书应有停顿——突然地中断阅读而思考已被阅读的那些东西。当然，一般俗众的阅读，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要求。俗众的读书与读书人的读书应作两回事看。前者是一种被动的阅读，是不费神的，费神就违背俗众读书的本意了，他们的本意是消遣。而读书人

的阅读，固然不能排除消遣这一层次，但绝非满足滞留在这一层次上。读书人的读书带了联想与思考的痛苦。他们的阅读快感，不是在被动接受上，而是在接受时不断扩大收获的过程中。这就像两个儿子接受遗产，大儿子仅仅看到了他所继承的那部分产业，而二儿子却把他继承的那部分产业当成了资本，而看到了投资后的扩大、再扩大的辉煌景象。读书人得有那二儿子的活泛思路与主动精神。

世间有许多读书种子。但他们的读书似乎与他们的精神无补，反而读成呆子，读成迂腐可笑之人。曹聚仁先生说他曾听说过浙江金华有个姓郭的，书读到能将《资治通鉴》背诵一番的程度，但写一个借伞的便条，却写得让人不堪卒读（那便条写了五千余字）。读书多，莫过于清朝的朴学家，然而，像章太炎那样令人钦佩的朴学大师又有几个？我认得一位教授先生，只要提起他来，人们第一句话便是：此人读书很多。然而，他的文章我才不要看。那文章只是别人言论的联缀与拼接，读来实在觉得没有意思。读书不是装书。读书用脑子。脑子给了读书人，是让读书人读书时，能举一反三，能很强健地去扩大知识的。箱子便只能如数装书，有些人读一辈子书，读到终了，不过是只书箱子而已。

从前有不少人琢磨过如何读书。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有段文字：“袁文清公桷，为湘江世族，受业王深甯之门，尝云：‘予少年时读书有五失：泛观而无所择，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其失懦而无立；纂录故实，一未终而屡更端，其失劳而无功；闻人之长，将疾趋而从之，辄出其后，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学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袁氏之言，我虽不敢全部苟同，但大都说在了读书失当的要害之处。而其中“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我以为是读书的大忌。

更有甚者，还有读书把人读糟了读坏了的。周作人当年讲：“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抽去这句话当时的具

体所指，抽象一点说，这句话倒也说得通：中国的事坏在一些读书人手里的还少吗？

这篇文章前后两部分似乎有些矛盾。但我以为，我必须这样做。我为读书竭尽赞美之辞。但又明说：不是所有读书和所有读书人都可配得上如此赞美的。这文字的背后藏了一个企图：但愿天下读书人，都能将书读好，都能达抵那些个被我赞美的境界。

曹文轩(1954—)，江苏盐城人。当代文学家、儿童文学作家。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编委。论著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追随永恒》，文学作品有《牛桩》、《再见,我的小星星》等。

读书,读什么书?

□陈平原

小时候背了许多关于读书的诗歌与格言,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开卷有益’。在书山文海里折腾了几十年,自觉略有长进,悟出的窍门竟是:‘开卷’未必‘有益’。说来令人扫兴,就连这点可怜的心得,也都让古人占了先。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还算客气的。李贽的话更狠毒:‘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

拒绝当“书奴”,很想挺起腰杆,认认真真读书,堂堂正正做人。虚心请教饱学之士,得到的竟又是一句大白话:多读好书,不读坏书。可什么是‘好书’?不要说宋元明清说法不一,即便举世豪杰,也都各说各的。至于因时势变迁而‘好书’变‘坏书’、‘坏书’变‘好书’,这样‘充满辩证法’的戏剧性场面,已经看得够多了,你让我听谁的?最保险的或许是像韩愈所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因历经千年风浪,能传下来的一般都是好书。可即使你放宽眼界,把古希腊、古印度也算上,只读古代经典者,其知识结构仍嫌过于陈旧残缺。

于是有了一种变通的说法:‘读名著’。马上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并由谁来确定何者为‘名著’?爱默生在介绍其读书经验时称:非名著不读;出版不到一年的书不读。这里似乎有个不大现实的假设:书籍出版一年后,便能大致判定其价值。人类文化史上,好书长时间被埋没的例子不胜枚举。至于学识渊博且出以公心的“大

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更不要说浅学之士的信口雌黄。世人以为“名著”者，未必我喜欢，反过来，令我心灵颤动、眼界大开的好书，世人未必承认是“名著”。

不过，话虽如此，还是希望有人提醒我，这百年、这十年、乃至这一年出版的书籍中，哪些值得一读。走进越来越拥挤的图书馆，或者越来越萧条的书店时，这种感觉十分强烈。古人说：“通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这话绝对正确。可现代人没时间一切从头摸索，不能不借助专家的指点。朋友见面，第一句话常常是：“最近有什么好书？”好书不常见，埋没了实在可惜，偶尔见到称心如意者，朋友们便会奔走相告。可惜，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暂时把“好书”的范围缩小，就谈学术著作吧。以中国学术人口之庞大，即便专业性较强的书，也不该像现在这样被冷落。如今是写书的埋怨出书的，出书的埋怨卖书的，卖书的埋怨买书的，买书的埋怨写书的……如此循环往复，几乎成了解不开的“死结”。没有人敢立下军令状，保证三年五载扭转乾坤；可同样也没有人敢断言，这“死结”永远解不开。相信会有许多“突围”的办法，我只能设计最简单的：从书评入手。

在我看来，告诉读者什么书是好书，远比谩骂满街都是坏书重要得多。相对来说，只要有勇气，骂坏书远比评好书容易。后者除了学识与眼力，还要求认真的阅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或都愿意做的。评书需要顾及整体，落笔时不免字斟句酌；骂人则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可“潇洒走一回”。世人普遍欢迎骂人的文章，因其“痛快”。可对于真想读书的人来说，这种“痛快”的文章其实意义不大。何况对于出版业来说，更重要的是推出好书。

如此说来，书评很重要。其实道理谁都懂，就是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单看目前国内出版的若干关于读书的报刊，不是读后感，便是借题发挥（还不算哥儿们之间的互相吹捧与门户之间的互相辱骂），难得真正意义上的“书评”；你就能想像得到此事并不那么简单。

“借题发挥”的文章近乎散文随笔，好写也好读，目前是各读书报刊的门面。笔者不才，也曾滥竽几回。以我个人的经验，写此类文章时可以不读书，读此类文章后可以不买书。这种文章自有价值，可若想将其作为“购书指南”，则必然大失所望——人家本来就没这种设想，谁让你自作多情。至于“读后感”，作者往往因学识所限，只能连摘带抄，根本无力加以评判。大众化的读物，“借题发挥”或“读后感”都还能对付；专业性稍强的，可就徒唤奈何了。

书评而以文采见长，这与目前报刊发表的谈书的文章，大都出于作家或记者之手有关。单看介绍，似乎遍地珠玑；可若按图索骥，难免大呼上当。

也怨学者失职，不该让好书坏书一锅煮。可从事专业研究的人，谁愿意花半月时间读一本几十万字的大书，再花一周时间写一篇千字短文？况且，这又不算什么学术成果，评职称时用不上。而专业的书评家（在中国有没有是另一回事），知识面再广，也不可能了解那么多领域的学术进展，必然只能“统而言之大而化之”，抄一点作者的前言后记，再研究一点笔墨情趣。这种“书评散文化”的倾向，并非自今日始，但确实是随着近年“散文随笔热”的兴起而进一步强化。

书评的建设，有赖于学界与新闻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大方针管不了，我只能想些小问题。比如，能否聘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定期推荐书目，再由报刊编辑组织撰写书评？又比如，书评的撰写，能否少一点文学色彩，多一点学术性？还有，能否大幅度提高真正的书评的稿费。最后一点，“一说便俗”，可又不能不说。实在想不出什么高招，如此“鸡零狗碎”，但愿能免不贤识小之讥。

陈平原（1954—），广东潮州人。曾就读于中山大学，1987年在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论著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书里书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等。

后 记

北京大学有一批又一批的学术大师。他们对为什么要读书，读什么样的书和怎样读书，都会有耐人寻味的独特见解。我们在1996年创办《燕园导读》小报时曾开辟了《北大读者谈读书》栏目，受到读者的肯定与欢迎。于是萌生了编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在杨承运、孟昭晋等老师指导下，信息管理系研究生张广钦、李云、别立谦等又摘编出不少珍文。首都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王彦祥在录入、校对时也花了不少功夫。这本书本想在百年校庆时推出，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一拖两年，成了跨世纪“工程”，所以还要感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宋安莉、王燕来两位责任编辑，使本书得以在新世纪第一个校庆日出版，以上各位都是北大学子，他们对母校怀着浓浓的深情，对北大先师学者怀着崇高的敬意，相信此书在指导广大读者读书治学和提高大中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就是整理编辑此书的初衷。尤其要感谢的是，吴小如先生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并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北大教务处卢小东、金顶兵也给予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此次修订出版，北大中文系老校友王龙章又认真校对，使本书减少了排校上的差讹。至于选编中的错漏不当之处，祈望指正批评。

肖东发

2000年4月于燕北园